



宣 教 士

总撰稿 远志明
陈上宇

宣 教 士



神州传播协会

宣教士

总撰稿 远志明 陈上宇
排版设计 黄璐
出品人 谢文杰
出版发行 神州传播协会
P. O. Box 1600, Rohnert Park, CA 94927, USA
电话: 1 (707) 585-9588
传真: 1 (707) 585-9581
电邮: info@chinasoul.org
网址: www.chinasoul.org

承印 MI Design Limited
地址: 北角英皇道338号华懋交易广场二期2104室
网址: www.midesign.com.hk
版次 二零一六年十月第一版©神州传播协会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

国际统一书号: 1-931966-62-1
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编号: 2016955884

Missionary

by Yuan Zhiming, Chen Shangyu
Published by China Soul for Christ Foundation
P. O. Box 1600, Rohnert Park, CA 94927, USA
Copyright 2016

ISBN: 1-931966-62-1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 Card Number: 2016955884

目 录

第一部 叩门

- 第一章：福音的源头 14
- 第二章：多马入华的传说 15
- 第三章：唐朝的景教 16
- 第四章：元朝的也里可温教 21
- 第五章：明末的天主教之一 23
(沙勿略与范礼安)
- 第六章：明末的天主教之二 26
(利玛窦与徐光启)
- 第七章：清初的天主教之一 32
(汤若望、南怀仁与康熙)
- 第八章：清初的天主教之二 37
(礼仪之争)

第二部 落地

- 第一章：拓荒期（1807—1840） 44
从马礼逊来华到鸦片战争
- 第二章：撒种期（1840—1900） 54
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
- 第三章：扎根期（1900—） 66
义和团以后

目 录

第三部 光照

- 序言 78
- 第一章：创办现代教育 80
- 第二章：建立大学体系 87
- 第三章：开文化之先河 91
- 第四章：让世界了解中国 95
- 第五章：倡导禁烟戒毒 97
- 第六章：引进体育精神 99
- 第七章：让妇女得自由 100
- 第八章：兴办慈善事业 102
- 第九章：发展医疗事业 105

附录一 宣教士选介

东汉传闻

65-68年 圣多马 Saint Thomas 114

唐朝景教

635年 阿罗本 Alopen Abraham 116

635年 景净 Adam 116

元朝也里可温教

1246年 柏郎嘉宾 G. da Pian del Carpine 118

1271年 马可·波罗 Marco Polo 118

1291年 孟高维诺 G. da Montecorvino 119

明朝天主教

1549年 沙勿略 St. Francis of Xavier 120

目 录

- 1582年 罗明坚 Michele Ruggieri 121
1583年 利玛窦 Matteo Ricci 121
1593年 郭居静 Lazaro Cattaneo 123
1597年 龙华民 Nicholas Longobardi 124
1610年 金尼阁 Nicolas Trigault 124
1620年 邓玉函 Johann Schreck 125
1620年 汤若望 Johann A. S. von Bell 125

清朝天主教

- 1659年 南怀仁 Ferdinand Verbiest 127
1672年 徐日昇 Thomas Pereira 128
1687年 白晋 Joachim Bouvet 129
1687年 张诚 Jean-François Gerbillon 130
1715年 郎世宁 Ginseppe Caseiglione 131

清朝基督教

- 1807年 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132
1813年 米怜 William Milne 133
1816年 麦都思 Walter Henry Medhurst 133
1827年 台约尔 Samuel Dyer 134
1830年 裨治文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35
1830年 雅裨理 David Abeel 135
1831年 郭实腊 Karl F. A. Gützlaff 136
1833年 卫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 137
1834年 伯驾 Peter Parker 138
1837年 艾迪绥 Mary Ann Aldersey 139
1837年 罗孝全 Issachar Jacox Roberts 139
1839年 包留云 Samuel Robbins Brown 140
1839年 理雅各 James Legge 141

目 录

- 1839年 雜魏林 William Lockhart 142
1839年 合信 Benjamin Hobson 143
1842年 文惠廉 William Jones Boone 143
1842年 委理华 Walter Macon Lowrie 144
1843年 艾约瑟 Joseph Edkins 144
1847年 慕维廉 William Muirhead 145
1847年 伟烈亚力 Alexander Wylie 146
1847年 晏马太 Matthew Tyson Yates 147
1850年 丁甦良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48
1851年 宾惠廉 William Chalmers Burns 149
1853年 嘉约翰 John Glasgow Kerr 150
1853年 包尔腾 John Shaw Burdon 151
1854年 戴德生 James Hudson Taylor 152
1854年 倪维思 John Livingstone Nevius 154
1854年 赫德 Robert Hart 156
1855年 韦廉臣 Alexander Williamson 156
1855年 杨格非 Griffith John 158
1856年 纪好弼 Rosewell H. Gaves 159
1857年 梅理士 Charles Rogers Mills 159
1859年 施约瑟 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 160
1860年 林乐知 Young John Allen 161
1861年 傅兰雅 John Fryer 163
1863年 狄考文 Calvin Wilson Matteer 164
1863年 马雅各 James Laidlaw Maxwell 165
1863年 郭显德 Hunter Corbett 166
1864年 富善 Chauncey Goodrich 167
1865年 李修善 David Hill 168
1865年 花之安 Ernst Faber 168
1866年 曹雅直 George Stott 170
1869年 谢卫楼 Davelle Z. Sheffield 170

目 录

- 1870年 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171
1870年 葛雅各 James Gilmour 172
1871年 马偕 George Leslie Mackay 173
1872年 明恩溥 Arthur Henderson Smith 174
1873年 香便文 Benjamin Couch Henry 175
1873年 慕拉第 Lotti Moon 175
1875年 马根济 John Kenneth Mackenzie 176
1882年 赐斐德 Harold Scholreld 177
1882年 司督阁 Dugald Christie 178
1882年 李佳白 Gilbert Reid 179
1882年 苏慧廉 William Edward Soothill 180
1884年 梅耐德 Annette E. Thompson 180
1885年 剑桥七杰 The Cambridge Seven
 盖士利 William Cassels 181
 司米德 Stanley Smith 182
 施达德 Charles Thomas Studd 182
 杜明德 Arthur Polhill-Turner 182
 杜西德 Cecil Polhill-Turner 182
 章必成 Montague Beauchamp 182
 何斯德 Dixon Edward Hoste 183
1886年 卜舛济 Francis L. H. Pott 183
1887年 柏格理 Samuel Pollard 184
1888年 古约翰 Jonathan Goforth 184
1895年 和受恩 Margaret E. Barber 186
1896年 毕得经 Horace Pitkin 186
1896年 穆德 John Raleigh Mott 187
1896年 盖落窪 Archibald E. Glover 188
1897年 路思义 Henry Winters Luce 189
1897年 金纯仁 Gershom W. Guinness 190
1899年 马士敦 John Preston Maxwell 190

目 录

- 1902年 乐灵生 Frank Joseph Rawlinson 191
1902年 盖群英 Alice Mildred Cable 191
1904年 司徒雷登 John Leighton Stuart 192
1906年 胡美 Edward Hicks Hume 193
1906年 郭慕深 Karen Gormsen 194
1908年 富能仁 James Outram Fraser 195
1908年 柏立美 Victor Plymire 195

民国基督教

- 1912年 魏特琳 Wilhelmina Vautrin 197
1916年 钟爱华 Lemuel Nelson Bell 198
1920年 贝德士 Miner Searle Bates 198
1925年 李爱锐 Eric Henry Liddell 199
1928年 杨宓贵灵 Isobel Kuhn 200
1930年 艾伟德 Gladys Aylward 201
1932年 师达能 John Cornelius Stam 201
1932年 艾得理 David Howard Adeney 202

附录二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 碑文原文 206
现代中文 212
英文译文 218

附录三 参考书目和资料来源 232

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 启示录 3:20

第一部

叩 门

教

士

第一章 福音的源头

人类就像一棵树，各民族是它的枝子。枝子在空中四处伸展着，地下却有一个共同的根。

这就是为什么，各民族都有一个寻根梦。

中国也不例外。从尧舜禹到夏商周，一直有敬天的道统。即使后来道统瓦解，人们在巔宕痛苦中依然穷极呼天、仰天长叹，流露着顽强的寻根情怀。

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历史就是人与神之间的呼应史：人呼求神，神回应人。

公元零年，一个处女怀孕的奇迹，将耶稣送入人间。他以超凡的大智、舍命的大爱和复活的大能，印证他是神的儿子。

门徒们确信，他正是犹太人期待已久、各民族苦苦寻觅的生命之根。

离世前，耶稣对门徒们说：去，将这福音传遍天下。

于是一场血与火的洗礼，开始一寸寸席卷这个星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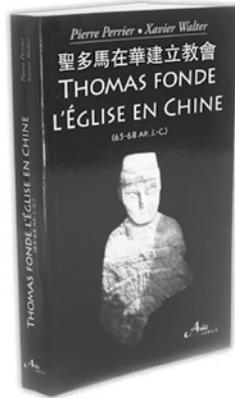
第二章 多马入华的传说

公元64年，耶稣离世大约30年后，罗马城一场大火，皇帝尼禄嫁罪于基督徒。6年后耶路撒冷被毁，基督徒被迫四散。

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多马来到印度，传说他也曾进入中国。

印度西南有一座城市叫马拉巴。在马拉巴教会珍藏的叙利亚文《圣务日程》里写着：由于圣多马，印度和中国听到了真理；由于圣多马，天国在中国飘然升起。

利玛窦也对多马来华一事确信不疑。他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里说：是圣多马本人将基督教传入中国的。



法文书
《圣多马在华建立教会》

如果是这样，那么基督教早在公元一世纪的汉朝就传入中国了。但这件事毕竟缺乏史料，只能算作传说。而600年后的唐朝，基督教的一支景教入华，则因着1625年出土的一座石碑，从传说成为信史。

第三章 唐朝的景教

1625年，正是欧洲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登陆北美第五年，也是中国明朝天启五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古都西安出土。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这座珍贵的古碑，今天依然完好地保存在西安碑林里。

大秦一词，从汉朝起，常常指东罗马帝国。景教，是基督教东方教会的一支。碑文说：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景字的意思就是光明、广大。

当时基督教已是罗马国教，其中有一派叫聂斯脱里派，这一派将耶稣的神性和人性分开，认为马利亚只是耶稣肉身的生母，不能当成神来崇拜。

公元431年，以弗所主教会议将这一派定为异端，放逐东方，就是后来传入



聂斯脱里

中国的景教。

有一件事，看起来像巧合，那就是：基督教东来中国之时，正是中国人西行取经之际。



唐玄奘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西天有真经、西方有极乐的传说，一直撩拨着东方人的心。

公元629年，唐玄奘离开长安，一路向西走到印度。十几年后，带回657部佛经。

然而，印度《阿弥陀经》所向往的西方极乐世界，显然不是指印度本身。唐玄奘应该继续向西走下去才对。

天意冥冥。正当唐玄奘西行取经止步于印度的第六年，阿罗本主教带着圣经自西而来，直奔长安。

时值贞观大治，盛唐气象，雍容大度。宰相房玄龄出宫亲迎，阿罗本



阿罗本主教

拜见唐太宗，住进皇宫，着手翻译圣经。

三年后，唐太宗宣诏：此教于社稷、世道和人心均有裨益，应该让它通行天下。于是朝廷出资，在长安城内的义宁坊修建了一座大秦寺，寺内住有21名教士。



敦煌莫高窟的景教绢画

陈怀宇，景教专家，剑桥大学访问学者，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副教授：斯坦因在敦煌莫高窟发现了一幅绢画。绢画上有一个人物，虽然很残破，但我们能看出来，他戴著一个王冠，拿著一个权杖。他的权杖上有一个十字架，他的额头上也有一个十字架，就把它判断为是景教的绢画。

到公元781年唐德宗下令树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时，景教在中国已流行140多年。

陈怀宇：景教碑里面有一段话，就是讲到当时景教在中国流传的状况，叫“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因为当时唐朝的行政区划就是规划为十个道，比较确切的可以说，有景教徒活动的地方，基本上是我们所说的商业的中心。

景教碑借用了很多佛教和道教的术语。它只是借用而已，其实它还是非常严格地反映了景教的教义和它的思想。



景教流行中国碑颂

为佛教里面有“世尊”，道教里面有“天尊”，那基督教里面就有“景尊”。所以，弥赛亚就叫“景尊弥施诃”。

景教碑上有一句话叫“匠成万物，然立初人”，这其实就是基督教的创世观。

“室女诞圣”，就是讲圣母玛利亚生下了耶稣。它又讲到耶稣的受难，他的复活，比如它里面有一句话叫“开生灭死，棹慈航以登明宫”，讲他怎么救赎这些罪人。

“判十字以定四方”，我们知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升真”，耶稣复活升天。

还有一句话叫“经留二十七部。”大家一般认为它就是讲新约一共二十七卷。

比如说，它讲到“大秦寺”，其实讲的就是景教的教堂。

它讲到“三一妙身”这样一个词，其实是指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

讲到“阿罗河”，就是叙利亚文的天父。

“弥施诃”，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

“净风”就是 Divinity，我们说的圣灵。

“景尊”这个词就是受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因

如此等等，虽然基督教教义已基本介绍过来了，但局限性是明显的：一是它对佛教的依附；二是它对皇权的依赖。

公元845年，唐武宗下令灭佛，景教也一起遭了殃。教堂被拆毁，教士被驱逐，景教碑也被埋入地下。

第四章 元朝的也里可温教



马可波罗

基督的福音再一次叩击中国的大门，是在五个世纪后的元朝。这一次与大名鼎鼎的马可波罗有关。

1260年，蒙古大汗忽必烈召见了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表示对天主教有兴趣，请二人捎信给教皇，索要耶路撒冷的膏油。

10年后，二人带着教皇的回信和圣地的膏油，再次觐见忽必烈。同来的马可波罗深受忽必烈器重，留了下来。

在后来那本广为流传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这个在中国住了17年的威尼斯人，不仅首次向世界描绘了中国的丰饶和博大，也提到了忽必烈的信仰。

他写到，忽必烈认为，基督教是最真最好的宗教，因为凡是不美善的事，基督决不允许人做。

元朝基督教，实际上就是从唐朝延续下来、存留在蒙古族部落中的景



忽必烈

教，蒙古语叫“也里可温”，意思是“信奉上帝的人”。

忽必烈的母亲别吉太后就是其中的一员。据说当时京城有大约3万基督徒，构成卫戍军团的主力。

1294年，中国迎来了第一位罗马教廷的特使蒙高维诺。这个意大利人开辟了天主教中国教区。

他在写给教皇的信中说，教堂离皇宫只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大汗在宫里可以听到我们的歌声。



蒙高维诺

可惜的是，元朝的基督教始终局限在皇室和蒙古人中，没有广泛传播。

1362年，朱元璋的明军攻入泉州，杀死了天主教的主教。几年后，元朝的基督教近乎绝迹。

第五章

明末的天主教之一

(沙勿略与范礼安)

时隔200年后，15世纪末至16世纪中，人类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大大唤醒了教会的福音使命。

另一件事，是哥伦布和麦哲伦的航海大发现，使世界连为一体。

这时候，上帝的使者再次出发，沿水路来叩击中国的大门。



马丁路德

耶稣会，凝聚了一群愿意为福音舍命的献身者。第一个前来中国的，是耶稣会宣教士、西班牙人沙勿略。



沙勿略

他在日本逗留了27个月。

丁松筠神父，台湾光启社制作者人：在日本的时候，他发现日本人非常崇拜中国人。日本人常

常是，学习中国人怎么做，他们也会怎么做。所以他们的文化跟中国的文化非常有关系。

满而溢神父，美国天主教中美交流中心主任：日本人，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奇怪，你讲这个耶稣基督那么伟大，可是，中国人从来都没有跟我们说有一个耶稣基督。方济各·沙勿略一听，就说：哦，那么我也应该到中国去。以后中国人要对日本人说，有过一个耶稣基督，OK，他们才信。

沙勿略带着对汉唐遗风的羡慕，于1552年乘船来华，登上与广东台山一水相望、只相距八海里的上川岛。

可是，当时没有人敢违法送他过去，不久他就在热病中遥望着他所爱慕的中国死去了，年仅46岁。他在遗言中说：我深信耶稣基督的圣名一定能传入中国。



范礼安

沙勿略死后26年，另一位耶稣会宣教士，意大利人范礼安来到澳门。

面对中国这块巨大、封闭而坚硬的土地，他发出呐喊：顽石啊顽石，你何时才裂开呢？

虽然范礼安至死也没能进入中国，但他怀着信心说：中国一定可以被说服，允许一些以学识和品德而闻

名的外国人进入中国。

丁神父：那个时候耶稣会发展得很快。他们把最好的、最聪明的、最有智慧的会士送到中国来。

第六章

明末的天主教之二

(利玛窦与徐光启)

四年后，1582年，他的学生利玛窦来了。在同学罗明坚陪同下，到了两广总督所在地肇庆。肇庆知府王泮欢迎他们，为他们的会堂题字：西来净土、仙花寺。



利玛窦

利玛窦以火热的使命感，带着对中国的热爱，一面潜心钻研中国古籍，一面四处走访，亲身体会中国的风土人情。

丁神父：利玛窦到了中国，他觉得，我是一个神职人员，我穿衣服打扮应该像一个中国的神职人员。那个时候，他所认识的神职人员是佛教徒，所以他就剃头髮，穿佛教和尚的衣服。十年都是这样过。然后他发现，真正受尊敬的人不是和尚而是学者。所以，他那个时候有一个改变。他就开始穿儒家的衣服，也让人家知道他是一个学者，跟很多其他的学者就开始交换意见，交很多学者的朋友。

这样默默生活19年后，利玛窦获得中国人的好感，成了一位“以学识和品德而闻名的外国人”。1601年，利玛窦进京传道。

丁神父：他不像其他的传教士，把基督宗教的信仰套在中国文化上。他觉得，中国文化已经有一些种子，一定要在中国文化里面发现那些符合耶稣基督的真理，可以从那边开始，从那边开始发芽长大。所以他一直有这个概念，他觉得，孔子的思想跟耶稣基督的信仰，在很多地方可以配合。尤其是伦理道德、尊重别人、敬天啊，这些都是可以接受的。

他引用《中庸》“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认为中国古代人祭拜的上帝就是God。

利玛窦在罗明坚《天主实录》基础上，编写了《天主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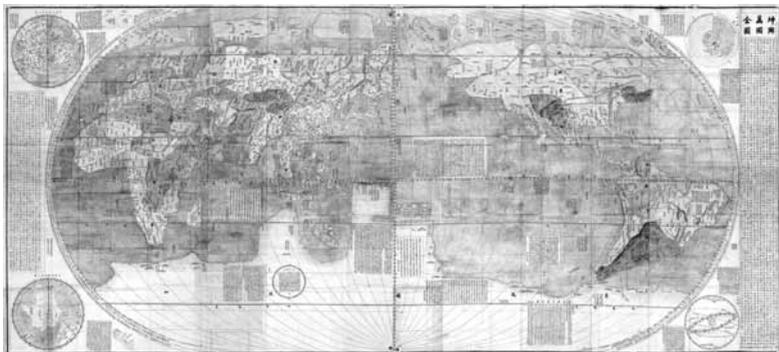
义》一书，尽可能靠近中国文化的取向，简明介绍天主教教义。

有一点很重要，利玛窦等人，不仅是献身的教士，也是杰出的学者。利玛窦带来了令中国人大开眼界的西洋镜、自鸣钟、日晷和万国全图。

他向中国人介绍了水力、火炮技术，日月食的推测，西方音乐和透视绘画。

天主實義上卷
耶穌會中人 利瑪竇述 燕貽堂梓
首篇論天主始制天地萬物而主宰安養之
中士曰夫修己之學世人崇業凡不欲徒稟生命與
禽彘等者必於是殫力焉修己功成始稱君子他技
雖隆終不免小人類也成德乃真福祿無德之幸誤
謂之幸實居其患耳世之人路有所至而止所以繕
其路非為其路乃為其路所至而止也吾所修己之
道將奚所至歟本世所及雖已畧明死後之事未知

《天主实义》利玛窦著



《坤輿万国全图》利玛窦1602年绘制

他用中文撰写和翻译了《交友论》、《西国记法》、《西字奇迹》、《四元行论》、《几何原本》、《测量法义》、《同文算指》、《乾坤体义》等十几本书。

在利玛窦和郭居静、罗儒望等宣教士的影响下，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明朝重臣，先后受洗归信耶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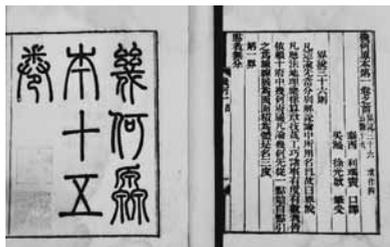
徐光启

办法了解西方科学这方面的知识，因为西方的逻辑跟中国的逻辑不一样。

所以，徐光启就下了决心。他要学习《几何原本》，而且愿意帮助利玛窦把这本书翻成中文。他是农夫。他常常会遇到一些自然灾害，叫老百姓受苦。所以他一直想了解怎么样解决这种很实际的问题。借著传教士，他引进、也学习怎么样种番茄，种花生，这些比较不容易失败的产品。这种学问累积起来好多年，最后他写了一本非常有影响力的《农政全书》。有很多关于农业方面的学问在这本书里面。有

徐光启，文渊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基督信仰、又有科学素养的国家领导人。

丁神父：徐光启一直在问问题，他一直希望能够吸收西方的一些知识。那么利玛窦告诉他，如果你不懂《几何原本》，你可能没有



《几何原本》利玛窦和徐光启译

人说，徐光启因为他的《农政全书》，和他那么多年的研究，他引起一个所谓的绿色革命，让中国的人口增加。

徐光启与利玛窦，没有徐光启，大概不会有利玛窦，利玛窦不会有那么大的贡献。同样，如果没有利玛窦，可能徐光启的贡献也不会那么大。利玛窦应该当作我们天主教的圣人。不过我们觉得，徐光启也应该陪伴著他当作圣人，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合作是没有话讲的。



《农政全书》



利玛窦与徐光启

徐光启说：国人若能敬畏上天、事奉上天，尧舜禹三代之风何不可还？

1616年，南京发生教难，有人捏造罪名，陷害宣教士。

丁神父：偶尔反对这些传教士、不能够接受耶稣的信仰的这些人，都会讲很多谣言，很多坏话，甚至会控告他们。每一次有这种事

情，徐光启会以他自己的生命当作一个保证。他们是无罪的，他们是好的。他说，如果发现他们真的是有罪，真的是有问题，他自己愿意跟他们一起受苦，一起承担同样的结果。



李之藻

水局郎中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圆容较义》和《同文算指》二书，编纂了第一部天主教丛书《天学初函》。因为他纳妾，利玛窦一直不给他施洗，直到他46岁弃妾后，才得洗礼。

监察御史杨廷筠原来信佛，改信基督后，受到佛教界指责，他回答说：基督教一是崇拜上帝，二是爱人如己。就是儒家所说，昭事上帝，悯我同胞。

明末清初，天主教与中国朝廷度过了一段难得的蜜月期。



杨廷筠

第七章

清初的天主教之一

(汤若望、南怀仁与康熙)

清朝顺治年间，德国宣教士汤若望被任命为钦天监正，负责制订历法。他与顺治皇帝友情深厚，免礼相交。

宣武门第一座欧式大教堂建成时，顺治亲赐额匾：通玄佳境。

丁神父：顺治皇帝很年轻的时候生很严重的病（天花）。他在临死的时候请汤若望过来，请教他应该请哪一位做下一个皇帝。汤若望知道，皇帝要作久一点，要选择一个已经有免疫力的人。这个皇帝就是康熙皇帝。



汤若望



顺治

顺治死后，大臣杨光先率先以阴谋惑众罪名诽谤宣教士，扬言非我族类，其心必殊；宁可使中国没有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

当时康熙才八岁，辅政的鳌拜听信

谗言，逮捕了汤若望、南怀仁等宣教士。次年，汤若望被定凌迟死罪，其他宣教士杖刑流放。

汤若望被抓入狱时，已是古稀老人，在狱中很快中风，不能说话。拷打审问时，由助手南怀仁代为作答。



汤若望

据清史记载，1665年4月13日，天空出现彗星。16日上午11时，汤若望的死刑判决书送到康熙和孝庄太皇太后手中，突然发生地震，故宫摇撼不已，京城天昏地暗。辅政大臣们惊恐万分，太皇太后当即传谕：立刻无罪释放汤若望等人。

汤若望75岁去世，葬于利玛窦身旁。他们的尸骨长眠在北京，他们的名字写进了《明史》和《清史》，他们的生命属于他们所挚爱的中国。



利玛窦之墓

满神父：你知道不知道？我们耶稣会派到亚洲那边去传教的人当中，五年以后，只有他们这些传教士的三分之一还在。我们耶稣会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派六个人去，我们就知道，在五年以后，只有两个人还在，其他四个人已经去世了。

聪慧通达的康熙15岁亲临朝政，召来反基督教大臣杨光

先与宣教士南怀仁，一同到观象台推测日影和星象，结果南怀仁逐款皆符，杨光先逐款不合。康熙立即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正，追祭汤若望，放逐杨光先，逮捕鳌拜。



南怀仁

国的贡献，准许自由传教。

康熙还亲临宣武门教堂，题写了“敬天”和“万有真源”两副匾额。又作诗称颂耶稣：

功求十字血成溪，百丈恩流分自西。天门久为初人闭，
福路全是圣子通。我愿接受神圣子，儿子名份得永生。



康熙

从此康熙以南怀仁为密友，要他不离左右。据南怀仁在《鞑靼旅行记》一书中回忆，康熙心情不好时，只要一看见南老爷，立即就会好起来。

1692年3月22日，康熙发布敕令，列数宣教士对中国

满神父：皇帝写的。当他写“天”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他用“天”这个字的定义是什么，因为也有很多其他的记载说明，当他写“天”，不是随便写的。所以可以说，他这样的一个对“天”的观念，比较接近我们所说的创造万有的唯一的真神。他们不用我们天主教现在的中文行话，可是他们那个时候，也有他们自己那个时代的行话。所以用他们的行话，看看他们自己怎么样去解释。他解释以后说OK，这个你就可以放在那边使用。

“万有真源”，你就去分析这四个字嘛，没有异端嘛。任何一个基督徒，除非你要在鸡蛋里挑骨头，那么你就可以找到骨头。



康熙的诗

当时，宣教士翻译西方科学著作数十种，帮助中国制造火炮数百门。

康熙每日请南怀仁、徐日昇、闵明我三位宣教士入宫授课两三个小时，内容涉及天文、地理、音乐、绘画、解剖、医药等，即使出京城去行宫也不中断。



康熙

康熙还在宣教士徐日昇、张诚协助下，与俄国彼得大帝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并以上帝的名义盟誓恪守。

南怀仁死后20多年，天主教与清朝的蜜月结束，从此不仅天主教遭受厄运，清朝的国运也急转直下。

第八章 清初的天主教之二 (礼仪之争)

自1645年始，罗马教廷以捍卫纯正信仰为由，一次比一次严厉地申明：God不能译为上帝，要用拉丁文徒斯（Deus）。教堂不许悬挂“敬天”一类匾额。信徒不能敬孔祭祖。不能称许中国古经。等等。

康熙表态：上帝就是真神。天不是物质的天。敬孔祭祖也不是宗教，而是敬心与孝心的表达，与基督教并不冲突。

满神父：刚刚来中国的时候，你懂中国懂得多少！说不定你还不会讲普通话呢。你就来说，这也不可以，那也不可以。你在那边又上香，那个意思是说，他就拜一个偶像。你已有领洗，为什么要去拜祖先。就是在传教士当中，有的人说，



铎罗

你们不是好的传教士，你们是魔鬼的走狗。你们给他们领洗，可是你们教的都不对，你们是搞异端的。我们在欧洲，比方说，我们跪在坟墓那边送花。是不是因为我们知道，已经埋在那边的那个人，他有鼻子还可以呼吸这个花朵的馨香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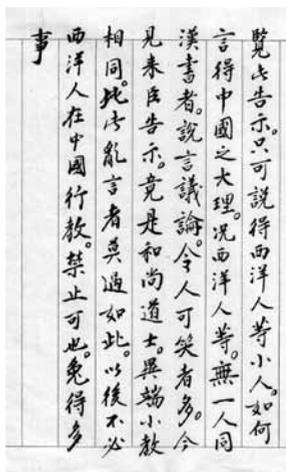
教皇派34岁的主教铎罗来华，以开除教籍威胁中国信徒，被康熙逐出国门。

教皇又派主教嘉乐来华。康熙十三次接见他，直到索阅了教皇毫无妥协余地的强硬通谕后，硃批如下：

只说得西洋尔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满神父：导致这个悲剧都是天主教来的。这个跟中国没有关系。最支持天主教的是康熙。你看，到了最后是不得已。也说，你们不要按照教宗要你们做的，如果你们是要像教宗的话，你滚，不准留在这里，我不准你们留在这里。

邢福增，香港崇基神学院院长：我觉得，当时康熙和基督教的关系是欣赏。但是，是不是真的去到一种很深的、他是一个基督徒这个角度，我想还是有一段距离。他最关心的还是，他可以去接受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宗教。但是，他还是把它放在中国一直以来的传统。就是这些东西，都不要挑战中国的王权的权威跟社会一般的礼教。这是一个秩序的维持。你能顺服的，你能跟他融合的，那你信什么都没关系。但是如果你要挑战他，这就会动摇了整个统治的根基。所以我想，礼仪之争其实是，你可以说，他们把一种默契、一种共识打破了。



康熙禁教

1724年，康熙禁教4年后，雍正发布通谕，令中国信徒一律退教，否则处以极刑；限各省宣教士半年内离境。

当时全国30万信徒陷入危难，300座教堂被没收，50多位宣教士躲的躲，逃的逃。

丁神父：那么到底这是谁的错？是教廷那边太傲慢，或是皇帝太固执；是人的错，或是上帝的旨意？这个可能每一个人都要做自己的一个判断。不过，最近我们的教宗梵蒂冈觉得，梵蒂冈的责任很大。在这一方面，教廷的责任非常大。太硬，太不了解中国文化。



雍正

在当时国情下，中国信徒如果按照教廷，就不能参加宗族祭祀和科举考试，成为不孝之子和不良公民；如果按照康熙，信徒依旧祭祖，也的确不合乎基督教的体统。

那时候，做一个好中国人与做一个好基督徒，两者似乎水火不容。

在这种情况下，上帝做了最好的选择。特别是后来，当中国经过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等一次次冲刷，今天做一个好中国人，已经不必违背基督信仰，反而需要基督信仰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感叹说：上帝的选择总是最好的！



清朝的天主教徒

从唐朝的景教，元朝的也里可温教，到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一次次的叩门、开门和关门，一次次的撒种、发芽和拔出，一次次的遥望、希望和失望，都不是徒然的，都带着上帝的美意。

在他们对中国的舍己献身中，我们看见上帝对中国人无条件的爱。

在他们对中国的前赴后继中，我们看见上帝对中国人的不离不弃。

在他们一次又一次成与败的艰难尝试中，我们看见上帝在精心开辟一条最适合中国人的福音之路。

1807年，中国禁教一百年后，马礼逊、戴德生等一大批基督教宣教士，用血和泪将福音的种子植入中国最底层。这一次中国的灵魂之门被打开后，就再也关不上了。

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约翰福音 12:24

第二部

落地

教

士

第一章 拓荒期

从马礼逊来华到鸦片战争（1807—1840）

1724年，雍正一纸诏书，赶走宣教士，关上大门，过起与世隔绝的“太平盛世”。

不久，西方工业革命爆发。纺织机、蒸汽机、飞行器、电力、电讯、铁路，短短几十年，人类文明跨入了一个崭新的纪元。

中国，怡然自得于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充斥着迷信、裹足、鸦片、纳妾、弃婴、科举等沉痾痼疾。

面对这样一块蒙昧、巨大而遥远的处女地，西方一些人觉得神秘，一些人显出轻蔑，一些人发现了商机。而基督徒看见的，是四亿灵魂的饥渴，是上帝爱的召唤。

1799年，在英国方兴未艾的宣教热潮中，马礼逊心里萌生了海外宣教的渴望。

八年后，1807年，英国泰恩河畔这个鞋匠的儿子，受伦敦传教会差遣，成为第一位基督教来华宣教士。



马礼逊

Christopher Hancock，牛津大学教授，马礼逊传记作者：
正当马礼逊开始思考人生意义的时候，他受到了新思潮的影响。英国的基督教开始觉醒，带来了一个强烈的宣教热潮，那时交通发展了，航海变得容易，铁路运输也已开始，马礼逊恰巧生活在这么一个文化、知识和机遇交织的时代。那是英国社会的一个转折点，正如我们今天在世界一些地方看到的，马礼

逊所处的正是这样一个时代。

年仅25岁的马礼逊，含泪离开伦敦，他写道：我孤单一
人，孤身去中国，但我并不孤独，我的神与我同行。

林治平，宇宙光创办人，台湾中原大学教授：他是第一个
嘛，他就是觉得上帝呼召他。他自己心里也很忐忑不安。所
以，当他上了船以后，那个船上的人就嘲笑他说，“嘿，小伙
子，你以为凭着你，就可以改变古老的、传统的、迷信的中国
来归信基督耶稣吗？那么，马礼逊被他一问楞住了，小声道回
答说：“我不能。但是，我相信上帝能。”

9月的广州天气炎热，但马礼逊的生存环境一片冰霜。



广东十三行 1815年

清朝已闭关50年，禁教100年。虽然广州是唯一的通商口
岸，但外国人的活动范围只限于珠江北岸的一小片地方，叫作
十三行。

马礼逊的第一道难关是学中文。当时的中国，洋人学中文是犯法。中国人教洋人中文，则以汉奸罪论处。

马礼逊出高价聘来一位不要命的中文老师。这位老师随身带着毒药，一旦被发现，就服毒自杀，以免遭酷刑。为了保护他，马礼逊每天晚上上课。

在广州生活和学习花费很高。马礼逊住在一间仓库，节衣缩食，一日两餐，导致严重的营养不良。

他在常人难以想象的孤独中，一年寄出200封信，只收到两封回信。他说：我身边没有一个可以视为朋友的人。

上帝是他唯一的依靠。他在日记中鼓励自己：我的灵魂啊，你要靠着上帝刚强起来。不要怕，只要信！



马礼逊给父亲的信 1807年

刚强的信心产生顽强的毅力，两年后，马礼逊已经可以熟读《四书》，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广东话。

为了在中国合法居留，他应聘担任东印度公司的翻译员，同时编纂《华英字典》，业余时间翻译《圣经》。

林治平：马礼逊在早期会有一些人误解他，因为他是东印度公司的翻译官。而东印度公司在中国从事经济贸易，到后来东印度公司卖鸦片，到十九世纪后卖鸦片卖得很严重。所以他们说，你看这个基督教的第一个宣教士，就是在中国从事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卖鸦片给中国的，这个很可恶的东印度公司的翻译官。这个证据确凿。但是，在当时，满清政府对外国人是关闭的。除了你来做生意，换句话说，除了你是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你就没办法进到中国本土。



东印度公司

马礼逊痛恨东印度公司走私鸦片。他说，这无论对英国的国旗，还是对基督教国家的国格，都是奇耻大辱！

当时的马礼逊，里面孤独，外面艰难，交织在一起，几乎令这位只身闯入中国的拓荒者垮掉。

1813年出现转机，马礼逊与玛丽在澳门结婚。与此同时，英国宣教士米怜夫妇，前来协助他。

1814年，马礼逊来华7年后，才在僵硬的大地上培育出第一株嫩芽。7月16日，秘密帮他印刷圣经的工人蔡高，在澳门接受洗礼，成为中国第一名基督徒。

不久，蔡高的兄弟蔡兴和蔡三也相继受洗。

1818年，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建立英华书院，开创了对华教育的先河。



英华书院

1819年11月25日，马礼逊和米怜写信报告伦敦传教会，新旧约圣经全部翻译完成。

马礼逊翻译圣经用了12年零3个月。他说，古时神的仆人在黑暗的监牢里，给后人带来光明；但愿我孤苦的辛劳，将来能祝福亿万中国人。一想到这里，心中就快乐了。



《神天圣书》



马礼逊圣经

Christopher Hancock: 1820年, 广东发生了一场大火。他看到中国邻居们完全不顾周围的人, 心里很惊讶。这件事引导他开始思考, 怎样将爱带给中国人, 怎样通过实际的爱, 让中国人理解基督教信仰。他心中有了一个清楚信念, 就是福音需要活出来, 而不仅仅是说出来。

1820年, 马礼逊与李文斯顿医生一起开办中国第一家西式诊所, 服务贫穷的中国人。诊所后来发展成博济医院。

1821年, 马礼逊教堂在澳门建立。这座中国最早的基督教堂, 至今完好的座落在澳门的马礼逊墓园里。

Christopher Hancock: 他讲了许多道, 非常精彩。在他的讲道里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神爱世人, 不仅仅是爱教会。神不偏待人, 他超越文化语言肤色等等的不同。神爱世界, 神爱世人。这是马礼逊宣讲的伟大信息之一。他说, 我们到中国来, 不应该试图改变中国文化。不是来说, 我们比中国好。我们是来爱中国的。

1823年, 马礼逊编完《华英字典》即《五车韵府》。这是中国第一部中英大字典, 共4595页。它的出版, 对西方的汉学研究, 意义重大。



马礼逊字典
《五车韵府》

同一年, 马礼逊按立了中国第一位本土牧师梁发。梁发是在马六甲



梁发

跟随米怜夫妇信耶稣的。此后他传道40年，被囚受刑，忠心不移。第一本由中国人撰写的福音小册子《劝世良言》，作者就是梁发。

马礼逊给中国教会和中国社会开创了许多第一。然而在每一捧小小的收获背后，都隐藏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付出。

1819年，中文圣经译完前半年，米怜的妻子丽切尔在接连失去两个孩子后，自己也害热病去世。

两年后，马礼逊的妻子玛丽感染霍乱去世，去世时，年仅29岁的玛丽腹中正怀着孩子。

马礼逊悲痛欲绝，他写道：我绝不对自己说“莫伤心！”不，绝不！我要为玛丽伤心！我要痛哭！因为她值得我如此！

马礼逊将一双年幼的儿女托付给朋友，独自一人住在广州。

Christopher Hancock：我读到马礼逊的一些未发表的信件，写给他孩子的小纸片，末尾亲昵地署名爹爹、爸爸。你顿时发现，这个在世界上无比刚强、坚定、干练、专注的男人，



米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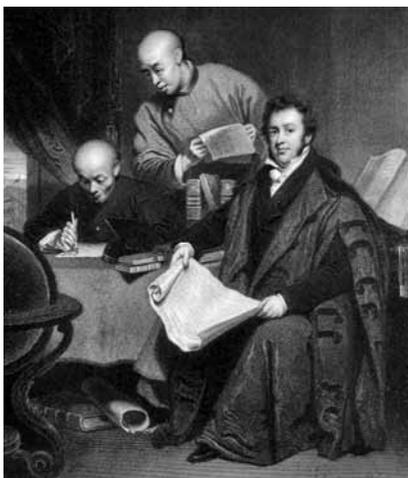
原来有如此温柔的一面。

不到两年，马礼逊唯一的同伴米怜，积劳成疾，突然去世，年仅37岁。

马礼逊写道：9年前，我和妻子欢迎米怜夫妇的到来。如今我们四人中，有三人不到40岁就离世了，留下我一人在这里。然而当我想到，他们都是在福音岗位上、在应许和盼望中离世的，我就深感欣慰。我在这里虽然举目无亲，但我仍要感谢神。

那时，应马礼逊的请求，许多教会为他祷告，求神恩待他，恩待中国人，延长他这个当时世界上唯一精通中文的宣教士的寿命。

米怜离世后，马礼逊继续在华宣教11年。1834年7月30日，长期被头痛折磨的马礼逊，病倒在广州，8月1日晚逝世，享年五十二岁。



马礼逊

马礼逊的遗体由长子马儒翰护送至澳门，安葬在妻子玛丽身旁。

马礼逊在华27年，是中国基督教最艰难的开拓期。27年间，只有10个中国人受洗。

马礼逊离世一年后，1835年，长子马儒翰与裨治文牧师一起写信通报，第一间华人基督教会在广州建立，共有成员12人：



马礼逊长子马儒翰

梁发，48岁，牧师。

屈昂，50岁，牧师助理。

黎氏，31岁，梁发妻。

梁进德，15岁，梁发子。

梁亚沾，11岁，梁发女。

梁亚新，梁发助手。

李新，31岁，砖匠。

周亚生，25岁，制笔匠。

吴亚清，31岁，印刷助手。

梁亚道，28岁，制笔匠。

刘庶泉，38岁，秀才。

赵清，秀才。

第二章 撒种期

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1840—1900）

马礼逊死后6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无情的炮火轰开了中国的大门。

1842年8月29日，中国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个口岸。此后，又与美国和法国等国签订《望厦条约》、《黄埔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等。



麦都思

所有条约中都有一条：允许西方宣教士进入中国通商口岸。在此前后进入中国的有：

麦都思，第一个到上海的宣教士，创办了第一份活版铅字杂志《各国消息》。



台约尔

台约尔，戴德生的岳父，研制出当时最好的三千个金属中文活字。

裨治文，第一位来华的美国宣教士，曾给林则徐当翻译，参与《望厦条

约》的签订。1854年前往考察太平天国是否合乎基督教，予以否定。



郭实腊

郭实腊，第一个去过内地的宣教士，杰出学者，中文著作61本，英文、德文、荷兰文、日文著作23本。他参与了《南京条约》的签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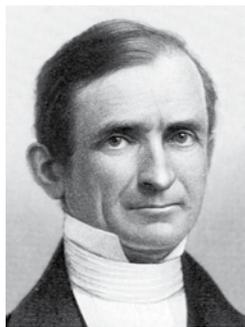
卫三畏，宣教士、外交官、汉学家，其著作《中国总论》被视为美国汉学研究的开端。参与《天津条约》的签订。

伯驾，第一位来华医疗宣教士。创立广州眼科医局和博济医院。曾任美国驻华大使。



罗孝全

罗孝全，来华向麻疯病人传福音。1847年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请求在他的广州教堂受洗，被他拒绝。



裨治文



卫三畏



伯驾

1854年，戴德生来华，将福音从沿海大踏步推向内地。

戴德生17岁决定献身传道，经过4年的医学和体质训练，21岁告别家人，坐船156天来到上海。

他租用一所民宅，兼作诊所、学校和教堂。又与别的宣教士结伴，十八次在江浙两省旅行，一边行医，一边传道。

戴德生不顾一些西方人的反感，穿中国衣，吃中国饭，还剃头染发，蓄了一条大辫子，毫无顾忌地接近中国人。

林治平：他这样一个举措，对戴德生带来非常大的麻烦。因为当时那些西方的传教士们，他们是英国人。我们知道，英国人讲究绅士风度。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服装，他们的仪表，他们有他们的一套。这样穿才算是一个绅士，那样就不行。所以，当戴德生穿上中国衣服，尤其留上那条小辫子以后，外国人简直受不了。说，你好好的人，怎么留一个猪尾巴在头顶上？简直受不了。所以，戴德生当时跟玛丽亚谈恋爱的时候，他就遭遇到很大的困难。玛丽亚当时的监护人就是艾德绥。Aldersey是一个很好的宣教士，她也拼命反对。我们说，艾德绥是一个非常爱中国的一个宣教士啊，她办了学校，特别办女子教育，在中国她的贡献很大很大的。可是，她反对玛丽亚跟戴德生在一起交往。她觉得，主要的理由是，从她的角度来看，戴德生数典忘祖，忘了我们英国人的尊严，忘了我们英国人的骄傲，忘记了我们英国人的那些东西。戴德生规定，内地会的宣教士一律都要穿中国衣服，都要留辫子。为了这个缘



戴德生

故，有些人退出了内地会。

戴德生说：我们不是要消除中国人的民族观念，而是希望他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盼望看到他们既是真正的基督徒，也是道地的中国人。



戴德生的家乡班斯莱镇



童年戴德生及妹妹与母亲

当时正闹太平天国和小刀会，战乱四起，瘟疫流行。1858年，戴德生失去第一个孩子，妻子玛丽亚的姐姐、同工帕克的妻子也因病去世。

从马礼逊到戴德生，200多位来华宣教士中，有40位宣教士和51位妻子病死。进入内地的宣教士，平均存活只有7年。

1860年，戴德生在宁波的教会已有21人，但他身患重病，极度虚弱，不得不返回英国接受治疗。

Tony Lambert，前英国驻华外交官、内地会史学家：我们必须承认，戴德生有非常艰难的时刻。据我所知，他一度接近精神崩溃的边缘。他好几次身体很糟糕。妻子去世，那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带来的同工纷纷死於疾病和环境。他经历痛苦很深，但是在所有痛苦中，他知道主与他同在。所以我认为，他的信仰非常深，非常真。



戴德生 1860年



戴德生与妻子玛丽亚

在英国，他常常看着中国地图，为他服侍过的地方祷告，也为福音还没传入的内地十一个省份祷告。

1865年的一天，戴德生在布莱顿参加一场千人聚会，他眼前是一张张英国人喜乐的脸庞，心中却是一张张中国人饥渴的面孔。他默默向神祷告：主啊，请差派24名宣教士到中国内地，11个省加上蒙古，每地2人。

第二天，戴德生在伦敦以中国内地会名称，建立了一个银行账户，存入十英镑。他说，这不仅是十英镑，这是十英镑加神的全部应许。

1866年9月，戴德生一家和内地会首批16名宣教士抵



内地会福音进展图



内地会首批宣教士

达中国，在杭州新街弄一号设立了中国内地会总部。

第二年，戴德生按立一名中国牧师王来君，来照管杭州教会。自己则带领宣教士们，向内地十一个省进发。

此后二十年，内地会来华宣教士137人，建立45间教会，141个布道所，为1764人施洗。

与此同时，西方教会各宗派，纷纷派人来华。到1894年，来华宣教士已经达到1324人。



王来君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885年，剑桥

大学7名学生一起来华，称作剑桥七杰。他们深入山西、四川、甘肃、西藏等地，办教育、传福音，将青春献给了中国。他们是：

施达德，著名板球手。

司米德，圣三一学院划船队长。

何斯德，皇家军事学院将军之子。

章必成，男爵之子、划船选手。

盖士立，圣公会牧师。

杜明德，上校之子。

杜西德，杜明德兄弟。



剑桥七杰合影

到20世纪初叶，宣教士的脚步已经踏遍中国的每一个省份。所到之处，不仅带来福音，也带来了音乐、文化、教育、医疗、慈善等等。

宣教士们虽然是带着爱来中国，但毕竟是借助强权、乘着硝烟、在民族冲突中进来的。猜疑、敌视和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令中国人渐渐将怒火转向宣教士，各地反教活动频频发生，史称教案。

自鸦片战争后，全国各地发生大小教案400多起，直到爆发震惊世界的义和团运动。

1900年夏天，以扶清灭洋为口号，从山东、山西到湖南、浙江，义和团一个月内杀害了241名西方宣教士和两万多名中国基督徒。



北京住宅被焚烧



慈禧

北京近万家住宅被焚烧。日本和德国驻北京大使被刺杀。5月24日，慈禧下令向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发动总攻击。25日，慈禧向所有邦交国宣战。

接下来，日、英、美、法、俄、德、奥、意八国联军6万人，攻陷天津，闯入北京。清廷被迫签订屈辱的《辛丑条约》。

在那个残酷的时刻，西方宣教士与他们的政府截然不同；他们效忠的，是差派他们来华的耶稣基督。他们没有仇恨，没有反抗，甚至没有抱怨。

在内蒙古殉道的林牧师在遗书中写道：我们手中有武器，但我们不能使用它们。若是神的旨意，我们就甘心殉道。



殉道者贝如意



殉道者毕得经

来自耶鲁大学的毕得经牧师在河北保定殉道，遇害前给妻子留下一封信，埋在教堂地下，上面写着：亲爱的，你要告诉我们的儿子小何理，他父亲最后的遗愿是，当他25岁时，要以宣教士的身份回到中国来！

28岁的艾瑞延女士遇难前写给家人的信中说：我全心全意热爱中国人，只想留在他们当中。我把一切交给主，欣然对主说：愿你的旨意成全！

庚子教难中，来自美国欧柏林大学的13名宣教士和5个孩子在山西遇难，其中一位艾德华师母在遗嘱中说：亲爱的，我相信你们不会忘记躺在中国土地上的我们。我一点也不后悔来中国，只是遗憾为她做的事太少了。

义和团事件中，内地会58名宣教士和21个孩子遇害。当

时正在瑞士养病的戴德生心如刀割，无法承受。他说：我不能看书，我不能思想，我甚至不能祷告；我只剩下信靠。

根据《辛丑条约》，清政府给予各国宣教士以巨额赔偿。戴德生代表内地会声明放弃索赔。

Tony Lambert：根据和慈禧太后签订的条约，许多国家向中国索赔。戴德生却说，不。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基督。我们知道有风险，我们来中国前，就预料到这个危险，我们决不向中国要一分钱。所以义和团事件后，内地会没有接受任何赔款。我认为，这是上帝喜悦的。因为，这就在帝国主义列强和基督的福音之间，清楚地划了一道界限。否则，两者就混淆了。



戴德生、杨格非、丁韪良



戴德生晚年

这一声明震撼了世界，激起了更壮烈的宣教浪潮。义和团事件7年后，在华宣教士增加到3833人。

1905年，戴德生在长沙逝世。他21岁入华，服侍了中国56年。他和妻子，四个孩子，长眠在这块他们深爱的土地上。他

的一代又一代后人，用生命的长链，兑现着他的一个承诺：

我若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中国，是基督！这样的救主，我们为他所做的，会嫌太多吗？



戴德生的曾孙戴绍曾和玄孙戴继宗



《带着爱来中国》

林治平：戴德生的传记在人民日报出版。那本书叫做《帶著爱来中国》。我觉得那个书名写得非常的好。帶著爱，爱是什么？爱生命，爱每一个不同的人。

第三章 扎根期

义和团以后（1900—）

显然，只要基督教在中国人眼中还是洋教，就无法在中国扎根。戴德生早就说过，宣教士是手脚架，房子建好就得拆掉。

梁家麟，香港建道神学院院长：中国人常常讲“洋教、洋教”。“洋教”这个字，已经代表着他们是抗拒基督教作为一个西方来的宗教。但它不单单是来源的问题，是它的外观，它的内容，都是西方的。而这个是构成一个很大的文化的拦阻，让他们不能跨过去。所以我想，宣教士也在思考怎么样去本土化。包括比如说，怎么样有效地把福音用中国人能明白的方法传开。他们最终还是希望福音能在中国扎根，希望能栽培本土的信徒，本土的传道人的。



和合本圣经翻译委员会

1919年，在宣教士狄考文和富善带领下，经过28年翻译，至今通行的和合本圣经问世。圣经66卷书，囊括各种文体，是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先锋。

1907年，马礼逊来华100年时，西方各宗派在上海召开第三届宣教士大会，取得一个共识，就是中国必须建立自治、自传、自养的本土教会，外国人应逐渐淡出中国教会事务。

宣教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只有当种子死去，地上才能结出百倍的子粒来。

历史绝非巧合。正是在1900年宣教士殉道的血泊中，诞生了几个婴孩，后来成为中国本土教会的领袖。他们有：王明道、杨绍唐、宋尚节、计志文、倪柝声等。

义和团之后，还有神学家贾玉铭、布道家王载、灵粮堂赵世光、耶稣家庭敬奠瀛、中华归主赵君影等一大批本土传道人成长起来。

中国调子加中文歌词的圣诗也流传开来。

林治平：我曾经收集到早期的家庭教会，在河南的家庭教会，他们唱的一首叫做《想念灵同胞》。那个词就很怪，“想念灵同胞，眼泪往下掉，你今天早上起来有没有读经，有没有祷告。”想念灵同胞，眼泪往下掉……我怎么听也不像圣歌。我后来发现，哦，原来是我被圣歌符号化

了，symbolized。所以我以为，圣歌一定要“圣哉、圣哉、圣哉”才是圣歌。但是，当我忽然间转过来，我说，噢，这是中国乡村农家在唱的，把他们心里的那个苦难，弟兄姐妹隔离的那种不能彼此问安的感觉唱出来。难怪他们一边唱一边哭。当我撇弃掉我过去几十年的基督徒的经验，我进到他们里面去，我就忽然发现，哇，那是另外的一种感觉。我自己唱我也会哭。就是你进到里面去了。

本土化的语言，本土化的体悟，本土化的情感，有如长江黄河，涌流神州，形成一派本土气候。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当时，1200名西方宣教士被日军关进潍坊集中营。1945年日本投降，只剩下600名。1952年后，全部撤离中国。

林治平：上帝是掌管一切的。所有的历史，都是His story。都是他的历史，都是上帝的历史。所以有些东西，在某一个阶段发生，我们用我们的理智去想想不通，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上帝是超越我们的理智的。这些东西要等到回头去看，过了若干年以后回头去看，才恍然大悟：原来有这个道理在。把宣教士赶逐出去，我们也不要从完全负面的角度去看，因为这个缘故，就逼迫着中国教会也必须思考到本土化的问题。

种子已经死去，果实已经累累。上帝让他们走了，留下的是他们生命的凯旋，是他们爱心的烂漫。

中国的基督徒奇迹般地增长着。1834年马礼逊去世时，只有10人。1906年马礼逊来华100年时，有17万人。今天，马礼逊来华200年后，中国基督徒已有几千万！

今天，基督教在中国，再也不会像唐朝如影掠过，不会像明清如风吹过，因为它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种信仰。

当我们满怀信心迎接未来的时候，决不能忘记过去宣教士们洒下的热血。在他们的热血里，滚动着上帝对中国人永远的爱。

来华宣教拓荒者名单：

广州

1807年，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1830年，裨治文 Elijah C. Bridgman

上海

1831年，郭实腊 Karl F. A. Gutzlaff

1843年，麦都思 Walter Henry Medhurst

福建

1841年，雅裨理 David Abeel

1842年，文惠廉 William J. Boone

香港

1842年, 罗孝全 Issachar J. Roberts

1843年, 理雅各 James Legge

浙江

1843年, 玛高温 Daniel J. MacGowan

1857年, 戴德生 James H. Taylor

江苏

1845年, 文惠廉 William J. Boone

1867年, 童跟福 George Duncan

北京

1861年, 雒魏林 William Lockhart

1863年, 丁韪良 William A. P. Martin

山东

1861年, 倪维思 John L. Nevius

1862年, 梅理士 Charles R. Mills

湖北

1861年, 杨格非 Griffith John

1865年, 李修善 David Hill

湖南

1863年, 郭修礼 Josiah Cox

1875年，都天德 Adam C. Dorward

台湾

1865年，马雅各 James L. Maxwell

1871年，马偕 George L. Mackay

吉林

1866年，韦廉臣 Alexander Williamson

1908年，古约翰 Jonathan Goforth

辽宁

1867年，宾惠廉 William C. Burns

1882年，司督阁 Dugald Christie

四川

1867年，维吉尔·哈特 Virgil Hart

1868年，伟烈·亚力 Alexander Wylie

黑龙江

1868年，韦廉臣 Alexandra Williamson

1923年，盖群英 Alice Cable

冯贵珠 Evangeline French

冯宝珠 Francesca French

河北

1869年，谢卫楼 Devello Z. Sheffield

安徽

1869年，密道生 James J. Meadows

内蒙古

1870年，景雅各 James Gilmour

天津

1872年，明恩溥 Arthur H. Smith

河南

1875年，戴亨利 Henry Taylor

1934年，艾得理 David H. Adeney

山西

1876年，秀耀春 Francis James

1876年，德治安 Joshua J. Turner

陕西

1876年，鲍康宁 Frederick W. Baller

1876年，金铺仁 George King

西藏

1876年，康慕伦 James Cameron

甘肃

1877年，义世敦 George F. Easton

1877年，巴格道 George Parker

广西

1877年，爱德华 Edward Fisher

云南

1877年，麦卡悌 John McCarthy

1887年，柏格理 Samuel Pollard

1908年，富能仁 James O. Fraser

贵州

1877年，祝杨名 Charles H. Judd

1877年，巴子成 James F. Broumton

江西

1881年，库思非 Carl F. Kupfer

新疆

1906年，胡进洁 George W. Hunter

宁夏

1917年，兹威默 Samuel M. Zwemer

1936年，毕敬士 Claude L. Pickens

青海

1915年，胡立礼 Harry F. Ridley

1921年，柏立美 Victor G. Plymire

迦南诗歌第868首
《大海啊能否告诉我》

大海啊大海，
能否告诉我，
有多少宣教士来到中国？
不同的语言肤色，
却深深爱着中国。
在误会中渡过，
将生命献给中国。
他们为了什么？
他们为了什么？
每一座高山、每一条小路也这样问过。
他们是一粒粒麦子，
埋在了苦难的中国，
中国才有今日的收成，
漫山遍野的硕果。
弟兄啊同胞啊，
我们要永远记得，
他们是上帝的使者，
带着爱来到中国。
高举燃烧的圣火，
走遍每一个角落。
蓝蓝的大海边，
是谁唤醒了中国？

你们是世界的光。马太福音 5:14

第三部

光 照

教 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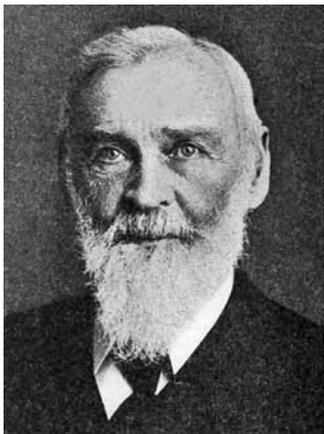
士

序言

1881年，创办中国第一所大学前身、山东登州文会馆的美国宣教士狄考文，在校园里点亮了中国第一支电灯。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前景无比美好。我很庆幸有机会为她迈向辉煌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狄考文1906年11月27日给詹姆斯·穆尼的信。



狄考文

当太阳升起来，它照亮的不仅仅是教堂。上帝的使者给中国带来的，是世界的光。

利玛窦来华，不仅带来了天主教教义，也带来了科学与文化。马礼逊来华，不仅翻译了第一本圣经，建立了第一间教会，也创办了第一所学校，第一家医院，编纂了第一本《华英字典》，印刷了第一本中文期刊。

第一所孤儿院，第一所聋哑学校，第一套盲文，第一个戒毒所，第一份报纸，第一个实验室，第一所女校，第一支球

队，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中国许多第一都与宣教士有关。连第一个发现大熊猫的阿尔曼·大卫，也是一名法国宣教士。



阿尔曼·大卫

毫不夸张地说，在近代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人们都可以发现宣教士尘封的脚印。

第一章 创办现代教育

今天，中国已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高等院校达2000多所。每年出国留学生40万，名列世界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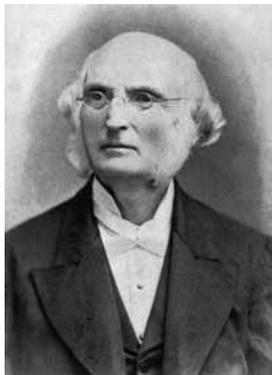
然而谁能想到，据李提摩太统计，100多年前，在4亿多人口的大清帝国，有高等阅读能力的只有4万人，不到万分之一。

最早的一间华人学校，是1817年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创办的，名为英华书院，开始只有3名学生。

十年后，第一位中国牧师梁发和他的同乡古天青一起，创办了内地第一所学校。

又过了十年，德国宣教士郭实腊夫人和美国耶鲁大学的包留云，在澳门建立第一所西式学堂，马礼逊学堂。一开始只有6名学生，其中包括第一批赴美留学的容闳、黄宽、黄胜。

林治平，宇宙光创办人，台湾中原大学教授：包留云，教书一段时间后，他身体也是受不住了，他就要回



包留云

美国。他就问他的学生说，你们谁愿意跟我到美国去读书的？那个时期没有什么人愿意到美国来，拜夷人为师这是数典忘祖的事。但是，当时有三个人，黄胜、黄宽是兄弟俩，再加上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容闳。容闳就跟他一起来到这边，进到耶鲁大学。黄宽后来就到爱丁堡大学，读到医学的学位，后来成为中国的第一一个西医。



容闳

然后容闳回到国内以后，他就开始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带领幼童出国。他觉得，要从小给他们接触西方，让他们了解西方。这是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一个扎根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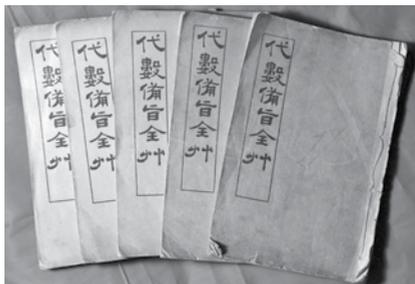
这里面又出来了一些重要的人物。譬如说，我们说工程师之父詹天佑，就是他当时带出去的学生。民国时期的国务总理唐绍仪，也是他带出去的学生。清末民初，从事现代化建设很多重要的人物，都是他带出去的学生。这个当然也影响到以后的学习西方的潮流，民国以后的很多留学潮，一直到今天。

1842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宣教士在中国建立了学校共50所。鸦片战争后，随着《南京条约》和《北京条约》的签订，到1877年，教会学校达347所。

这一年，西方宣教士召开第一次全国大会，决定成立教科书委员会，编写统一教材。此后，在宣教士林乐知、傅兰雅、狄考文、丁韪良、韦廉臣、黎力基等带领下，编写教材59

种，出版约三万册。

中国的高等教育比西方晚了几个世纪。使中国的高等教育与世界接轨的，也是西方宣教士。



狄考文编写教材

宣教士狄考文于1864年在山东创办登州蒙养学堂，招收了6名家境贫寒的学生，为他们提供衣食和文具。1876年改名文会馆，后来演变成中国第一所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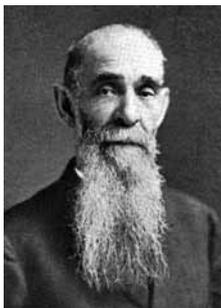


狄考文创办的文会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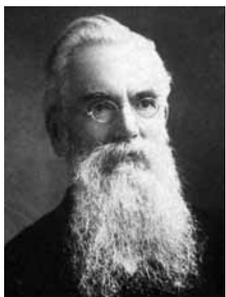
另一位美国宣教士郭显德，在烟台创办了40多所学校，

并建立医院和博物馆，先后受到清朝光绪皇帝和民国袁世凯总统的嘉奖。

英国宣教士傅兰雅，1866年建立中国第一个科学班，1874创办第一所理工学校“格致书院”，1875年出版第一份科学杂志《格致汇编》，并翻译了一百多种科学书籍。



郭显德



傅兰雅

在中国南方，最早的大学是由美国宣教士施若瑟于1879年开办的上海圣约翰书院。

宣教士早期在中国创办的大学还有：

1888年，南京汇文书院

1889年，北京潞河书院

1897年，杭州长老会学院

每一所大学开始时都非常艰难。汇文书院初创时，只有三个男生入学。作为他们上大学的奖赏，学校每天付给他们一碗米。

不像今天是学生申请学校并缴纳学费，那时是学校邀请学生并养活他们。

学校的办学经费，大多来自宣教士家乡教会的募捐，每

一块钱都凝结着万里之外的一份爱。

到1900年义和团前夕，宣教士在中国建立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已达2000所。

义和团惨案给初兴的中国教育带来了灭顶之灾，各地学校惨遭破坏。

英国宣教士李提摩太率先说服本国政府，用清廷赔款创立了山西大学堂。



山西大学堂信笺

美国宣教士明恩溥等人，游说美国国会，用赔款创办了清华学堂，即清华大学前身。

西方各国纷纷仿效，不仅用部分赔款在中国办学，而且迫使中国政府改革陈腐的科举制度，设立理工科目，开放出国留学。

短短十几年后，据1918年统计，宣教士在中国建立的学校，已从义和团前的2000所，猛增到7382所。

先前，李提摩太曾向李鸿章建议，中国政府应该每年拨出100万两银子投资教育。李鸿章回答说，政府拿不出这么多钱。李提摩太说，这是“种子钱”，将来会有百倍的回报。李鸿章问，什么时候能看到回报？李提摩太说，大概需要20年。李鸿章摇头说，啊！我们可等不了那么久。



李提摩太



李鸿章

李鸿章和李提摩太都没想到，义和团事件导致清朝政府大赔款，大赔款用于中国教育的大发展。这等于强迫政府拿出一大笔教育投资来。

圣经说：撒种有时，收割有时；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1949年7月4日，在刘少奇写给斯大林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仅英美两国在中国设立的大学就有31所，图书馆29所，中学324所，小学2364所。



北京协和大学1916年

第二章 建立大学体系

宣教士在中国创办的著名大学有：

北京燕京大学，由美国和英国教会于1919年联合创办，首任校长为美国宣教士司徒雷登。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后来文理学院并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并入清华大学。校址现在北京大学。



司徒雷登于燕京大学

上海圣约翰大学，第一所在美国华盛顿注册的中国大学，包括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院、农学院、神学院。校训是：光明与真理。后来各院系划入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上海交大等。校址现在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沪江大学，美国浸信会创办，设立中国第一个社会学系，后来归入华东师范大学。校址在上海理工大学。校训是：信、义、勤、爱。

南京金陵大学，美国美以美教会创办，南京大学前身，校址现在南京大学。

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美国多家教会联合创办，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1919年首届毕业生5人。至1951年归入南京师范大学，共有999名女毕业生，人称中国的999朵玫瑰。



南京金陵女子大学

山东齐鲁大学，美国长老会和英国浸信会等联合创办，包括文、理、医、农、天文、生物、经济、教育的大型综合大学，后来归入山东大学和南京大学等，校址现在山东大学。

江苏东吴大学，美国监理教会创办，以法学和生物化学领先，演变成今日江苏大学。1951年在台湾复校，即台湾东吴大学。

杭州之江大学，美国长老教会创办，后来归入杭州大学和浙江大学。校址现在浙江大学。

广州岭南大学，美国长老教会创办，后来归入中山大学，校址现在中山大学。

成都华西协合大学，美国英国加拿大教会联合创办，中国西部第一所综合大学，后来并入四川大学，校址现在华西医学中心。

武昌华中大学，后来并入华中师范大学，校址现为湖北中医学院。

长沙湘雅医科大学，由耶鲁大学宣教士创办，后来归入湖南医科大学、中南大学。

福建协和大学，由美以美会创办，为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的前身，校训是：博爱、牺牲、服务。

福建华南女子大学，由美以美会创办，为福建师范大学前身之一。

天主教在中国创办的大学有：

天津津沽大学，河北大学的前身，校址现在天津外国语大学。

北京辅仁大学，1951年并入北京各大学，校址现在北京师范大学。1961年在台湾复校。

上海震旦大学，后来并入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同济大学等。

第三章 开文化之先河

林治平：很多学者都已经公认，我们要找出中国现代化的媒介人物，叫做 intermediary person。这个媒介人物，当时西方人来媒介今天的现代化，有三种人有可能：一个就是军人，来打仗的，政客，打完仗他们就走了。第二种就是生意人，做完生意赚完钱，他们也走了。只有一种人就是宣教士，一方面他们受了很好的当代的训练，一方面他们深入到中国的基层社会里面，他们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有些宣教士名垂青史。

我们永远不应忘记，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蒙昧走向文明，领我们迈出第一步的是上帝的使者。

1815年，英国宣教士米怜在马六甲刊印第一份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1823年，英国宣教士麦都思创办第一份活版铅字中文月刊《各国消息》。

1832年，美国宣教士裨治文在广州创办第一份英文期刊《中国丛报》。

1833年，德国宣教士郭实腊在广州创办第一份中文报纸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1870年，英国宣教士李提摩太来华，创办当时影响巨大的广学会，出版《万国公报》，宣教士林乐知担任主编。



《万国公报》



林乐知

维新变法的领袖康有为，是《万国公报》的忠实读者，他参加过该报在1894年举办的征文。康有为说：我信仰维新，主要归功于宣教士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的著作。

另一位维新变法领袖梁启超，曾经担任李提摩太的私人秘书。他有一份推荐给中国人的《西学书目表》，其中基督教广学会出版物二十二种，首选为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和林乐知主编的《万国公报》。

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当时交由《万国公报》发表，可见这份报刊的影响之大。

林治平：我想讲一个比较有争论的人物——丁韪良。在宁波宣教十年，他也了解中国的文化。他写了那本很有名的书，叫《天道溯源》，这本书在日本也很通行。



丁韪良

当时1858年跟1860年，所谓英法联军之虞，跟着美国公使在天津条约谈判和北京条约谈判，他就成为美国公使谈判的翻译官。哇，这个罪名可大了。后来我们去查他的资料就发现，在条约谈判过程中，他发现中国人完全不懂国际法。所以他得到一个结论，中国人是在谈判中，接受绝对不应该接受的，拒接绝对应该接受的。

举例而言，譬如说，领事裁判权，这是丧权辱国的大条款，中国人很快就接受了。中国人说，很简单哪，自古以来，华夷分治，夷人管夷人，华人管华人。所以领事裁判权就同意了。丁韪良急得跳脚，没有用。

可是，他觉得中国人最该接受的，比如说，两国互派大使，建立外交关系。这个是太好了嘛，但是，中国政府坚决就是不肯。为什么呢？他说中国人觉得，夷人其貌不扬，入京有碍观瞻，拒绝了。哇，他说这怎么得了！

所以后来他就去学，专攻国际法，取得国际法的博士学位。他就开始翻译国际法给中国。他觉得中国如果不懂得国际法，中国跟外国人交往一定会吃很大的亏。中国国际法的开端就是丁韪良。因为第一本国际法的书《万国公法》就是丁韪良写出来的。

他觉得中国需要办好的教育，让中国人能够懂得外国的语文，可以跟外国人交往，彼此了解。所以后来在条约里面就定下来，要成立同文馆，希望训练中国的语言人才。他也花了很多功夫去请了很多不同的老师，包括科技的、化学的、医学的都请来了。但是结果招生没有人来考。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科举考试不会考这些东西。



同文馆

丁魁良觉得，要救中国，就要改革中国的考试制度，所以他就开始反对科举考试。后来梁启超、康有为他们就跟他很接近，所以后来在变法运动中，就把科举考试取消了。这是中国不得了的一件大事，其实丁魁良在背后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第四章 让世界了解中国

宣教士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也让中国影响了世界。

早在19世纪初，马礼逊就在英国建立了第一个中文班。

苏格兰宣教士理雅各，是第一个系统研究中国古经的人。从1861年到1886年，他用了25年时间，将四书五经等28卷中文经典译成英文。



理雅各和助手们

林治平：这个人的功力就吓人了。他把中国的十三经全部翻译成英文，我们现在连十三部经是哪十三部我们都说不出来。他可以把十三部经都翻译出来，加上注释。我看过他那本书。上面小小的一段，譬如说，孟子见梁惠王，他就翻译。然

后下面很多页，全部都是历代的注解。哇！这个功力深到不可思议嘛。后来他退休以后，就回到牛津大学，在牛津大学创办牛津大学中文系，成为最早的伟大的汉学家。

他们这一系列，苏惠廉作过理雅各的学生。然后，苏惠廉后来退休了，也去那边教书，教出了一个很有名的，当代最有名的学者，就是哈佛大学的费正清，Fairbank。这是一脉相传哪。所以汉学，我们说今天整个欧美的汉学，其实传教士是最重要的。

生长在中国农村的宣教士之女赛珍珠，写出《大地》三部曲，生动地描绘了中国的的风土人情，因此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



赛珍珠

第五章 倡导禁烟戒毒

19世纪，吸食鸦片就像癌细胞一样在中国扩散着。

西方宣教士一致谴责鸦片贸易。首位医疗宣教士伯驾于1840年写信给林则徐，称之为令人担忧的罪恶。

美国宣教士丁韪良1856年出版专著，剖析鸦片的道德和法律问题。

汉学家理雅各警告英国政府：停止作恶，学习行善！

戴德生说：鸦片贸易一个星期对中国人所干的坏事，抵消了宣教士们一年时间所干的善事而绰绰有余。

1874年，西方宣教士成立“禁止鸦片贸易协会”，要求在华宣教士向本国政府写信，呼吁禁止鸦片贸易。

1895年，杜步西等1000名在华宣教士，联名上书清廷和英美政府，获得美国国会和万国禁烟会的支持。

正是在宣教士的强大影响下，中美《望厦条约》才明确规定鸦片为违禁品。

宣教士一面施压政府禁烟，一面帮助人们戒烟。1871年，宣教士在杭州设立第一家戒烟所，到20世纪初，全国已有一百多所。

英国宣教士李修善，带领山西儒生席子直战胜了烟瘾，席子直改名席胜魔，在山西各地建立“天招局”，帮助无数人成功戒毒，传为历史佳话。



席胜魔

第六章 引进体育精神

150年前，西方列强曾嘲笑中国人是东亚病夫，而西方宣教士送来了体育精神。



李爱锐

1876年，基督教青年会进入中国，引进和推广近代体育项目，包括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网球、棒球、田径、游泳、跳水、体操等等。

1925年，奥运冠军、宣教士李爱锐从英国来到天津，指导创建了当时世界一流的民园体育场，引来不少国际大赛。

1932年，推动中国人第一次进入奥林匹克运动的，正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董事王正廷。



王正廷

第七章 让妇女得自由

中国妇女缠足的陋习由来已久。1874年，英国宣教士麦嘉温在厦门创立中国第一个反缠足组织，1000多名妇女签名。

1895年，李提摩太师母等在上海发起天足会，借书刊和集会号召中国女人回归天然。



宣教士为缠足妇女松绑缠带

教会学校的师生，读圣经的妇女，没有一个缠足的。

宣教士林乐知大声疾呼：妇女不得自由，中国休想振兴！

胡适感慨说：忽然从西方来了一些宣教士，除传教以外，还带来了一点新风俗，几个新观点，不少新教训，其中最



艾德绥

大的一点，是教我们把女人也当人看待。

虽然中国女人受教育的权利1907年才得到清政府的承认，但早在1844年，宣教士艾德绥就在中国宁波建立了第一所女子学校。

1850年，宣教士裨治文夫人在上海设立裨文女塾，即今日上海九中。这所学校的学生中，有一位罕见的大脚女生名叫倪桂珍，她是明朝基督徒、大学士徐光启的后代。倪桂珍后来生了三个女儿，她们是：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倪桂珍的丈夫，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嘉树，原来是一位牧师。



倪桂珍与三个女儿

1905年，宣教士们在北京灯市口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华北女子协和大学。后来又创办了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为中国培养出最早一批女大学生，包括作家冰心等。

宣教士丁韪良在《古老帝国的觉醒和重生》一书中预言：不久，中国人将从母亲的膝盖上开始受教育。这一预言早已由无数中国母亲们实现了。

第八章 兴办慈善事业

在公元第三世纪的一次大迫害中，罗马官员命令圣罗伦斯神父，将教会的珍宝交出来。圣罗伦斯就带来一群赤贫的、残疾的、病痛的人，说：这就是教会的珍宝。罗马士兵将他挂在铁架上烤死。

今天在美国佛州，仍有一间以圣罗伦斯命名的流浪人收容所。

耶稣曾说过：这些事你们既做在一个最卑微的人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中国第一间育婴堂，1840年由巴陵会在香港开办。到1914年，教会办的孤儿院37所，收养孤儿约2500人。



聋哑人学校

中国第一间盲人院，1874年由宣教士莫莱士于北京建立，并设计出一套普通话盲文。

中国第一间聋哑人学校，1898年由梅耐德在烟台建立，到1936年抗战以前，全国建立了十几所。

中国第一所疯人院，1898年由嘉约翰医师在广州建立，名为惠爱医院。

中国第一间麻风病院，1892年由梅藤更在杭州建立，名为广济麻风院。1940年全国51家麻风院，其中40家与教会有关。



李修善和麻风病人

李提摩太对中国慈善事业影响巨大。他先后建立了5个收容100名儿童的孤儿院，并将他们训练成技术娴熟的工人。

1877年大饥荒，李提摩太在山东救助了7万灾民，建立了7所灾民子女学校。

李提摩太说：真实的爱心要比空洞的教义更伟大。



李提摩太



魏特琳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南京大屠杀期间，金陵大学的美国宣教士魏特琳将大学变成避难所，保护了上万名中国妇孺。另一位美国宣教士贝德士发起组织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救助了20多万难民。

第九章 发展医疗事业

李提摩太曾经问一位中国绅士对圣经《新约》的看法，绅士想了一下说：也许其中最美妙之处就是，人的身体可以成为圣灵的殿宇。

从耶稣开始，出于同一份爱，拯救灵魂与医治身体一直并肩而行。



教会医院

最早于1565年，天主教卡内罗主教已在澳门建立一座医院，不分教会内外，有病者一样诊治。

马礼逊来华后，于1820年邀请李文斯顿医生在澳门开设诊所。

1835年，美国宣教士伯驾医生，在广州新豆栏开办了眼科医局，设有接待室、诊断室、配药室、手术室、观察室，能容纳200人候诊。1842年发展成一所综合医院，即博济医院。孙中山就是这家医院的实习生。



手术室

1838年，英国宣教士雒魏林，建立上海第一家西式医院，即仁济医院前身，一律免费诊治。他回忆说，每一天大街上都挤满了病人们。

有一位女宣教士名叫道济，被美国长老会派到北京。当时中国女人饱受生产之苦。孩子生下来，接生婆从炕席上抽根席篾将脐带割断，撒上一把土灰止血。很多孩子出生几天就死去。

看到此情此景，道济大哭一场。她随即返回美国，以8年时间在教会募集资金，1885年回到北京，在安定门交道口北二条盖了12间平房，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妇产医院道济医院，即北京今日第六医院。



道济医院

后来，道济又引进妇产科以外的西医各科，在中国各地建立了许多医院。

据1920年统计，宣教士在中国建立的医院和诊所共820间。

宣教士在中国建立的著名医院有：

北京协和医院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上海同济医院 Tongji Hospital

成都华西医院 West China Hospital

济南齐鲁医院 Qilu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上海仁济医院 Renji Hospital

广州博济医院 Canton Pok Tsai Hospital

上海同仁医院 Tongren Hospital

上海广慈医院 Guangci Hospital (现瑞金医院)

上海普仁医院 Pu Ren Hospital

青州广德医院 Tsingchow Guangde Hospital

苏州博习医院 Soochow Hospital

长沙雅礼医院 Yali Hospital

杭州广济医院 Hangzhou Guangji Hospital

(现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天津马根济医院 Mackenzie Hospital

福建永春医馆 Yong Chun Hospital

台湾马偕医院 Mackay Memorial Hospital



医疗宣教士

驱使宣教士们不顾一切前来服侍中国人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爱。所以从建立第一座医院开始，每建一座，他们都在门口挂一幅十字架。

今天中国人对医院的十字标志早已习以为常，许多人联想到国际红十字会。

其实，美国的医院没有十字，欧洲的医院没有十字，印度的医院更没有十字。唯独中国的医院都有十字，这是因为中国的医院最初都是宣教士建立的。

1949年以后，虽然斗转星移，却没有挪去遍布中国城乡医院和诊所的十字标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神迹，一个恩典。



十字标志

有一天，当这些十

字标志的来历和内涵尽人皆知的时候，它们一定会发出更大的光，生出更大的爱。

美国硅谷工程师们：神在一千多年前，中国就是祂福音的计划里的一部分，中国从来没有被遗忘过。

这么多的人，从很久以前就开始光顾了我们中国的这片土地。

他们和这个世界列强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他们来是帮助中国，使中国人民能够走向世界，使中国人得到真正的福音。

真的是，上帝这个爱，带领他们来到中国。同时也想到我们自己，我们是反过来，当我们从中国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们追求的是一个美好的生活。所以这个反差特别大。

他跟你无亲无故的。我们愿意去帮自己周围的好朋友，什么东西都没有关系，去帮。他跟你没有关系的，远隔重洋，看到这个国家这么贫瘠，他就过来帮助你呀。这种无私的爱是从哪来的？从神，神说爱人如己，这种爱，太伟大！

连精神病人、癲疯病人祂也不忘记。祂差遣祂的仆人来，把爱带给这样的人。我觉得上帝的爱真的很广大。

这么多上帝的使者，把他们的生命奉献给这片土地。有

上帝的爱触摸的地方，有上帝的灵降临的地方，生命得到翻转，民族得到复兴。因为上帝是创造生命的。有祂的同在，就有生命，就有活力，就有文明。

中国人常说，吃水不忘挖井人。今天，我们不应忘记为中国现代化的方方面面，艰难地挖掘出第一口井的宣教士们。

我们也不应忘记，引导他们来到中国、献身中国、造福中国的，是天上的光，是十字架上的爱。一切颂赞归于上帝！

迦南诗歌76首

《同一个地球》

同一个地球，
同一个蓝天，
同一个太阳，
月亮和众星，
同一个空间。
旋转的世界，
满了神的恩典，
我们同声歌唱，
神爱在人间。
十字架的爱，
冲破不同肤色语言，
南北东西神的儿女，

紧紧相连。
啊，十字架，
你爱最完全，
你爱最美善，
直到永远。

附录一

宣 教 士 选 介

东汉多马传说

65-68年

圣多马 Saint Thomas

印度马拉巴主教所著《迦勒底史》称：“天国福音，散遍各处，竟至中国……中国人……得信真理，皆出于圣多马之力。”在马拉巴教会迦尔底亚祈祷书中记载：“中国人和埃提阿伯人，因多马的劝勉，信仰真道。”“基督教借着多马的宣扬，犹如双翼之鸟，飞往中国。”

明末来华的耶稣会士沙勿略和利玛窦都相信此说。在一本叙利亚文的《圣务日课》中，有两段话：“由于圣多默（圣多马），印度人摒弃了崇拜偶像的错误；由于圣多默，中国人同埃塞俄比亚人已转向真理；由于圣多默，人生真谛之光照亮了整个印度；由于圣多默，天国在中国飘然升起。”“印度人、中国人、波斯人、叙利亚人、亚美尼亚人、爱奥尼亚人和罗马尼亚人，在此纪念多默之际，敬拜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中国史略》记载：在东汉时代（25年-220年），曾有两个叙利亚教士到过中国，他们到中国来表面是为了学习养蚕治丝的方法，把蚕子带回欧洲，可是他们的本意，是传教。

孔望山多马画像石：连云港附近孔望山山壁上帕提亚人（Parthian）的一系列雕刻，描绘耶稣门徒圣多马于公元65-68年在华建立教会。孔望山位于连云港通往洛阳途中，是中国东方的口岸。雕刻中，有一幅描绘圣多马身穿礼仪祭服，头戴十字冠冕的主教帽，右手握一十字架置于胸前，左手持一

权杖，权杖顶端有代表基督名号的十字架。另一位则是圣多马的助手索法兰（Shofarlan），左手持一经卷，右手举起，似在向人证道。相距不远处，刻有圣母像，她按中东人的方式坐在地上，把圣子耶稣抱在自己双腿上，这可能是世上最古老的圣母像。传说公元65-68年圣多马和他的执事兼译员索法兰渡海到连云港，向管理当地的汉明帝刘庄之弟，亲王刘英宣道，不久他即领了洗。多马和索法兰随即到了徐州开封（那里居住着一个犹太人的团体），并到了当时的京都洛阳，在那里对皇帝皇后宣讲福音，从此在中华建立了教会，并在洛阳建造了一座带有尖塔的教堂。后来索法兰一人留在中国当主教，多马自己则回印度去了。公元70年，耶路撒冷圣殿被焚毁。公元71-72年，亲王刘英被革职，被迫自杀，此为首次教难。

参考：

法国研究口头传播福音的专家皮埃尔·佩里那（Pierre Perrier）和中国问题专家沙威·瓦尔特（Xavier Walter）合著，《多默宗徒在华建立教会》（*Thomas fonde l'Eglise en Chine*）（法文）。巴黎：Hachette出版社，2008年。

唐朝景教

635年

阿罗本 Alopen Abraham

波斯人，是有历史记载最早到达中国的景教主教。阿罗本是亚述东方教会，基督教聂斯托利派，派往中国的使者。在那段时期，唐朝欢迎各种外国人，从阿拉伯的穆斯林、叙利亚的基督教教徒、突厥人，到萨珊王国的波斯人。唐代贞观九年（635年），大德（主教）阿罗本率聂斯脱里派传教团，从波斯抵达唐朝首都长安。唐太宗命唐朝宰相房玄龄到长安西郊迎接，并亲自会见了阿罗本主教。唐贞观十二年（638年），景教为唐朝所认可，唐朝政府资助其在长安义宁坊修建寺院（教堂）。唐高宗年间，阿罗本被奉为镇国大法主。

635年

景净 (Adam)

唐代著名景教传教士、主教和翻译家。叙利亚人或波斯人，其名意为“景教之净”，叙利亚文献称他为亚当 (Adam)。唐代贞观九年（635年），景净随着阿罗本率领的聂斯脱里派传教团从波斯抵达唐朝首都长安。其父伊斯是唐代著名景教领袖之一，在唐肃宗、代宗和德宗三朝效力朝廷，亦为景教之柱石。他曾担任名将郭子仪的副使，在平定“安史之乱”中，战功卓著；而且在社会慈善和宗教文化事业方面，亦有相当的贡献。已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朱谦之根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的叙利亚文，认为景净是“真

正中国景教的最高领袖，……他是司铎兼省主教并中国总监督”。景净居于唐朝都城长安（今西安），长期从事传教和翻译工作。他学识渊博，翻译了叙利亚经书32卷，以及祈祷书等有关礼拜的书籍，其中有几卷后来在敦煌石室中被发现。景教碑碑文末后，在“大秦寺僧景净”下面亦有叙利亚文一行，译文为“秦尼斯坦（Chinestan，即中国）教父（Papas或Papash）、区主教（或译省主教、乡主教）兼司铎亚当（Adam）”。他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撰写人。景教碑建立于唐德宗建中二年正月初七日（781年2月4日），概述景教的基本教义，解明“景教”名称之义及由来，叙述景教自太宗贞观九年（635年）到德宗建中二年（781年）140多年的历史，并记述了伊斯辅佐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的战功及其个人的善行。文字简练，显示出景净的中国文学功底和深厚修养。

参考：

陈怀宇，《景风梵声》。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

川口一彦，《景教》（東回りの古代キリスト教）。日本：桑原制本有限公司，2002年。

罗香林，《唐元二代之景教》。香港：中国学社，1966年。

李民举，《景教探索与红学研究》。波士顿：中国基督教理学会，2011年。

朱谦之，《中国景教》。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

元朝也里可温教

也里可温教：陈垣于1917年作《元也里可温教考》，明确指出“也里可温”即“敬拜耶和華者”。陈垣当时亦凭此文章而得享盛名，成为“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开山祖”之誉，并与史学家陈寅恪被称为“史学二陈”。

1246年

柏郎嘉宾 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 1180-1252

意大利人，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教皇因纳森四世于1246年派柏郎嘉宾（66岁）使华，抵达蒙古上都哈拉和林，携带教宗写给蒙古大汗的亲笔信，晋见蒙古大汗贵由（窝阔台之子）。柏郎嘉宾未能说服贵由皈依天主教，于次年返回。此为罗马天主教第一次正式与华交往。著有《柏郎嘉宾蒙古行纪》，又译《鞑靼蒙古史》，是欧洲人对蒙古最古老的纪录。柏郎嘉宾也是第一位尝试以编年体撰写蒙古历史的欧洲人。

1271年

马可·波罗 Marco Polo 1254-1324

13世纪来自意大利的世界著名旅行家和商人。1271年（17岁）随父亲和叔叔来中国，途经中东，历时四年多，到达蒙古帝国。在中国游历17年，曾访问当时中国的许多古城，到过西南部的云南和东南地区。在狱中口述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故事，其狱友鲁斯蒂谦写下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记述了他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见闻，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

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参考：

马可波罗著，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

1291年

若望·孟高维诺 Giovanni da Montecorvino 1246-1328

意大利人，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人士及总主教。1289年，受罗马教廷派遣，出访元朝中国，于1291年（45岁）抵达泉州。1294年抵达元朝京城大都，受到元成宗铁穆尔礼遇。常居汗八里（日后北京）传播天主教。1299年和1305年分别在大都建成2个教堂，建立了最早的天主教中国教区。1307年7月23日被任命为汗八里总主教，1328年在大都去世。信徒3万。

明朝天主教

1549年

圣方济各·沙勿略 St. Francis of Xavier

1506-1552

西班牙籍天主教传教士，耶稣会创始人之一，首先将天主教信仰传播到印度、日本和马六甲，天主教会称之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传教士”。

1534年8月15日，罗耀拉、沙勿略等七人在巴黎的蒙马特高地共同誓发神贫和贞洁的誓愿，创立耶稣会。1540年9月27日，教宗保禄三世正式批准成立耶稣会，命罗耀拉成为第一任会长，沙勿略受命成为耶稣会首批传教士。当时葡萄牙国王约翰三世欢迎耶稣会教士前往葡萄牙开辟的东方地区去传教。1541年他和另外两个伙伴沿着葡萄牙人开辟的东方航海路线，前往印度、日本、中国等地传教。

1549年8月15日（圣母升天节），方济各·沙勿略携同两位耶稣会士经马六甲海峡，抵达日本南部九州的鹿儿岛，成为第一位踏上日本国土的天主教传教士。在日本，沙勿略发现，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很深，于是决心尽早访问中国。1552年，他组织了一个赴中国的葡萄牙使团，参见明朝皇帝。但5月底使团在马六甲被长官亚戴德扣留。于是他决心独自前往中国，1552年8月底，到达离中国广东海岸很近的上川岛，计划偷渡入境。但是，答应帮助偷渡的中国商人反悔。1552年12月3日晨，沙勿略因疟疾病逝于岛上，年仅46岁。

同年10月6日，利玛窦生于意大利马切拉塔。三十年后，

利玛窦成功地将天主教传入古老的中国。耶稣会于1847年至1853年建造在中国的第一座天主教堂，名为圣方济各沙勿略堂（上海董家渡）。

1582年

罗明坚 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

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籍传教士，明朝以来第一个进入中国大陆的西方传教士。罗明坚29岁入耶稣会。1578年（35岁）离欧，1579年7月抵达澳门，1582年12月抵达肇庆。1588年赴罗马，请求教宗派遣驻中国使节不果。1607年卒于意大利萨勒城。著有《天主圣教实录》，系欧洲人最早用汉文写成的天主教教义纲要。编撰了第一部《葡汉辞典》。还将中国典籍《四书》中的《大学》翻译成拉丁文。绘制了《中国地图集》——最早开始绘制中国地图并带回西方，将中国的文化和地理知识介绍到欧洲，对促进欧洲对中国的了解，具有深远影响。

1583年

利玛窦 Matteo Ricci 1552-1610

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籍神父、传教士、学者，天主教在中国的奠基者。1582年抵达澳门，1583年（31岁）（明神宗万历十一年）随同罗明坚来到肇庆，获两广总督郭应聘制台和肇庆知府王泮的接待，建立“僊花寺”（僊即仙），为明代中国境内第一座正式的天主教堂，也是中国内陆第一座欧洲式天主教堂。

1584年（万历十二年），利玛窦制作并印行《坤輿万国

全图》，令中国人首次接触到近代地理学知识。1594年，换僧服为儒服。次年，发表《交友论》，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被士大夫尊称为“泰西儒士”。

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利玛窦被范礼安任命为耶稣会中国教区负责人，并指示进京觐见中国皇帝。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利玛窦与郭居静神父在北上任南京礼部尚书的王忠铭带领下，奔赴南京。在南京，通过瞿太素，结交了南京礼部侍郎叶向高、思想家李贽等，并结识后来成为文渊阁大学士的徐光启。

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5月18日，利玛窦带着庞迪我神父和准备好献给皇帝的礼物再度赴京，并于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1月24日抵达北京，进呈自鸣钟、《圣经》、《坤舆万国全图》、大西洋琴等方物，得明神宗信任。同年，明神宗下诏允许利玛窦等人长居北京。

利玛窦撰写了介绍天主教教义的《天主实录》。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其中有数名公卿大臣。利玛窦容许中国教徒继续传统的祭天、祭祖、祭孔。主张以“天主”称呼天主教的“神”（拉丁文的Deus）；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天”和“上帝”本质上与天主教所说的“唯一真神”并无分别。而祭祀祖先与孔子，只属追思先人的仪式，本质上并没有违反天主教教义。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和方式，一直为之后到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所遵从，是为“利玛窦规矩”。

利玛窦与徐光启等人翻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等书，带给中国许多先进的科学知识，而且创造许多中文科学词

汇，例如点、线、面、平面、曲线、曲面、直角、钝角、锐角、垂线、平行线、对角线、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圆心、外切、几何、星期等等辞汇，沿用至今。

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5月11日利玛窦病逝于北京，享年58岁。赐葬于平则门外的二里沟滕公栅栏。

参考：

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林华等编，《历史遗痕：利玛窦及明清西方传教士墓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

1593年

郭居静 Lazaro Cattaneo 1560-1640

明末天主教耶稣会士，出生在意大利萨尔察纳的一个贵族家庭。先在印度工作5年，于1593年（33岁）抵达澳门，在华宣教历48载。先后在韶州、北京、南昌、南京、上海和杭州等地传教。是最早到上海、杭州开创天主教事业的耶稣会士。他和利玛窦合作编纂了《拉汉字典》，与徐光启、杨廷筠等科学家关系甚密，并亲自为杨廷筠施洗。1594年，郭居静进入韶州，协助利玛窦传教。当时徐光启在那里教书，认识了郭居静，并从他接触到天主教及西方科学。1608年（明万历36年），在徐家宅第四侧，建立起上海第一座教堂，并亲自主持教务，从而成为耶稣会进入上海的第一位传教士。为了提高教友的信仰质量，郭居静建立了“天主之母善会”，以培训信徒。在两年时间内，他就为300多人施洗。郭居静80岁高龄辞

世，死后葬于杭州大方井修士公墓。

1597年

龙华民 Nicholas Longobardi 1559-1654

意大利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1597年（38岁）来华，接替利玛窦。他与利玛窦在对待中国礼仪的问题上观点不同，从而引发天主教教廷与满清的中国礼仪之争，最终导致天主教被禁止传播。他于1654年在北京病逝，埋葬于滕公栅栏。

参考：

费赖之撰，梅乘骥译，《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1997年。

1610年

金尼阁 Nicolas Trigault 1577-1629

法兰西人，耶稣会士，汉学家。生于西班牙佛兰德斯杜埃城（现属法国），1594年11月9日加入耶稣会，1607年3月自修院毕业，被派遣至远东开展传教工作。金尼阁于1610年（32岁）抵达澳门，1611年到达南京。1611年4月，因李之藻之请，偕司铎郭居静、修士钟鸣仁赴杭州开教。1618年4月，金尼阁带着教宗的诏谕，以及在欧洲募集到的七千多部图书，率领20余名新招募的宣教士，由里斯本出发来华。后来成为著名传教士的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傅汎际与之同船赴华。1629年11月14日，金尼阁于杭州逝世，葬于杭州城外的耶稣会司铎公墓。金尼阁是第一个把五经翻译成拉丁文的人。同年，金尼阁将《西儒耳目资》付梓，它是第一部运用音素字母

对汉字标音的字典。此外，金尼阁还是第一个系统地编写中国编年史的西方人。他还将利玛窦的意大利文回忆录手稿翻译成拉丁文，以《利玛窦中国札记》为名刊行。

1620年

邓玉函 Johann Schreck 1576-1630

天主教耶稣会士，瑞士人。1620年（44岁）抵澳门，经徐光启推荐到朝廷，负责制定历法。著有《医说略》。1630年去世，在华9年。是伽利略的朋友，第一个把天文望远镜带进中国。在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中，其最大贡献要数他与中国官吏学者王征共同完成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一书。

1620年

汤若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

出生于神圣罗马帝国科隆（今德国）的一个贵族家庭，在意大利学习数学、物理、神学和天文学，1611年加入耶稣会。1620年（29岁）抵达澳门，先后翻译《远镜说》、《坤舆格致》。1630年，由徐光启推荐，接替邓玉函，任职历局，协助徐光启编修《崇祯历书》，完成测算日食和月食的《交食说》。为阻止清军入关，他受朝廷命令制造火炮。清军入关后，被御封为钦天监监正，其“西洋新法历书”获得颁行，为《时宪历》。深得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和顺治帝的信任，顺治十二年（1655年）受封为通政使，晋一品，封赠三代。顺治皇帝死后，小皇帝康熙登基。辅政大臣鳌拜反对西洋学说，康熙三年（1664年）发生“历狱”，汤若望被判凌迟死刑。康熙四年（1665年），京师地震，免死羈狱，获孝庄太皇太后特旨

释放。康熙五年七月十五（1666年8月15日）病死。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给汤若望平反。

参考：

李兰琴，《汤若望传》。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

《正教奉褒》（总铎区黄伯禄斐默神父所作）：共两册，有清光绪九年（1883）及光绪二十年（1894）两个版本（初版162页，二版167页），以及道光六年（1826）前，历代教会与教士所获各方彰扬文字，汇为一编，末附“教士姓名华洋合璧”。

《他与帝国同行》汤若望神父纪录片CCTV-10播放<http://video.sina.com.cn/v/b/19711314-1597043581.html>

清朝天主教

1659年

南怀仁 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

比利时人，天主教耶稣会神父，精通天文学、数学、历法计算、地理等多方面的知识。清康熙年间随同卫匡国前往中国。1659年（36岁）抵达澳门，后来到山西传教。1660年，受召前往北京，协助汤若望神父。汤若望去世后，接替汤若望被授以钦天监监副。撰写《历法不得已辨》，逐条驳斥杨光先、吴明炫在历法推算方面的错误。针对中国传统的观象占候、堪輿占卜等观念，撰写了《妄推吉凶之辨》、《妄占辨》和《妄择辨》。曾铸造红夷炮助清廷。1688年逝世于北京，康熙追赠工部右侍郎，谥为勤敏，名留《清史稿》。与利玛窦、汤若望埋在同一个人墓园，滕公栅栏马尾沟教堂。奉教之士：瞿太素、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李天经、王征、瞿式耜等。

参考：

魏若望编，《南怀仁（1623-1688）：鲁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王冰，《勤敏之士：南怀仁》。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

余三乐，《早期西方传教士与北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

1672年

徐日昇 Thomas Pereira 1645-1708

明末在华天主教耶稣会葡萄牙籍传教士、外交家、音乐家。于1672年（27岁），抵达中国澳门。由于康熙皇帝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强烈兴趣，南怀仁便向康熙皇帝举荐了徐日昇。徐日昇以其音乐、天文、数学等多方面渊博的知识，更以其对中国文化的尊重，赢得了康熙皇帝的赞赏。康熙皇帝说徐日昇“实在是个杰出的天才”，命侍随左右，和南怀仁、闵我（Dom Ingo Navarrete）轮流为康熙讲授科学知识。1688年南怀仁去世后，康熙皇帝任命徐日昇为钦天监监正。虽然徐日昇辞谢了此职，但实际上主持了钦天监的工作。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康熙皇帝派遣徐日昇和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作为中国使团的成员出使俄国，于1689年9月7日，正式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条约的签订为中国东北边境换得了长期的安宁。徐日昇精通音乐，曾制作机械乐器，建造过多台管风琴，还建造了以悦耳的前奏曲和钟声报时的机械时钟。他留给后世最宝贵的遗产是其介绍西方音乐理论的著作：《律吕纂要》，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向中国介绍了五线谱、音阶、节拍、和声等西洋基本乐理知识；《律吕正义》，介绍有关声律节奏等方面的音乐知识。1692年，康熙因徐日昇、张诚在尼布楚谈判中立下的功劳，和天主教神父们为中国所做的贡献而颁布了容教令，为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打开了方便之门，标志着天主教在中国“黄金时代”的来临。容教令颁布不久，天主教在华传播取得了迅速的进展。到1701年，“有130位传教士在中国传教：59位耶稣会士，29位方济各会士，18位道明会士，15位在俗神父，9位奥斯定会士。”1708年，徐日

昇在北京病逝，享年63岁，被安葬在滕公栅栏天主教墓地，与利玛窦之墓为邻。在康熙皇帝为其所写的悼词中，称誉徐日昇“渊通律历，制造咸宜”的渊博学识，肯定他出使俄国时“扈从惟勤，任使尽职”的工作态度，还赞扬他“秉性贞朴，无间始终”的为人品格。这可以说是对徐日昇在华30多年活动的最高评价。

1687年

白晋 Joachim Bouvet 1656-1730

清朝康熙年间耶稣会法国传教士、汉学家。1687年（31岁）来华，从事宣教与科学文化事业历43载，担任康熙皇帝的侍讲；参与绘制了中国第一张地图《皇舆全览图》；将中国多部经典翻译成拉丁文，介绍到欧洲，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贡献。白晋和张诚等人于1688年2月7日抵达北京，遂应召进宫，进献了当时欧洲先进的天文仪器，包括四分象限仪、水平仪、天文钟，还有一些数学仪器。白晋将法王路易十四之子梅恩公爵送给他的测高望远镜转呈给康熙皇帝。康熙非常喜欢，遂下令将进献之物置于宫内御室中，并传旨白晋、张诚学习满语和汉语。1690年，张诚、白晋等人开始系统地向康熙帝讲授几何学和数学，首先进讲的是《几何原理》。此后，向康熙皇帝讲授天文历法、医学、化学、药学等西洋科学知识。皇帝任命他为皇太子的辅导老师。据《张诚日记》记载，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之后，1690年1月26日，康熙要求张诚介绍俄国使团的来华路线，张诚按照西方绘制的地图给他讲述，他发现地图中关于中国的部分，尤其是中国东北部分过于简略粗略，由此他决定依靠传教士，用西方测量技术，绘制出一张

全国地图。1718年，《皇輿全览图》及各省分图绘制成功，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在如此辽阔的国土上完成的大地测量。作为一位杰出的汉学家，白晋著述、译著颇丰，包括《中国现状》、《古今敬天鉴》、《康熙帝传》、《中国皇帝历史画像》、《易经大意》等。

1687年

张诚 Jean-François Gerbillon 1654-1707

天主教耶稣会法国籍神父、传教士、科学家。1687年（33岁）来华，先后担任过北京耶稣会会院院长、法国耶稣会在华传教团总会长等职。服务清廷19年之久，曾为康熙皇帝之帝师。1689年受康熙帝指派，随团出使沙皇俄国，与白晋一起，直接参与促成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他在数学方面的天赋尤为突出，曾先后被授予“国王数学家”、“法国科学院院士”等荣衔。从1688年到1707年计19个春秋，张诚作为康熙皇帝的御前教官，悉心传授数学、几何、天文、地理、哲学等西方知识，并借康熙生病养病之机，讲授西方病理学、解剖学等医学知识。满文译著《几何原本》就是在康熙皇帝的指示下，由张诚、白晋等人完成的。1689年，康熙皇帝召徐日升、张诚等至内廷，为康熙讲授《欧几里德几何学》，即《几何原本》。应张诚等法国传教士的请求和建议，康熙皇帝决意绘制全国及分省地图，于1707年12月开始测绘，先请张诚试测绘制出一幅北京及直隶省区地图，最后绘制出第一张全国地图《皇輿全览图》。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康熙罹患疟疾，高烧不退，太医束手无策，张诚和白晋献上金鸡纳霜，即奎宁，皇帝一服即愈，遂赐张诚住宅（前辅政大臣苏克隆哈旧府），并

赐地建筑天主教堂一所，康熙皇帝亲题“万有真原”匾额。这座教堂就是当时北京仅有的三座天主堂之一的北堂（即西什库天主堂）。张诚一生著述颇多，书信甚丰。1707年3月25日，张诚因病在京辞世，享年仅53岁，毕其生为中国的政治、外交、地理、天文、气象、数学等领域的进步，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715年

郎世宁 Ginseppe Caseiglione 1688-1766:

意大利人，天主教耶稣会教士，绘画大师。1715年（27岁）来华，一生历侍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计约50余年。初到中国时，被康熙帝以艺术家身份召进宫中，曾协助圆明园的规划设计。引进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开创的明暗写实画法，并改用胶状颜料在宣纸上作画，也就是今日的胶彩画作法。他曾试图要求康熙帝开办学习用西方透视原理来绘画的绘画学校，但不被采用。后来与中国学者年希尧一起出版了一本《视学》，是中国第一部透视学专著。

参考:

视频：《郎世宁在中国——谦卑服务的帝国画师》，光启社与江苏电视台合拍的四集纪录片，2014年。

郎世宁经典作品高清全集（110张）<http://art.ifeng.com/2015/1125/2619294.shtml>

清朝基督教

1807年

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苏格兰人，出生在大不列颠岛北部的小镇莫佩思（Bullers Green），鞋匠的儿子。1807年（清嘉庆十二）马礼逊（25岁）受伦敦传道会派遣来华传教，是西方来华的第一位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东印度公司任翻译25年。第一个把《圣经》全文翻译成中文并予以出版，编撰了中国第一部《华英字典》，吸收了第一个华人基督徒蔡高，按立了第一位华人宣教师梁发，与米怜等在马六甲创办了第一所现代学校英华书院，出版了第一本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与英文刊物《印度支那拾锦》，并邀请李文斯顿医生创办了第一个西式诊所。是基督教新教在华奠基人。

参考：

查时杰，《马礼逊与广州十三夷馆》。台北：宇宙光，2006年。

海恩波著，简又文译，《传教伟人马礼逊》。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0年。

孙尚扬，《利玛窦与徐光启》。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年。

汤森著，吴相译，《马礼逊：在华传教士的先驱》。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年。

游紫琳，《平民阶级中的英雄马礼逊》。台北：宇宙

光，2006年。

1813年

米怜 William Milne 1785-1822

苏格兰人，受伦敦传道会派遣，于1813年（28岁）携夫人来华，是继马礼逊之后第二位来华的基督教宣教士。米怜六岁丧父，作过牧童，当过木匠学徒。申请来华时，伦敦会认为他学识不够，但米怜说：“只要是关于宣教的服事，无论什么工作，我都愿意干。……我去洗衣服，去烧饭，我来服侍马礼逊博士，让他可以专心地传教，我愿意作任何仆人的工作。”十年间，米怜协助马礼逊，成功地在马六甲建立了宣教基地，创办了英华书院，为该校首任校长。他创办世界上第一个以华人为对象的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他还帮助马礼逊翻译旧约圣经。第一位被马礼逊按立的中国牧师梁发，就是在米怜带领下归信耶稣的。因其出色成就与贡献，格拉斯哥大学授予他名誉神学博士学位。

1816年

麦都思 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

英国传教士，自号墨海老人，汉学家。1816年（20岁）被英国伦敦会派往马六甲。创办第一份活版铅字杂志《各国消息》。1838年，在伦敦发表《中国的现状与传教展望》，向欧洲人深入介绍中国历史和文明。1843年，代表伦敦会到上海，是第一个到上海的外国传教士。他在山东路一带建立伦敦会分部，包括墨海书馆、天安堂和仁济医院，被人称为“麦家圈”。在墨海书馆得王韬协助，将圣经翻译成中文（深文理圣

经)。1848年3月，麦都思至青浦传教，与当地漕运水手发生冲突，史称青浦教案。1904年，伦敦会为纪念麦都思，在上海虹口兆丰路（高阳路）设立麦伦书院（麦伦中学）。上海公共租界西区有一条马路以他命名（Medhurst Road麦特赫斯特路，今泰兴路）。麦都思的儿子麦华陀爵士（Sir Walter Henry Medhurst）曾任英国驻上海领事。

1827年

台约尔 Samuel Dyer 1804-1843

戴德生的岳父，英国人。1827年（23岁）被伦敦会派往南洋向华侨传教。在槟榔屿用大量时间研究和完善汉字的金属活字，设计和铸造三千个金属汉文活字。出版过一本汉字活字体型选编《作印集字》。1828年前往马六甲负责英华书院的印刷所事务，同时铸造中文活字阳文钢模、阴文铜模，以便铸造汉字金属活字。香港首份华文报章《遐迩贯珍》就是用英华书院的汉字活版印刷厂印刷发行的。当时台约尔设计由英华书院铸造的中文活字世界闻名。俄国沙王钦差大臣、法国巴黎学会、新加坡、太平天国、两广总督、上海道台、清廷总理衙门等，都先后购买全套活字铜模，是为西人铸造的中文铅字之始。1843年7月18日，台约尔前往香港出席伦敦会的会议，并参加圣经翻译事宜大会，被任命为大会秘书。会后返回新加坡，不幸途中犯病，于10月24日在澳门不治逝世。他的遗言：“神圣的耶稣啊！慈爱的救世主啊！我去和为我而死的主同在！”他被葬在马礼逊的墓侧，两个在生活中亲密合作的伙伴长眠在一起了。

参考:

张陈一萍, 戴绍曾著, 《虽至于死: 台约尔传》。广西: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

1830年

裨治文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

美部会传教士, 响应马礼逊的呼吁, 于1830年(29岁)来华, 是第一位来华的美国传教士。担任英文《中国丛报》的编辑, 向西方介绍中国。担任过林则徐和美国公使顾盛的译员。参加订立了中美1844年《望厦条约》和1858年《天津条约》。裨治文文理圣经译本将“God”翻译为“神”而不是“上帝”。1854年5月, 随美国驻华公使麦莲从上海进入太平天国辖区考察, 发表《调查报告》, 否定太平天国。1850年, 和妻子创办了上海第一所女校裨文女塾(老西门外, 后来的裨文女中)。

1830年

雅裨理 David Abeel 1804-1846

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 皈依基督后开始学医。1826年, 毕业于新不伦瑞克神学院, 被按立为美国归正会牧师, 在纽约州的雅典任职。1829年被传教的使命感所推动, 加入美国水手公会(The Seamen's Friend Society)。10月, 和裨治文同船前往中国, 1830年(26岁)抵达广州。先在广州向外国水手宣教一年, 同时学习福建话、马来话和暹罗话, 同年成为公理会牧师。1833年由于健康原因回国, 途经英国、瑞士、法国、德国和荷兰, 在会议上代表中国差会演讲。1841年回到中

国，1842年在新开辟的通商口岸厦门鼓浪屿创办差会，成为首先进入厦门的传教士。1845年由于严重的肺结核回到美国，次年在纽约州奥尔巴尼去世。

1831年

郭实腊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

德国基督教路德会传教士，是港英时期的高级官员，职称为抚华道。1831年（28岁），到中国沿海考察，同年到澳门。与马礼逊、米怜、麦都思等，被作为基督教新教在华之始。在华办报、翻译、著述、办学，常领风气之先。翻译了圣经《新遗诏书》、《旧遗诏书》。1831、1832、1833年三次沿中国海岸的航行及其《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以荷兰文、德文、法文和英文在世界各地出版，三次航海是西方新教传教士最早做出的打开中国大门的试探，在西方引起了巨大轰动，引起欧美各国教会对中国宣教的极大兴趣。1834年，他的英国籍妻子温施娣（Mary Wanstall）在澳门开办了一所女子私塾，亦收养并教育多位盲女，堪称“中国盲人教育之母”。有学者认为，西方经济学的最早传入，是从1840年郭实腊编译的《贸易通志》开始的。1842年在《中国丛报》上撰文介绍《红楼梦》，是最早将这部中国经典小说介绍给西方读者的人。据伟烈亚历（Alexander Wylie），从1834年开始，郭实腊的著述陆续面世，共有85部之多，其中以中文写成的有61部，早期著述常以“爱汉者”（Lover of the Chinese）自称。鸦片战争后，他以翻译的身份参与了《南京条约》谈判和签订全过程，还做过定海、宁波的“民政长官”；之后又做了8年香港驻华商务总督的秘书，直至1851年病死于香港。1844年他在香港成立传教组织“福汉会”，为基督教在华最早由华

人主事的组织。同时还创立中国传教会，在伦敦招募来华传教士。中国传教会把戴德生送到中国，后来戴德生成功地建立了中国内地会，称郭实腊为“内地会之父”。纵观其在华20年之生涯，虽有争议，但无论从事宣教布道、翻译圣经、著述出版，还是从政传译、协力外交等方面，均有重要贡献，为中外史学家所肯定。尤其在宣教理念与策略上，更具突破与创新意义。

参考：

Lutz, Jessie Gregory. *Opening China: Karl F. A. Gu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827-1852*. Cambridge, UK: Wm. B. Ferdmans Publishing Co., 2008.

1833年

卫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

美国人，1833年（21岁）入华，是最早来华的美国传教士之一。在中国生活了40年，编过报纸《中国丛报》，当过美国驻华公使代办，是美国第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也是美国早期汉学研究的先驱，被称为美国“汉学之父”。其名著《中国总论》标志着美国汉学的开端，该书与他所编《汉英拼音字典》过去一直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必备之书。1858年参与订立了《中美天津条约》，促成传教条款的订立。自1833年来华，直到1876年返美，历43年之久，是当时在华时日最长的西方人。集传教士、外交官与汉学家于一身，既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旁观者，也是中国历史的直接参与者，是早期中美关系史和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其中文名取自孔子语：“君子有三

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参考：

卫斐列，顾钧等译，《卫三畏生平及书信》。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1834年

伯驾 Peter Parker 1804-1888

基督教美部会传教士，第一位来到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医生。1834年（30岁）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获得牧师资格，同年到达广州。1835年，伯驾在广州十三行内新豆栏街，成立了广州眼科医局，被称为“新豆栏医局”，免费为病人治病。不久因扩大业务而更名为“仁济医院”（Hospital of Universal Love，今中山医科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的前身），1859年改名为“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 Pok Tsai）。1839年，在华宣教士中只有两位医疗宣教士。因着伯驾的推动，到了1842年有更多的医疗宣教士陆续来华。五十年后，已有61家医院、44家药房、100多位男医生和26位女医生在华从事医疗宣教，许多华人也因着他们的爱心医疗而接受基督教信仰。1844年，伯驾作为美国特使的助手和翻译，参与《望厦条约》的谈判，促使在华传教自由之条款的加入，对清政府采取弛禁基督教政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1845年，伯驾接受美国泰勒（John Tyler）总统的聘任，成为美国驻华外交代办。1855年，美国政府正式委任他为驻华全权公使。

参考:

爱德华·V·吉利克著,董少新译,《伯驾与中国的开放》。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1837年

艾迪绥 Mary Ann Aldersey 1797-1868

第一位来华基督教女传教士,在浙江宁波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教会女子学校。艾迪绥出生于英格兰东南部埃塞克斯郡(Chigwell Row)富裕的非国教家庭,父亲约瑟夫是当地文具批发商,母亲名叫伊丽莎白。当马礼逊在1824年到1826年回国休假时,艾迪绥向他学习中文,准备参加传教行列。她的朋友玛丽娅·纽厄尔(1827年作为伦敦会传教士前往马六甲,并嫁给传教士郭实腊)鼓励她加入传教行列。1837年,艾迪绥(40岁)作为独立传教士,前往爪哇苏腊巴亚,并开始向当地华侨传教。在那里为华人女孩开办了一所学校。1843年,她将学校迁往新开放的宁波,该校被称为“宁波女塾”。她在那里工作直到1861年。

1837年

罗孝全 Issachar Jacox Roberts 1802-1871

基督教美南浸信会传教士,创立浸信会于广州第一人。1837年罗孝全(35岁)自费来华,初在澳门向麻疯病患者传教。1841年加入美国浸信会差会。1842年成为第一位长期居留香港的新教传教士。太平天国的创立者洪秀全在1847年来到罗孝全在广州的礼拜堂,在那里学习《圣经》,曾要求受洗,罗孝全不同意洪秀全对以前大病时所见“异象”的见解,拒绝

为他施洗。洪秀全定都南京后，邀请罗孝全赴南京出任其国策顾问。罗孝全试图纠正洪秀全错误的基督教信仰观念，屡屡以忠言善道相劝，可惜洪秀全终不肯采纳他的忠告。罗孝全在华宣教二十多年，除担任粤东浸信会和第一浸信会牧职外，还主持福音船及文字佈道工作。虽然工作非常忙碌，但他还时常去服务那些被社会所遗弃的麻疯病人，传福音给他们。1871年，因早先在澳门感染的麻疯病并发症而去世。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看轻万物，为要得着基督”。

1839年

包留云 Samuel Robbins Brown 1810-1880

又名布朗，美国宣教士。1838年，刚从耶鲁毕业的包留云接受“马礼逊教育会”的邀请，偕新婚妻子启程去中国。次年，1839年（29岁）入华。是第一位以教师身份来华的美国宣教士，为中国第一所西式学堂“马礼逊学堂”首任校长，开始只有六名学生。据1840年4月，包留云写给“马礼逊教育会”的书面报告称：“马礼逊学堂……目标是在德育、智育和体育三个方面给予学生全面的训练。”1846年，带容闳、黄宽、黄胜到美国马萨诸塞州芒松中学Monson Academy读高中，开启中国留学之门。1854年夏，容闳获耶鲁大学文学学士学位，成为第一个受过完整美国教育并取得学位的中国人。回国后通过曾国藩促成第一批幼童留美，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黄宽成为中国西医第一人。黄胜是近代中文报业的先驱。容闳带出去的首批留学生不少人成为栋梁：如詹天佑成了中国铁路之父；唐绍仪，曾任民国第一任总理；唐国安，清华学校首任校长；梁敦彦，曾任清廷外务大臣；梁如浩，交通大学创始人。

容闳回忆，包留云先生是一个极为出色的教师。他“性情沉静，处事灵活，彬彬有礼，为人随和，且多少带点乐观主义精神。”

参考：

钱刚、胡劲草，《大清留美幼童记》。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

容闳著，恽铁樵、徐凤石译，《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容闳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

1839年

理雅各 James Legge 1815-1897

苏格兰人，伦敦布道会传教士，近代英国第一位著名汉学家。1839年（24岁）受伦敦宣道会派遣，携新婚妻子至马六甲，主持英华书院。1843年，英华书院迁往香港，由一所专门培养宣教士的书院，变为招收中国青少年入学的教会学校。1844年，英华书院更名为“英华神学院”。同年，理雅各在香港建立了伦敦会第一所华人礼拜堂“下市场堂”。他先后建立四座教堂，经他受洗的人数达272人。他更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人。从1861年到1886年的25年间，在中国学者王韬等协助下，将“四书”、“五经”等中国主要典籍全部译出，共计28卷。当他离开中国时，已是著作等身。他与法国学者顾赛芬（Seraphin Couvreur）、德国学者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并称汉籍欧译三大师。1852-1853年间，理雅各的妻子和三个女儿病死在中国。1854年，理雅各帮助安排太平天国领袖洪仁玕去教书，洪仁玕后来成为伦敦会牧

师，并作为理雅各的助理，四处讲经传道。1875年，理雅各正式应聘成为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他因翻译中国经书的成就而获得儒莲中国文学首届国际奖。

参考：

何寅，许光华编著，《国外汉学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

岳峰，《架设东西方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

1839年

雒魏林 William Lockhart 1811-1896

英国伦敦会首位进入北京的医疗传教士。1838年被伦敦会派驻中国，1839年（28岁）到达广州，加入中华医学传道会。1840年8月，到舟山为中国人开办一所医院。1844年在上海老城东门外开设上海第一家西式医院——中国医馆（仁济医院前身）。1848年3月，和麦都思等伦敦会宣教士到青浦传教，与当地漕运水手发生冲突，爆发青浦教案。1861年，在北京开创医疗事工，建立现在北京著名的协和医院的前身。治病的同时，也把福音传给患者。雒魏林说：“凡来医院就医者，一概先听道后看病。对于那些起不了床的重病人，传教士就去他们病房里讲道。”他在信中还说，每周三次由麦都思等传教士向病人集体布道，并“应他们的要求，发放福音书册，让他们病愈回家时随身带上以赠给他们的亲友。”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多数病人都会“怀着崇敬之心诚心地”予以接受。到1864年1月2日，雒魏林报告说已经有10个布道机构进入北京工

作了。1863年返回英国后，著有《在华行医传教二十年》。

1839年

合信 Benjamin Hobson 1816-1873

英国传教士、医生，是最早在中国翻译西医医药书籍的人。1835年，于伦敦大学医学院毕业。1839年（23岁），被伦敦会派往中国澳门，为驻澳门教会医院的传教医师。1843年，被派往广州，在广州西关外金利埠创办“惠爱医馆”，施医舍药。于1851年编译了《全体新论》（原名为《解剖学和生理学大纲》），是第一本传入中国的系统的西方医学著作，主要介绍西方解剖学和生理学。于19世纪50年代出版的还有《博物新编》、《西医略论》、《妇婴新说》、《内科新说》等，这五本被后人合编为《合信氏医术五种》。他用中文著的医学书在中国广泛流传，并被翻译为日文、韩文。1847年，与马礼逊的女儿结婚。合信来华行医学20余年，1859年回国，两袖清风，“家居况味肃然，门可罗雀”（王韬）。1873年2月16日，合信病逝英国伦敦西顿哈姆区。

1842年

文惠廉 William Jones Boone 1811-1864

美国圣公会主教，该会在华传教的开创性人物。1837年先到爪哇的华人中间传教。1842年（31岁）进入厦门。1843年成为主教。1845年进入开埠不久的上海，开辟江苏教区。美国圣公会在武昌所办的大学也以他的姓氏命名为“Boone University”（文华大学）。文惠廉的长子文恒理（Henry William Boone）是传教医生。1880年创办了上海同仁医院

(St. Luke's Hospital)。次子小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 Jr.)于1846年生于上海,1884年接任美国圣公会江苏教区主教。

1842年

娄理华 Walter Macon Lowrie 1819-1847

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最早差派来华的宣教士之一,参议员之子。先后在澳门、宁波等地宣教五年多,后在杭州湾遭遇海盗,不幸遇害,成为基督教新教来华宣教士中第一位殉道者。1842年,鸦片战争期间,娄理华(23岁)前往中国。1843年,西方各基督教差会的代表在香港举行宣教士译经大会,商讨出版一部“不仅为各差会共同认可,亦为中国人所接受的圣经译本”,该译本被称为“委办译本”,由五个宣教区的宣教士分头进行翻译。娄理华是美国长老会宣教士中唯一参加这项合作计划的宁波宣教区代表,也是所有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位。1847年8月19日,参加译经会议之后,从上海乘船返回宁波途中,不幸遭遇海盗劫持。来华宣教仅仅五年零两个月,年仅28岁。娄理华殉道七年后,1854年,他的弟弟,27岁的娄理瑞(Reuben Lowrie)踏着哥哥的足迹,带着新婚的妻子踏上中国的土地,继承哥哥未竟的事业,到上海传扬基督福音。因积劳成疾,于1860年病逝于上海,葬在美国长老会上海墓园中。

1843年

艾约瑟 Joseph Edkins 1823-1905

伦敦传道会在华三杰之一,著名汉学家。1843年(20岁)

在上海传教，与麦都思、美魏茶（米怜之子）、慕维廉等英国伦敦会传教士创建墨海书馆。1863年到北京，负责伦敦会的北京事工，并创立了北京缸瓦市教会。1875年，获爱丁堡大学神学博士。1880年，被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聘为海关翻译。1905年，在上海逝世，享年82岁。艾约瑟和王韬合译《重学浅说》、《光学图说》、《格致新学提纲》、《西国天学源流》和《中西通书》等书。与李善兰、伟烈亚力、韦廉臣合译《谈天》、《代数学》、《代微积拾级》、《圆锥曲线说》、《奈瑞数理》、《重学》、《植物学》等书，由墨海书馆出版，在十九世纪的西学东渐上有重要贡献。1872年，在北京主编《中国见闻录》。还著有《中国的宗教》、《访问苏州太平军》等书和《诗人李太白》等论文。

1847年

慕维廉 William Muirhead 1822-1900

十九世纪英国伦敦宣道会宣教士，1847年来华，在上海从事宣教、文化与社会活动长达53年，有“上海使徒”之称。慕维廉和北京的艾约瑟（Joseph Edkins）、汉口的杨格非（Griffith John）共享“伦敦会在华三杰”之美誉，三位皆享高寿，在华宣教时间皆超过半个世纪，皆精通中国文化并且著作等身，而且彼此保持长久而深厚的主内情谊。慕维廉到上海之后第二年，就碰上了青浦教案，这是上海开埠后最早也是最大的一宗教案。起因是他和另外两位英美传教士到青浦宣教并散发福音书册而引起的。慕维廉协同麦都思创办墨海书馆（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他的著作《地理全志》，是第一部中文版的西方地理学百科全书，

也是当时东传的西方地理学译著中最为杰出的代表。1856年由慕维廉编译的《大英国志》，为晚清中国人正确认识有关英国历史，提供了最新、最准确的第一手资料。他主笔的《六合丛谈》（*Shanghai Serial*），是上海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期刊。慕维廉的《儒释道回耶稣五教通考》（简称《五教通考》）用中文写成，最早将“五教”，即儒教、佛教、道教、回教和基督教并提，并且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比较研究。他还著有《中国与福音》（*China and the Gospel*）、《格致新法》，以及《新约圣经注解》等重要著作。在1876-1879年间，中国华北地区由于干旱发生大规模饥荒。慕维廉在上海组织成立了“中国赈灾委员会”，联合在华的外国宣教士、商人、外交官员等积极参与赈灾活动。在此期间，慕维廉实际负责了当时赈灾委员会的运作，救助了无数的中国百姓。因其在宣教、文化与著述等方面的巨大成就，1894年，苏格兰爱丁堡大学授予慕维廉神道学博士学位（Doctor of Divinity）。

1847年

伟烈亚力 Alexander Wylie 1815-1887

十九世纪英国伦敦宣道会传教士、汉学家、中国科学史研究之先驱。在华近30年，在宣教、传播西学，并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这几个方面均有重要贡献。在理雅各安排下，伟烈亚力于1847年（32岁）作为伦敦会传教士奉派到上海，协助麦都思管理墨海书馆。1857年初，伟烈亚力创办了上海第一份中文月刊《六合丛谈》，并自任主编，介绍宗教、科学、文化与新闻学，成为晚清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综合刊物之一。1868年，伟烈亚力与英国伦敦会华中区传教士杨格非一起，前往湖北、四

川、陕西等地宣教，行程4000多公里，历时5个多月之久。回来后，伟烈亚力写了《湖北四川陕西三省行程记》考察报告，发表在《亚洲文会北华支会简报》上。在华期间，他宣教足迹遍及了当时清王朝18个省份中的14个，历经艰险。1863年作为圣书公会代理人，推销圣经。在中国30年间，前后共推销出一百万部新约圣经。同时，兼任上海《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编辑，发表了大量有关地理、历史与文化的文章。1864年，麦都思等创立格致书院，伟烈亚力被推选为四位西人董事之一；1874年2月，又被推为格致书院五位创议董事之一。1867年，伟烈亚力创办了英文季刊《远东释疑》，登载专论中国历史、宗教、语言和评论远东局势等文章。他最后的成果是，翻译部分的《汉书》及《后汉书》。伟烈亚力所编写的《中国文献记略》是当时有关汉语书目的第一部全面系统的权威著作。伟烈亚力或赠送或出售，为牛津大学图书馆、皇家亚洲文会北华分会图书馆，以及圣书公会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中文文献，在19世纪英国汉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1847年

晏马太 Matthew Tyson Yates 1819-1888

出生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1847年（28岁），受美南浸信会差遣来到中国上海，同年11月在老北门外建“第一浸会堂”，为上海第一座基督教新教会堂。1853年，小刀会占据上海县城，晏马太坚守邻近战区的教堂，又曾戏剧性地营救驻扎上海的清朝最高官员——苏松太兵备道吴健彰，帮助其从城墙上逃脱。因此在1855年清朝恢复对上海的统治时，帮助他修复了教堂。1860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后，教会经济来源断

绝，晏玛太被迫在工部局及美国领事馆任翻译，1866年-1867年任公董局董事，1868-1869年任工部局董事，且一度任美国驻沪副领事，会审公廨陪审员，同时经营房地产买卖，使得浸信会在上海得以维持，并逐步扩展到江苏省一些地方。1888年3月17日，晏玛太在上海病逝，享年69岁，在华42年。美南浸信会在上海开办的“晏摩氏女中”、在苏州开办的“晏成中学”，校名都为纪念晏玛太对该会的贡献而起。晏玛太创办的“第一浸会堂”，旧址位于黄浦区民国路人民路706号，现为进德小学改办的黄浦区第一中心小学。

1850年

丁韪良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

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一个牧师家庭，1850年（23岁）受美北长老会派遣来到中国，集宣教士、教育家、翻译家、著作家和外交家于一身，有“基督教的利玛窦”之称。在华66载，历经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民国建政等重大历史变迁，对中国近代政治、教育和外交等领域影响甚大。在宁波宣教10年后，50多年都在北京。他主张发展教育以影响中国，意图通过教育向中国人传播基督信仰。1869年出任北京同文馆总教习。1898年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即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任期25年间，培养出一批翻译、外交官、洋务派要员。1858年，中美《天津条约》谈判期间，担任美国公使列维廉的译员，参与谈判并起草了《天津条约》。他发现中国人完全不懂国际法，于是翻译了美国人惠顿的《万国公法》，将当时最新、最通用的国际法介绍到中国，受到恭亲王奕訢的赏识，由总理衙门拨专款付印出版，让中国

人首次看到“权利、主权、人权、自由、民主”等观念。日本“明治维新”之后，该书成为日本法学教科书。他一生出版了中文译著42部，英文著述8部。1906年，完成英文版《中国的觉醒》（*The Awakening of China*）一书。1870年，纽约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885年（光绪十一年），清政府授予他三品顶戴官衔。80岁生日那一天，美国总统威尔逊以及美国部分教育界人士约60余人，赠送给他一面锦旗，表彰他在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1916年12月17日，丁韪良在北京去世，终年89岁，葬于西直门外的一块墓地。

参考：

丁韪良著，沈弘译，《花甲忆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黄昭弘，《清末寓华西教士之政论及其影响》。台北：宇宙光，1993年。

曹刚华，“清末传教士丁韪良早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读《天道溯源》”，《智识学术网》：<http://www.zisi.net/html/xzyj/cghwj/2005-12-28-34682.htm>

丁韪良其他著作：《中国的觉醒》、《北京被围目击记》、《天道溯源》等。

1851年

宾惠廉 William Chalmers Burns 1815-1868

苏格兰英国长老会，1851年（36岁）来华。曾经在欧美两洲是一个很出名的布道家，声如洪钟，在英国和美国领导了属灵复兴运动。1851年，宾惠廉经香港到达福建厦门。1855年，

宾惠廉抵达上海，在那里与戴德生相遇，成为戴德生的属灵之父。1863年，宾惠廉抵达北京，传教四年。1867年，他抵达东北境内牛庄（营口），1868年春天，在牛庄病逝。宾惠廉名言：“Always ready”（随时待命）。

1853年

嘉约翰 John Glasgow Kerr 1824-1901

美国人，美北长老会最早至中国的著名传教士，为西医在中国的奠基人之一。1853年（29岁）抵达中国。1859年接手伯驾创办的博济医院，把当时先进的外科手术带到博济医院。1866年该医院开办博济医学堂，成为中国最早的教会医科学校，同时也成为中国培训女医师之始。根据嘉惠霖1935年《博济医院百年史》的统计，嘉约翰一生共培养了150名中国西医。孙中山先生曾在1886年就读于博济医学堂。1868年，嘉约翰编辑出版发行了中文的《广州新报》，向广大民众宣传医疗卫生知识。1880年改为《西医新报》季刊，为我国最早发行的中文西医刊物。1886年，任中华博医会第一任会长。1898年，在广州建立第一所精神病医院——惠爱医院，已74岁的嘉约翰偕夫人，带着他的男学生进驻惠爱疯人医院，与病人同居一楼，以便照顾他们。嘉约翰的学生们评价：“他的爱人之心是如此伟大，是人们无法测度的。”1901年，在广州去世，终年77岁。据统计，他一生诊治病人74万人次，施行手术49000人次，培训西医150人，编译西医、西药书34种。从1871年开始编译教材，出版了多达34本书籍，如《内科全书》、《病症名目》、《西药略说》、《炎症》、《外科学》等。与赵元意合作翻译了《儒门医学》、《西药大成》、《医学法律》、

《内科理法后编》等。1901年8月10日，嘉约翰在中国从事和传播西医学近半个世纪后，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77岁。所遗留下来的博济医院如今已成为广州岭南大学的附属医院。

1853年

包尔腾 John Shaw Burdon 1826-1907

苏格兰人，1853年（27岁），由大英教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派往中国宣教，主要在江浙一带宣教，期间曾前往南京走访太平天国领袖们。从1858-1861年间，他先后在杭州、宁波和绍兴等地宣教并建立教会。1862年初，包尔腾奉调前往北京开辟宣教工场，成为首批进入北京的西方宣教士之一。包尔腾精通中文，在时任英国驻华公使参赞威妥玛（Sir Thomas Wade）的推荐下，担任中国第一所新式学堂同文馆首任总教习，是中国第一位英语教师。1865年，他和首批入京的英美宣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丁韪良（William Parsons Martin）、施约瑟（Samuel Isaac Schereschewsky）、白汉理（Henry Blodget）等人组成“北京译经委员会”，着手翻译第一部北京官话本《新约圣经》，该译本于1872年出版发行，在中国教会流行使用40余年之久。1872年，包尔腾还与施约瑟合作，在北京编译出版了《公祷书》（*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成为日后中国圣公会通用《公祷书》之蓝本。1873年10月，包尔腾返回英国，并于次年初从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接受了神学博士学位。1874年3月又在兰柏宫被祝圣为香港维多利亚主教（1874-1897），主理包括香港、广东、上海、浙江、福建在内的华南教区和日本教区事务。同年12月13日，包尔腾在香港圣约翰座堂正式就

任，同时兼任圣保罗书院院长。包尔腾还致力于教会本土化，注重培训和任用本土传道人。包尔腾的第二任妻子宝丽娜是戴德生之妻玛丽娅（Mary Dyer）的姐姐，因此包尔腾与戴德生成为连襟。

1854年

戴德生 James Hudson Taylor 1832-1905

著名英国宣教士，十九世纪世界最伟大的宣教士之一，“中国内地会”创始人、会长，带领内地会在中国宣教达52年之久，抢救灵魂无数，直到力尽方休。戴德生于1854年（22岁）受“中国传道会”派遣入华，在上海开始传教。1857年在宁波建立教会。1865年创立内地会，随后差派了超过八百名传教士，建立了125间学校，在中国带领18000信主，在18个省成立了300多所由500多位本地助理参与的传教站。到1936年，教堂达1233所，支堂2261处，传教士1326名，中学10所，小学330所，医院16所，诊所17处，仍然是在华基督教最大的差会（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页169）。戴德生73岁在长沙去世，与妻子及4个孩子葬在镇江。他说：“我若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为中国，而是为基督。”戴家四代子孙继续在中国传教，他们是：

长子戴存仁 Herbert Hudson Taylor

次子戴存义 Frederick Howard Taylor

孙子戴永冕 James Hudson Taylor II

曾孙戴绍曾 James Hudson Taylor III

玄孙戴继宗 James Hudson Taylor IV

内地会重要事件：

1865年内地会创立。

1866年5月26日，“兰茂密尔团队”（Lammermuir）号前往中国，9月30日抵达上海。

1887年，派出“一百名同工”来华。

1888年10月30日，第一批内地会美国传教士抵达中国上海。

1890年，虹口区吴淞路9号正式建立内地会第一个总部大楼，可供300多位传教士办公和居住。

1912年，内地会传道士超过1000人，成为在华最大的传教机构。

1927年-1932年，何斯德发起200人专案活动，援助内地宣教运动，从1200名申请人中挑选了共计203名传教士分三批抵达中国。

参考：

蔡锦图，《戴德生与中国内地会》。香港：建道神学院，1998年。

戴德生著，陆中石译，《带着爱来中国》。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年。

柯喜乐著，韦华林译，《圣爱的火焰：中国宣教史上的海家班》。台北：宇宙光，2006年。

林美玫，《信心行传：中国内地会在华差传探析（1865-1926）》。上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史蒂亚著，梁元生译，《戴德生：挚爱中华》。香港：福音证主协会，1990年。

徐欣娴，《全然奉献为中国的戴家：从戴德生到戴继宗》。台北：宇宙光，2006年。

张陈一萍等编，《惟独基督：戴德生生平与事工图片纪念集》。香港：海外基督使徒团，2005年。

Benge, Janet and Geoff. Hudson Taylor: *Deep in the Heart of China*. WA: Youth With a Mission Publishing, 1998.

Pollock, John, 严彩秀译，《戴德生与玛利亚》。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1977年。

Taylor, Hudson. *China's Millions*. London: Morgan and Scott, 1884.

1854年

倪维思 John Livingstone Nevius 1829-1893

美国北长老会宣教士；宣教学家、农学家、园艺家，被誉为“宣教学之父”和“山东苹果葡萄之父”。1854年（25岁）携新婚妻子抵达中国，在浙江宁波传教，与戴德生、丁韪良结为好友。1861年，前往登州（今蓬莱），将一所残破的观音庙作为住处和布道所，开始了在山东地区的宣教工作，不久就有三人受洗。最初几年的宣教实践使他意识到，基督教若想在中國生根发芽，必须尽快适应中国的本土环境。他逐渐形成了“倪维思计划”，最早提出中国教会“自治、自养、自传”三自原则。鉴于中国妇女饱受压迫、多不识字、缠足、思想封建、迷信等特点，倪氏夫妇把她们作为传福音的对象，帮助她们接受教育，学习技艺，在他们到达登州后的第二年，即收养了几个因父母双亡而被遗弃的女孩子，创办起一所寄宿女子学堂，亲自教他们读书识字，这是山东第一所女子学校，具

有开女子教育之先河的意义。1871年从登州移居烟台，此后在那里生活22年，直到去世。1877年，山东因连年干旱造成空前大饥荒，倪维思同郭显德牧师等人投入赈灾活动。根据他给美国差会的报告，共捐助救济银7600余两，赈济了383个村的32593人。此后，他广泛搜罗美国以及欧洲各地适合于山东土壤气候的果树品类，将美国的苹果、梨、桃、李、欧美的葡萄和日本的草莓引进烟台，以嫁接、插枝、育苗等方法，与中国原产果树交配，繁育新种。他本人未曾想到，50年后，烟台会成为中国第一“水果之乡”。倪维思还进口了优种的荷兰乳牛，养在他的农场上，经交配育种，再介绍推广到各地。在他的《差会工作方法》（*Methods of Mission Work*）一书中，提出许多新的宣教方略，主张中国教会要本土化。在1890年在华宣教士第二届宣教会议上，倪维思是两位大会主席之一。在华40年间，先后写下《中国和中国人》、《差会工作方法》、《神学总论》、《祀天辨谬》、《被鬼附着及有关论述》和《天路指南》等多部书籍。他用英文所著的《中国与中国人》（*China and the Chinese*）一书，内容涵盖中国的史地、物产、制度、政府、宗教、民俗、文字、语言等，是一本妙趣横生的有关中国的百科全书，有助于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亦为后来宣教士提供许多重要的信息。1893年在烟台逝世，享年64岁，安葬在他亲手种植的绿树之下，墓碑上刻着两句经文：“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12:3）；“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1:21）。

1854年

赫德 Robert Hart 1835-1911

英国人，曾担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整整半个世纪（1861年-1911年）。1854年5月（19岁）来华。恪尽职守，在任内创建了税收、统计、浚港、检疫等一整套严格的海关管理制度，新建了沿海港口的灯塔、气象站，为北京政府开辟了一个稳定的、有保障的、并逐渐增长的新的税收来源，清除了旧式衙门中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还创建了中国的现代邮政系统。著有《中国论集》等。赫德与宣教士密切交往，为他们提供了许多帮助，影响重大。

1855年

韦廉臣 Alexander Williamson 1829-1890

十九世纪著名来华传教士、作家、翻译家、西学东渐的主要人物之一，其译述对近代中国的植物学、化学和科技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影响与贡献。出生于英国苏格兰，获法学和神学博士学位后，接受伦敦会之差派，偕夫人伊莉莎白一道来华宣教，于1855年抵达山东烟台，成为最早到达烟台的基督教传教士。韦廉臣和夫人在烟台建造了一座英式教堂和住所，除开荒布道外，还在烟台市和通伸村各建一所医院，并开办学校，成为烟台现代医疗与文化事业的开端。韦廉臣常常骑马到烟台附近城乡传道，因其满口胡须，人皆呼他为“韦大胡子”。韦廉臣夫人在烟台特为穷苦女孩子开办了一所女校，招女生30余人，由教会提供食宿。韦夫人待这些女孩爱如己出，她为人又极和善，每遇穷人，必行周济；每遇孤儿寡妇，必施以援手。故教会教友及其学生，皆视她如慈母一般。

韦廉臣先后到华北、东北、外蒙古等地旅行、销售圣经，散发福音书册，并考察当地风土人情。1868年5月，韦廉臣到达黑龙江，是有史以来基督教进入黑龙江的最早记录。1869年8月，他的弟弟，伦敦会传教士James Williamson在天津附近被杀。1876年《烟台条约》签订后，韦廉臣到济南销售圣书，成为第一位进入济南的基督教传教士。韦廉臣于1856-57年间参加墨海书馆的译述工作，期间与中国著名学者李善兰合译了英国植物学家林德利（John Lindly）所著的《植物学基础》（*Elements of Botany*），此书为近代中国最早的植物学译著。韦廉臣是《六合丛谈》的撰稿人之一，介绍了化学元素的概念及其组成定律，论述了有机物的结构。韦廉臣于1877年在基督教入华70年来的第一次宣教大会上提议，在上海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即“益智书会”，一直在其中担任重要职务。在1890年举行的全国基督教宣教大会上，决议将“益智书会”改组为“中华教育会”，将其影响扩大到教会之外，以囊括整个“中华教育”。韦廉臣提出以基督教信仰来吸引并塑造中国青年。1884年他在英国组织成立了“中华圣教书会”，后称为“同文书会”（Society for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又于1887年11月更名为“广学会”。1876年上海美华书局出版了《格物探原》单行本；1889年，墨海书馆出版了六卷本的《格物探原》，介绍了天文、地理、地质、生物和人体构造等多方面的知识，并附有大量精美的图片。他把《格物探原》中所介绍的科学知识最终归因于上帝的安排。

1855年

杨格非 Griffith John 1831-1912

英国伦敦会著名的来华传教士，华中地区基督教事业的开创者，有“中华使徒”之誉。1855年（24岁），携新婚妻子到达中国，在上海附近传教。1857年进入太平天国辖区考察，1860年到苏州会见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后又见于王洪仁玕，然后前往南京，获得在太平天国境内自由传教的权利。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规定中国内地（通商口岸以外的地方）向传教士开放。杨格非是最早进入中国内地省份的传教士之一。1861年来到汉口，成为第一个进入华中地区的基督教传教士，直到1912年离开，汉口一直是他的工作基地。在汉口创办学校、医院和训练中心。他和他的同事在湖北省建立了至少100个传教站，被称为“街头布道家”，他的讲道深受欢迎，吸引了大批群众来听道。杨格非以在广阔的中国内地旅行布道而知名，有时旅行距离远达3000英里以上。他是第一个进入湖北、湖南、四川三个省份的新教传教士。另一项主要贡献是写作和翻译。1876年，在汉口创办了华中圣教书会，专门编印布道单张与小册子。据1899年统计，全国基督教所用的街头布道文字材料80%以上为该会印刷。他还从事圣经翻译工作，将新约和部分旧约翻译成一种以上的中国方言，又将新约、诗篇和箴言翻译成中文官话（浅文理译本），于1885年出版。他在长江流域创办了一所以他名字命名的培养本地传道人的神学院。1899年，在汉口后花楼居巷（今交通巷）创办博学书院（英文校名：Griffith John College 杨格非学院，武汉市第四中学的前身）。1905年，在主日讲道时中风。在中国服事了55年。于1912年1月返回英国。

1856年

纪好弼 Rosewell H. Gaves 1833-1912

美国加州人，从小受到良好教育，15岁加入基督教会，18岁毕业于美国加州医学院。学生时代就立志要到中国办医传教，因而潜心多年广泛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以备赴华之用。1856年（23岁）受美南浸信会派遣，从纽约出发首次来华，是年8月抵达香港，10月进入广州，在广州一家教会医院当医生。纪好弼在华宣教历56年（1856-1912）之久，其贡献最为卓著的当推神学教育，是中国教会神学教育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两广浸信会的前辈名牧，多出自其门下，如：黄梅、张文开（张亦镜）、陈梦南、杨海峰、曹法选、洗怀棠、欧阳进宽、刘粤声、梅国芳，以及张立才等牧师和教会领袖，都是他的学生。英文著作有《在华四十年》和《昆山迦山的感想》等。中文著作有《醒世要言》、《真理问答》、《罗马人书注释》、《基督生平》、《救主之足迹》、《喻言之解释》，以及《保罗书信浅释》等。

1857年

梅理士 Charles Rogers Mills 1829-1895

美北长老会传教士，母系始祖罗杰斯（Thomas Rogers）为“五月花公约”第18位签名者。1857年（28岁）到上海，在华传教39年。1862年到登州（今蓬莱），建立一所男中，一所女中，一座医院。其子聋哑，1887年，与继室梅耐德（Mrs. C. K. Mills）共同创办了启喑学馆，为中国第一所聋哑人学校。1898年，启喑学馆迁往烟台。梅理士夫人到中国前，曾在纽约一所学校教聋哑学生。创办启喑学馆后，她采用训练聋

哑人说话的标音法和手语进行教学。启喑学馆对中国的聋哑教育影响很大，梅理士夫人设计的手语字母表被中国聋哑学校采用，他们从美国图书中翻译的分级识字课本成为中国聋哑教育的最初教材。该校毕业的学生和他们的亲属或建立聋哑学校，或从事聋哑教育。梅理士还将美国大花生种运到登州，鼓励农民在海边沙地种植，日后花生、花生油成了山东省重要的输出商品，对该省的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

参考：

郭卫东，《中国近代特殊教育史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

1859年

施约瑟 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 1831-1906

美国圣公会上海教区主教，上海圣约翰书院（圣约翰大学）创办人，圣经翻译家，第一位把旧约圣经直接从希伯来原文翻译成北京官话（国语）的学者。出生在犹太人家庭，父母皆为敬虔的犹太人。1859年（28岁）抵达上海。仅仅几年时间，施约瑟就能熟练地使用上海话、北京官话和文言文等交流、书写。丁韪良如此评价：“当日说国语而能将其成语应用自如的，没有别的人可以与他相比。”《北京条约》签订后，北京开始向外国人开放。他在北京居留12年之久（1862-1874），除了宣教之外，还主导了北京官话译本圣经和《公祷书》的翻译工作。1864年，着手将圣经翻译成北京官话，于1872年译竣出版。1874年，在美国圣经公会的资助下，施约瑟的旧约官话译本出版了。1879年，建立圣约翰书院（St.

John's College)。不久又创办了圣玛利亚书院（女中），任命中国人黄素娥为校长。1887年，开始着手修订其官话新旧约圣经，同时又开始将圣经翻译成浅文言，即“施约瑟浅文理译本”。他说：“我不是以教会传教士的身份去承担这职事，我感觉到上帝的呼召，并且是祂特别地预备我去完成这工作。……我把这译本视为我宣教事业中最重要的成就。”他的官话旧约圣经和浅文理新旧约全书分别于1899年和1902年在东京印行，名为《施约瑟浅文理译本》。在《官话和合译本》出版前约二十年间，它是通行最广、最受中国信徒欢迎的译本。

1860年

林乐知 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

美南监理会来华传教士，1860年（24岁）来华，以办报、办学、译书著称，对晚清维新运动影响很大。到上海后不久，美国爆发南北战争，因经费断绝而另辟蹊径，“每日上午在广方言馆教英文，午后赴江南制造局翻译外文书，夜间编辑报纸，主日则到处布道。十年间从未有片刻闲暇。”（傅兰雅语）。1868年，创办《教会新报》（*Church News*）。1874年，改名为《万国公报》（*A Review of the Times*），成为政治，经济，科学和宗教的综合性刊物，针砭时弊，如宣传禁烟，提倡女权和女子教育，介绍西学新知，受到知识分子的欣赏，为清季西洋教士在中国发行的中文报纸中为时最久、影响最大的刊物，成为甲午战争后，维新变法的重要基础。1882年，在上海创办中西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培养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人才，校址建在虹口（今昆山路景灵堂对面，景灵堂原名景林堂，意为“景仰林乐知之堂”）。1900年，扩

建为东吴大学，校址苏州天赐庄，林乐知为董事长、孙乐文（David L. Anderson）为校长，主楼命名为“林堂”。1892年，创办“中西女塾”（后来的中西女中），在慕尔堂（今西藏路沐恩堂）西侧开学，学生多来自上海的富有家庭。1907年5月31日在上海病逝，在华居留时间长达47年。著作《全球五大洲女俗通考》（*Women in All Lands*）；《中东战事本末》，1896年出版，披露甲午战争真相，批评中国存在的积习，震撼中国知识界。

《万国公报》的影响：

（一）康有为不但是《万国公报》的读者，还曾经参加了该报在1894年举办的征文。

（二）梁启超在其所撰的“西学书目表”中，选录广学会出版的书籍共22种，认为最佳者为李提摩太之《泰西新史揽要》与《万国公报》。

（三）国父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交由《万国公报》公开发表，可见他对这份报刊的影响力深具信心。

（四）林语堂自称透过《万国公报》，林乐知成为他童年时私淑的对象，是“在我生命中，影响最大、决定命运的人物。”（林语堂《无所不谈》）。

（五）于右任在“一个牧羊儿的自述”中称：“适莫安仁、敦崇礼两名牧在（陕西）三原传教，先严向之借读万国公报、万国通鉴等书，我亦藉知略知世界大势。”

参考：

Bennett, Adrian. *Missionary Journalist in China: Young J. Allen and His Magazines, 1860-1883*. Georgi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3.

1861年

傅兰雅 John Fryer 1839-1928

出生于英国肯特郡海斯镇一穷苦牧师家庭，1861年（22岁）来华，成为上海最早的中文报纸《上海新报》编辑。1866年，北京同文馆因增设科学班，以恭亲王为首的改革派与保守派发生激烈论战，终因慈禧支持改革而获胜。傅兰雅给父母的信中写道：“中国终于迎来一个新开端。她已经运动起来，加入到国家之间的竞赛中来，恭亲王发表了一个奏折，承认外国科学技术的优越性！”1867年3月，他将恭亲王的奏折在《上海新报》上公开刊登，引起轰动。从1868年到1896年28年期间，在清政府的重要洋务机构，江南制造局任翻译馆的主管。与中国同事一起，翻译了大量科学与工程学读本，经手的翻译超过百种，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化工、矿业、机械工程、医学、农学、地图测绘、军事兵工等多个科技领域。1874年，参与创办中国第一所科学学校——格致书院；1875年主编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份科学杂志——《格致汇编》；1885年创办近代中国第一家科技书店——格致书室。清廷为表彰傅兰雅，特赐他三品头衔。其理想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清楚表达：“惟冀中国能广兴格致，至中西一辙尔。故平生专习此业而不他及。”傅兰雅在1928年为中国创办了一所盲女学校。90岁的傅兰雅在美国去世，在中国生活了35年。他的科学译著和《格致汇编》为封闭、落后的中国推开了近代化的一道门缝。在中国近代史上，传教士主导的科学输入，被称为“科学启蒙第一期”；而晚清洋务派官员领导下的西方科技引进运动，是第二期。

1863年

狄考文 Calvin Wilson Matteer 1836-1908

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来华传教士，教育家、翻译家、慈善家、中国近代科学教育的先驱。1881年，在他创办的文会馆点亮中国第一盏电灯，翻开了中国历史上电灯照明的新纪元。1863年（27岁）携新婚妻子邦就烈（Miss Julia A. Brown）来华，到达山东登州（蓬莱）。1864年开办蒙养学堂，第一批只招收到六名中国穷苦家庭的孩子来读书。该学堂1876年改称文会馆，由小学升为中学。1881年开设大学预科，成为中国境内第一所现代高等教育机构，是著名的齐鲁大学的前身。1890年基督教来华传教士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推选他为“中华教育会”首任会长。狄氏精数学，编有《笔算数学》、《代数备旨》等，成为当时中国初办学堂时的数学教科书。此外，还编有《官话课本》（*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 based on Idiom*），是当时外国人学习汉语必备之书。狄考文在烟台等城市兴建教会博物馆，据1909年长老会山东差会的报告，通过这个博物馆，每年有12000人进入教堂听到福音。狄考文也是译经委员会主席，主持翻译了今天广为流传的圣经中文译本“和合本”。狄考文夫人邦就烈25岁时与狄考文同来登州，编写乐理启蒙，制订乐谱、音符，教导学生欣赏、演唱，创作歌曲，并收集民间曲调，配以新词传唱，很可能是近代最早把西方音乐教育引入中国的人。狄考文在山东从事宣教、教育长达45年之久，被誉为“十九世纪后期最有影响的传教士教育家”，多家美国大学授予他神学博士和法学博士学位。

参考：

丹尼尔·W·费舍著，周振鹏等译，《狄考文：一位在中国山东生活了四十五年的传教士》。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狄乐播著，郭大松译，《中华育英才：狄邦就烈传》。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

1863年

马雅各 James Laidlaw Maxwell 1836-1921

生于英国苏格兰，医师、长老教会传教士，于19世纪后期到台湾南部传教及行医，是英国长老教会第一位驻台湾宣教师，与马偕医师齐名。1863年，马雅各医生（27岁）抵达中国上海。1864年前往厦门宣教区，学习厦门和台湾通用的语言，以准备到台湾宣教。1865年，正式前往台南府城，在台南府城西门外看西街（现今台南市仁爱街43号）租屋，前面为礼拜堂，后面做为医馆，开始医疗与传道的工作，此为英国长老教会在台湾设教的纪念日。1897年，在台湾台南建造新楼医院，并于1900年落成，该医院为台湾首座西式医院。马雅各还推行白话字运动与翻译新约圣经。长子在中国大陆永春行医，次子继承父志来台湾在新楼医院工作，也就是马医生二世或称年青的马医生。

参考：

林治平主编，《马雅各入台宣教150年历史图片巡回展》。台北：宇宙光，2015年。

1863年

郭显德 Hunter Corbett 1835-1920

美国人，1863年（28岁）携新婚夫人利滋·克柏逊小姐（Lizzie Culbertion）受美国北长老会派遣，前往山东登州，协助梅理士建立登州教会。1867年，在烟台成立烟台长老公会。1875年，创办博物院福音堂，陈列珍禽异兽和矿石标本、挂图、各种珊瑚等，规定先听道，后参观，以启迪民智，成为烟台的第一所博物院，一年参观人数就有七万五千至十万人之多。1890年，在烟台南山玉皇顶的“毓璜顶”开办了一家小型诊疗所，一方面为传教士服务，另一方面也为周围前来诊病的居民开药治疗。1896年，将他所创建的文先和会英小学合并扩充为会文书院。在中、美籍助手的帮助下，先后于福山、牟平、栖霞、莱阳、海阳、烟台创办小学40余所，以及医院、博物院、花边、罐头等事业和实业。在中国山东生活、传教、工作长达56年，一生施洗信徒不下三千。在义和团之乱时期，民间流行说：“外国人不杀郭显德，中国人不杀赵斗南（郭显德的学生）。”光绪年间，清廷颁予郭显德“双龙嘉木”勋章一枚。1914年，民国政府颁发给郭显德“双龙嘉禾”奖章一枚。1885年，美国杰佛逊大学赠予神学博士学位；1902年，美国华盛顿大学授予法学博士学位；1906年，任纽约长老会总会主席；1907年，在白宫受到罗斯福总统接见。

1864年

富善 Chauncey Goodrich 1836-1925

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中文圣经官话和合本译者之一。1864年（28岁）入华。他花费大量时间于翻译圣经（和合

本)。1890年参与七人委员会，经过28年之久的翻译工作，富善是译经者中唯一活着看到和合本圣经诞生的人。富善积累了丰富的中文知识，于1891年出版了《中英袖珍字典》，包括10,400个汉字。另外又出版了一本《官话特性研究》，包罗了39,000句汉语。这两本书后来成为当时西方宣教士和各国外交人员学习普通话之必备参考书。经历两度丧偶，1880年5月与撒拉(Sarah Bordman Clapp)结婚，在通州事奉，负责公理会设立的神学院。比他年幼19岁的夫人在家是贤妻良母，对外是杰出公关人才，奔走呼吁戒绝鸦片、倡导妇解、反对缠足、劝女孩子接受教育，筹办养老院等。1905年，二女儿露西因糖尿病逝世，富善夫妇把原准备给女儿读书的钱，另外再筹款，在通州为乡下女孩们创办了通州有史以来第一间寄宿女校，有学生500人左右。1907年，富善夫人来到北京，负责贝满女校。她关心中国妇女的福利，提倡解除妇女缠足和禁鸦片烟，带领无依无靠的妇女缝制衣服，使她们自给自足。富善夫人看见在天寒地冻的北京，人力车夫拉完车，满身大汗，常常脱去上衣，露天休息，有的受凉，得了肺炎死的人不少，她就筹款，在一些人力车夫停车的地方盖起小房子，里面有煤炉子，热水供应，车夫可以在里面休息避寒，等候顾客；她还筹办老人院，收留无依无靠，无儿无女的穷苦老人。

参考：

林振时，《富善》。香港：福音文宣社，1987年。

1865年

李修善 David Hill 1840-1896

英国循道公会在华传教士，汉口训盲书院创始人，是圣徒般的人物。1865年（25岁）到中国湖北省传教。在华宣教31载，赈灾、禁烟、兴办教育与慈善事业。1878年，华北的山西省遭遇大旱，他和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到山西救灾。他吸引了一位嗜食鸦片的儒生席子直归向基督教，后来改名席胜魔，成为山西省一代名牧，创立了戒烟馆，取名叫“天招局”。后来“天招局”扩展到山西、陕西、河南和直隶四省，共有45所之多，拯救了无数人的身体和灵魂。1881年，他在英国国会演讲中力陈鸦片危害，敦促英国政府废除鸦片贸易，并且称：“对于鸦片的进口，中国各地的宣教团体抱全体一致的看法；三百五十位传教士中，没有一位准许吸食鸦片的人进入教会。”最后他坚定地指出：“只有英国政府采取坚决的行动，才能彻底解决中国的鸦片问题。”他将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大笔遗产全部供给中国宣教之用，而他自己终生未娶，日常生活极其简单。无论是在宣教还是在慈善方面，他总是奉行“尽量给”的原则，既出钱又出力，造福于中国的百姓。在武汉到处都留下了李修善的足迹，其最大贡献之一在于盲人教育方面。1888年，李修善在汉口创办了“汉口训盲书院”，采用盲文盲字教学，创造出的一套盲人授读法——“大卫·希尔法”。李修善还著有《华中的传教事业》（1882）和《在华中二十五年：1865-1890》等书。李提摩太在其回忆录《亲历晚清45年》中提到，李修善是“能用中文写作的，在传教士中少见的睿智之士。”在1890年于上海举行的第二次全国性宣教大会上，李修善与倪维思二人被推举为大会的共同主席，分别

代表英国籍与美国籍的宣教士。1896年，李修善病逝于汉口，年仅56岁。他的棺木是由那些盲校学生们亲手赶制出来的。

参考：

林辅华、鲍康宁，《向毒品宣战的先锋——李修善与席胜魔》。台北：宇宙光，2006年。

1865年

花之安 Ernst Faber 1839-1899

德国基督教礼贤会传教士、汉学家、植物学家。在华35载，先后在香港、广东、上海和青岛等地从事宣教与著述，著作等身，被誉为“19世纪最高深的汉学家”。1865年（26岁）来华，起初以行医和办学等方式传播福音。后因喉部患疾导致发音困难，而不得不离开教会讲坛，专心从事写作和汉学研究，通过文字著述继续传扬基督福音。先后在圣教书会（Book and Tract Society）和同文书会（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任职，出版发行了不少福音书籍。他继承了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观点，认为要使福音在中国广传，就必须适应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只有当基督信仰达到“补儒、合儒、超儒”的目的时，才能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可，进而透过他们，去影响人民大众。著有《儒教汇纂》、《中国宗教导论》、《中国妇女的地位》、《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等书，最为著名、影响最大的是《自西徂东》（*Civilization, China and Christian*）。花之安还是一位著名的植物学家，曾协助俄国著名植物学家贝勒编写了《中国植物》，并为该书写了《中国经书中的植物学》一

章，于1892年出版。为纪念这位进入青岛的开拓者，同善会建立了“花之安医院”，又称为“华德医院”（今人民医院）。

1866年

曹雅直 George Stott 1835-1889

苏格兰人，温州教会的拓荒者。19岁因滑倒膝盖受伤被迫截掉左腿。申请加入内地会时，戴德生问，“是什么理由让你如此地执着与坚持呢？”“因为那些两条腿的不愿意去，那就让我这一条腿的去吧！”他后来成为内地会的先驱之一。曹雅直于1866年（31岁）抵达宁波，次年来到温州。他的主要策略是开设学校，借着教育来传福音。他创立了男童寄膳寄宿学校，共有12个贫穷的男孩，为他们提供餐饮、书本、文具、住宿，每月十大洋的补贴。1870年，曹雅直迎来了妻子曹明道（Grace Ciggie Stott），成立了女子学校，拓展了在温州的工。经过十数年辛勤耕耘，花园巷教堂和学生宿舍陆续完工，城外的平阳、桐岭等地也建立了教会。曹雅直服事中国23年后，于1889年复活节去世。奇妙的是，他带领信主的第一个中国人，与他一样，也是一个独腿人。

参考：

莫法有，《温州基督教史》。香港：建道神学院，1998年。

1869年

谢卫楼 Davelle Z. Sheffield 1841-1913

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出生于美国纽约怀俄明的甘斯维

尔，1869年（28岁），新婚才两个多月，就携妻从旧金山启程赴中国传教。在通州传教和办学40多年，建立潞河男塾，逐渐成为华北协和大学，谢卫楼担任院长，直到1909年退休。后与美以美会在北京开办的汇文大学合并成燕京大学。他还编译了第一部中文教科书《万国通鉴》，起了启蒙作用。他相信“教育就是传教”。谢卫楼还积极参与“中国教育会”（1890年正式成立，当时中文名为“益智书会”，1902年改名“中国学塾会”，1905年正式定名为“中国教育会”）的有关活动，1890年他是首批会员，1896-1899年，担任主席职务，1899-1902年又任出版委员会主席。

1870年

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1845-1919

英国大英浸信会传教士。1870年（25岁）抵达上海，随后去山东烟台、青州传教。1876-1879年华北五省发生空前严重的旱灾（丁戊奇荒），他在山东青州赈灾，后来那里成为大英浸信会山东传教区的中心。1878年，他又去灾情更重的山西太原赈灾，由此开辟了大英浸信会的传教区，同时也结交了中国官绅。1890年，李提摩太去天津临时任《中国时报》中文版主笔。接下来他几乎一生主要的时间都是负责上海广学会的工作（1891年-1916年）。广学会1891年到1915年这段时间是中国最大、最重要的新式出版社之一，是当时影响最大的出版社，出版过两千种书籍和小册子。他主持翻译并出版了一些著名书籍，如《在华四十五年》、《七国新学备要》、《天下五大洲各大国》、《百年一觉》、《欧洲八大帝王传》、《泰西新史揽要》、《新政策》等20多种。内容是19世纪欧美各国变

法图强的历史，出版后风行一时，印行3万部，是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的主要参考书之一。李提摩太的传教方式类似于利玛窦，是以西方文化吸引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他和许多政府官员，如李鸿章、张之洞都有较深的交往，张之洞曾拨款一千两资助广学会。他还结交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如：康有为、孙中山等。梁启超担任过他的中文秘书。李提摩太对中国的维新运动有很大影响。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期间，他积极活动于上层人士之间。1901年，庚子事变之后，李提摩太请求各国政府把一部分中国赔款拿出来，在山西等地设立大学。清政府赐他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开诰封三代。1919年4月20日在伦敦逝世。

参考：

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

苏慧廉著，周振鹏译，《李提摩太在中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1870年

景雅各 James Gilmour 1843-1891

英国人，伦敦会派遣，于1870年（27岁）来华，是《在蒙古人中间》的作者。《观察家》杂志如此描述：“他确实什么都不害怕——无论是狗还是小偷，无论饥饿还是气候，他对一切处之泰然。”他的朋友说：“他是受神的感召来从事这项伟大事业的，因为没有人能想象到这么一个精力充沛、不知疲

倦的人做着这么一些平平淡淡的小事。”1922年出版的《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汉译本说：“伦敦会最抱布道热忱之景雅各君始创游行布道工作，远至本区恰克图等处，道途跋涉，莫迫安处垂二十余年。惟最先之十五年，景氏仅于本区北部游牧蒙人中专任布道工作……然尤勤奋不倦，直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诚为吾道中之佼佼者。”伦敦会的传教士文显理（G. H. Bondfield）在《蒙古传务》中说：“景雅各对蒙古人的热爱以及为劝化他们而单独进行的努力将永远不会被忘记。”

1871年

马偕 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1901

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医师与长老教会牧师，于19世纪末期至台湾传教与行医，与马雅各齐名。汉名叫偕叡理，但在台湾，一般人皆称为“马偕博士”或“偕牧师”。西方历史学者以“宁愿烧尽，不愿朽坏”赞赏马偕的一生。1871年，马偕（27岁）抵达台湾打狗（高雄）。1872年4月10日开设北台湾第一所教会——淡水教会。同年，马偕在其所租之寓所开始诊疗。1880年，马偕获得加拿大皇后学院（今皇后大学）赠与荣誉神学博士学位。1882年，“Oxford College”（牛津学堂）落成，汉文名“理学堂大书院”。1883年，马偕前往宜兰、花莲等原住民的居住地传教。1887年，苏澳教会成立。1895年，完成 *From Far Formosa*（《台湾遥寄》），这是他在台湾18年间的经历见闻和研究。1899年3月9日，马偕的两位女儿同日出嫁，大女儿偕玛连嫁给陈清义牧师，二女儿偕以利嫁给柯维思长老，成为“台湾媳妇”。1901年6月2日，马偕在淡水逝世，

享年57岁，骨灰葬于今日淡江中学内。他的独子偕叡廉回台湾承接马偕衣钵，继续投入宣教与教育工作，并1914年创办了淡江中学，在日据时期成为台湾子弟得以受教育之教会。

1872年

明恩溥 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公理会来华传教士、基督徒政治家、宣教史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1872年（27岁）受美国公理会派遣来华。先后居住在天津、山东等地，兼任上海《字林西报》通讯员，著有多卷有关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著作；是促成美国退还庚款、在华兴办高等教育和北京协和医院的重要人物。1877年，山东发生大灾荒，被派往山东，在鲁西北一带赈灾，向115个村庄，4,000余户人家，约12,000灾民发放了12,000银元的赈款，同时也把福音传给各地百姓，使多人信主。1882年，明氏夫妇在山东恩县庞家庄定居，此后生活在农村长达20年之久，先后在那里建立教会、小学、中学和医院，使庞家庄成为美国公理会在中国的第一个农村宣教据点。1893年，又在附近的临清县建立了教会。到1905年时，他已经在恩县若干村庄设立支堂38处，信徒也增至1,260人，大大拓展了公理会在华的宣教工场。他在华54载，“在华日久，爱华日深”，他的爱并不完全表现在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赞美，而是爱之切，责之痛。他极力向美国总统老罗斯福建议退还中国庚子赔款，用来兴办教育。1907年，在上海举行的第三次全国宣教大会上，按照以往惯例，大会主席仍由一位英国籍和一位美国籍的宣教士共同担任，明恩溥和英国长老会牧师汲约翰（John C. Gibson）被公推为大会主席。著有多部关于中国的书籍，包

括《中国人的性格》（*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国乡村生活》、《今日的中国和美国》等。其中《中国人的性格》一书曾被鲁迅向国人郑重推荐。

1873年

香便文 Benjamin Couch Henry 1850-1901

美北长老会传教士，1873年（23岁）由美北长老会派遣到中国，在广州传教。1884年-1895年任岭南学堂第二任监督。他的儿子香雅各（James M. Henry）1924年-1927年担任岭南大学最后一任外籍校长。著有 *The Cross and the Dragon Light in Broad East*（《基督教与中国》）和《岭南记》（*Ling-Nam Interior View of Southern China*, 1886）。

1873年

慕拉第 Charlotte Digges “Lottie” Moon 1840-1912

美南浸信会传教士，21岁已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是少数女性获此殊荣的其中一位。1873年（33岁）入华，在华传教近40年。她反对妇女缠足，兴办女学，提高妇女的家庭和社会地位；赈灾济贫，深受当地民众的爱戴。慕拉第致函差会，要求给予女宣教士有平等的声音和服侍的自由。要求差会差派更多宣教士来中国，并鼓励美南浸信会的妇女们在各堂会组织宣教部，用来支持宣教士，结果诞生了妇女宣教士联合会，为宣教筹集了许多经费。第一次“圣诞节宣教奉献”筹了\$3,315.26美元，足够差出三位新宣教士去中国。而为了纪念慕拉第领导妇女们第一次成功支持美国海外宣教事工的圣诞节奉献，每年的圣诞奉献就称为“慕拉第圣诞奉献”，至今总共筹募超过20亿

美元。她于1892年及1902年回国，在美国期间，曾经坐在老罗斯福总统的轿车里，与总统交谈过。一位中国牧者如此描述慕拉第：“她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国乡间最不为人所知的村民，在崎岖泥泞的小路上奔走，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山村妇女、农夫；在荒野开垦福音良田，建立基督的教会。这一个曾有数位仆人伺候的大家闺秀，受过高等教育的阔小姐，却宁愿远航半个地球，来到中国，与最穷困的乞丐为伍，把自己的钱财与饥饿的人分享，最后却饿死在圣诞节。”1911年，慕拉第在登州组织成立了“华北妇女传道协会”，并任会长。同时她在胶东地区经管着七个学校。最后为救助灾民，自己反因饥饿而死。

参考：

Benge, Janet and Geoff. *Lottie Moon: Giving Her all for China*. Seattle, WA: Youth With a Mission Publishing, 2001.

Harper, Keith, ed. *Send the Light: Lottie Moon's Letters and Other Writings*. Macon, Georgia: Mercer University Press, 2002.

1875年

马根济 John Kenneth Mackenzie 1850-1888

十九世纪英国伦敦宣道会医疗宣教士。1875年（25岁）来华，先后在湖北汉口和天津行医传道，济世救人；与晚清重臣李鸿章交往甚密，在天津先后创立了西医院和医学堂。1879年2月，马根济奉调去天津担任伦敦会教会医院院长。1879年8月1日，李鸿章邀请马根济为李夫人看病。因治愈李夫人而声名大噪，不但成为李鸿章的家庭医生，也成为许多达官贵人

的医疗顾问，是天津百姓心目中的再世华佗。1880年，在李鸿章支持下，近代中国第一所规模完整的私立西医医院“伦敦会施医院”或称“天津医病馆”（Viceroy's Hospital）建成。1881年，马根济通过李鸿章建立“总督医院附属医学校”（Viceroy's Hospital Medical School），这是晚清时期第一所官办的西医学院，即“北洋医学堂”之前身。1886年秋，在华医疗宣教士决定成立“中华博医会”，马根济是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并且协助编辑出版该会会刊《博医会报》。因其在华的医疗成就和贡献，马根济荣获御赐双龙宝星勋章一枚。1888年2月（清光绪十四年二月），马根济因劳累过度，积劳成疾，加之从病人身上感染天花而逝世，年仅38岁。1924年1月18日，马大夫纪念医院主楼落成，为日后“天津市人民医院”。

1882年

赐斐德 Harold Scholreld 1851-1833

中国内地会医疗传教士，出生于英国名门富户，牛津大学毕业的医生。1882年（29岁）与新婚妻子一同来华，在山西太原落脚，从事医疗工作和街头布道。内地会发起征召70位来华同工，他写信表示愿意每日代祷，直到达到目的为止。他日复一日热切地为英国大学生能看重中国的需要而祷告。他尤其希望第一流的人才——像牛津、剑桥的毕业生——能够献身到中国来，因为中国的需要与挑战都太大了。最后，在1884年，征召70人的目标不仅仅达到，而且超过了7人。他在1883年的炎夏，为一位患者看病时不幸被感染，去世时年仅32岁，来华仅三年零一个月。戴德生得悉赐斐德病逝的消息是

在1883年8月1日这一天；在同一天里，他也收到“剑桥七杰”之一何斯德要求加入“中国内地会”的申请表，从而使他的心大得宽慰。真可谓：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1885年3月，“剑桥七杰”接过福音的火炬，步赐斐德之后尘，来到中国。

1882年

司督阁 Dugald Christie 1855-1936

出生英国苏格兰，东北西医第一人。1882年（27岁）于爱丁堡大学医学传教士学院毕业，受长老会差派，携新婚妻子来到中国宣教。1883年5月，在沈阳创办东北第一家西医诊所——盛京诊所，行医治病和传播福音，因成功治疗霍乱而扬名沈阳。1892年开始创建“盛京医学院”。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创建七所红十字战地医院，抢救千余名中国伤病员。1895年，获光绪皇帝授予双龙敕书和勋章。1896年，在沈阳创建了东北第一座妇女医院。1910年-1911年间，沈阳流行肺鼠疫，司督阁担任沈阳抗击鼠疫总指挥，首次建立现代疾病防控指挥体系。1911年4月，沈阳国际鼠疫会议召开，11个国家33名学者、专家到会，司督阁在会议上发言，清政府摄政王在故宫接见会议代表。1912年，奉天医科大学建成，成为东北三省第一所医科大学。1922年4月21日，司督阁因年事已高，辞职回国。辞行前在北京受到中华民国总统徐世昌的接见，并获得民国政府授予的嘉禾勋章。1936年，司督阁在苏格兰病逝，终年81岁。去世前，他一直担任中国苏格兰协会会长，始终关心中国的留学生，关心中国，关心沈阳，为医院和医学院筹款。

参考:

陈醒哲,《盛京医事:东北现代医学奠基人司督阁与盛京医院的历史绘卷》。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12年。

杜格尔德·克里斯蒂,《奉天三十年》。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

1882年

李佳白 Gilbert Reid 1857-1927

美国在华社会活动家,尚贤堂创办人。出生于美国纽约州长岛,父亲是一位牧师。1882年(25岁),毕业于纽约协和神学院,同年受美北长老会差遣,到中国山东省济南等地传教。1890年,李佳白到上海参加第二届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全国大会,提出将传教对象转向中国上层社会的设想。经总税务司赫德、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和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的引荐,他获得李鸿章的好感。1897年2月,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批准,在北京正式成立尚贤堂(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a),李佳白为督办,举办各种中外联谊活动。除举办新年茶会等各种中外社交活动外,还开设学堂、藏书楼和华品陈列所,并邀请多种宗教的人士聚集在尚贤堂,进行演讲和探讨,宣扬宗教大联合的思想,李佳白也因而受到许多传教士的批评。1900年被义和团烧毁。1922年恢复北京尚贤堂,致力于各种和平活动。1927年9月30日,李佳白在上海去世。其子李约翰将尚贤堂土地出售,另租博物院路亚洲文会大楼办公,维持到1950年代初。

1882年

苏慧廉 William Edward Soothill 1861-1935

英国人，著名的教育家，汉学家。1882年（21岁）到上海。在温州定居二十余载，设立禁烟所，修医院，建学堂。编撰便于外国人学习中文的《四千常用汉字学生袖珍字典》。被聘为山西大学堂的总教习。随后受聘牛津，成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向西方介绍中文典籍，将《论语》翻译成通俗英文。与理雅各、李提摩太、赫德、严复、王国维、蔡元培、吴佩孚、胡适、顾颉刚、费正清等有着或近或远的联系。

参考：

沈迦，《寻找苏慧廉》。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

1884年

梅耐德 Annette E. Thompson 1853-1929

美国长老会女宣教士，中国聋哑教育的先驱，山东烟台启喑学馆（烟台市聋哑中心学校前身）的创始人，曾在烟台从事聋哑教育达40年之久。梅耐德出生在纽约，幼年丧母，为了继母所生的聋弟弟能够受到教育，进入罗彻斯特聋哑学校，成为教师。在那里，她认识了在中国传教的查尔斯·罗杰斯·米尔斯先生，开始了一段影响中国聋哑教育发展的浪漫史。1884年，梅耐德（31岁）来到烟台，与大她24岁的米尔斯结为伉俪，成为他的继室夫人。梅耐德很快着手为中国聋哑孩子编写第一本教材《启喑初阶》。1887年，用美国罗彻斯特聋哑人学校“无声工作者”组织赠送的50美元，在烟台北部小城登州（今蓬莱）丹崖山下的一座平房里，催生出中国第一所聋哑学

校。次年，学馆取名“登州启喑学馆”。它是烟台市聋哑中心学校的前身，中国的聋哑教育由此开始。1895年，施耐德的丈夫去世，学校资金短缺。为了筹资建学，她的足迹遍布欧美与中国16座城市，不断写信、宣传、演说，呼吁赞助，购置土地，兴建了教学楼。历经几十年的艰难奔波，最终建起了中国第一所男女混读全日制正规的聋哑学校。1906年，施耐德的外甥女安妮塔卡特小姐的到来，使烟台启喑学校的管理和教学又上了新的台阶，形成了较完整的体系。从1898年至1941年间，学校多次组织师资培训班，先后培训教师44人，分别来自杭州、南京、上海、北京、成都、香港等地，其中还有一位来自朝鲜的平壤。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为当地聋哑学校的创始人或骨干教师，在全国创建了11所聋哑学校，从而推动了聋哑教育在全国乃至东南亚地区的开展。她被引见给罗斯福总统，罗斯福总统对她在中国所做的一切给予了高度评价。

1885年

剑桥七杰 The Cambridge Seven

受到戴德生影响，加入内地会，1885年去中国传教的七名剑桥大学学生。他们的行动影响到了美国，导致Robert Wilder发起学生志愿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盖士利 William Cassels 1858-1925

圣公会牧师，来华后在四川工作，10年后的1895年，又被任命为圣公会新设华西教区的主教，直到1925年在那里去世。

司米德 Stanley Smith 1861-1931

前圣三一学院划艇队队长，被派到华北，不久能用流利的中文讲道。1931年1月31日在中国苏州去世。死前一天晚上，他还讲道。

施达德 Charles Thomas Studd 1860-1931

曾是英国著名的板球手，知名度最高。当时他毅然决定放弃板球传教曾引起很大轰动。来中国后他主要在山西传教，1894年，由于健康恶化回国。后来又前往印度和非洲传福音。

杜明德 Arthur Polhill-Turner 1862-1935

于1888年被按立为牧师，并迁居到人口密集的乡下，以尽量接触更多人。1900年庚子之乱中他留在中国，没有离开，直到1928年退休回到英国。1935年去世。

杜西德 Cecil Polhill-Turner 1860-1938

毕业于伊顿书院（Eton College），是骑兵中尉，后来放弃升迁机会，和其他人一同来到四川传教，他负责西北部西藏边区。1892年，他和妻子在暴乱中几乎被杀。1900年，他因健康不佳回国，无法再回到中国。1938年在英格兰去世。

章必成 Montague Beauchamp 1860-1939

高大、强壮的划船选手，男爵之子，1900年庚子之乱中撤离中国，1902年又回到中国。1911年他回到英国参军。1935年，他的儿子成了第二代来华传教士，他也回到中国；1939

年，他在儿子的传教站去世。

何斯德 Dixon Edward Hoste 1861-1946

出身皇家军事学院（Royal Military Academy），将军之子，原是炮兵少尉。后来接续戴德生领导中国内地会30年。1935年退休后仍留在中国，后来被日军关进集中营，直到1945年释放，在中国居留达60年。1946年5月，他在伦敦去世，是“剑桥七杰”中最长寿的一位。

参考：

蒲乐克著，尧孝秦译，《剑桥七杰》。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1975年。

1886年

卜舫济 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 1864-1947

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教育家，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达35年。1886年（22岁）抵达上海。1887年，被派到美国圣公会在华创办的第一所大学——圣约翰书院任英语教习。1888年6月，年仅24岁的卜舫济被提拔担任圣约翰书院校长。在他领导下，圣约翰特别注重英语教学，规定所有科目（除中文）一律采用英语教学，校园内一律采用英语进行交流。体育是圣约翰的另一个特色，运动水平居各校领先地位。1905年，卜舫济使圣约翰成为一所四年制本科大学，拥有文、理、医、神四个学院，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立案，所授学位被美国各大学认可。卜舫济主张教育与政治分离，反对以学校为基地从事政治运动，为此曾与热衷于从事政治运动的学生发生数次冲突事

件。1925年，一批学生因此退学，另组光华大学。卜舛济在年轻时，曾经力排众议，在1888年9月27日，与圣公会华籍牧师黄光彩的女儿圣玛利亚女中校长黄素娥结婚。83岁逝于上海，葬于上海静安公墓。

1887年

柏格理 Samuel Pollard 1864-1915

英国卫理公会传教士，滇东北老苗文的创建者之一，著名社会改良实践者。1887年（23岁），抵达中国云南，1892年，在昭通负责当地的传教事宜。他与当地苗民从速记符号中（据说从苗民传统服装图案中）获得灵感，为苗语创建了一套被称为“滇东北老苗文”的书写系统，时至今日，这套书写系统仍然被不少苗民使用。他还设法改良当地风俗，引入各种体育、文化活动，使得石门坎这个偏远苗寨一度成为中国西南部最为先进文明的地区之一。

参考：

阿信，《用生命爱中国》。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

柏格理等著，东人达等译，《在未知的中国》。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

Grist, W. A. *Samuel Pollard: Pioneer Missionary in China*. London: United 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 1971.

1888年

古约翰 Jonathan Goforth 1859-1936

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1888年（29岁），加拿大长老会

派遣古约翰夫妇到中国。在山东省烟台落脚。当他前往河南彰德府（今安阳）建立基地时，戴德生叮咛他说：“弟兄啊，如果你想进入河南省传福音，一定要以膝代步啊（Go forward on your knees）！”从此“以膝代步”这句话就成为古约翰与豫北同工们的座右铭，无论大小事情，除非先有充分的祷告，绝不敢冒然采取行动。11个孩子中有4个在中国病死。1908年，带领东北教会大复兴，主题是“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亚4:6）。这次的复兴使东北教会的受洗人数，从1907年的一千五百人骤增为1908年的三千五百人。1919年和1922年，有“基督将军”称号的冯玉祥将军，由于仰慕古约翰之名，特别邀请他到军中传扬福音，他欣然携师母同往。在那里，古约翰每天两次向1,000多名军人讲道，其中多半属长官级。师母罗莎琳德亦与官长太太们聚会，劝她们认罪悔改，信靠耶稣。古约翰在最后一天替960位军人施洗，为4,000多名官长和士兵主持圣餐。1936年以东北四平街为基地，向吉林扩展。1930年，视网膜脱落右眼失明。书写《在中国的神迹》（*Miracle Lives of China*）。1933年，左眼失明。古约翰在中国宣教48年。死于加拿大，享年77岁。

参考：

陈福中译，《古约翰小传》。香港：基督徒出版社，2002年。

Goforth, Roslind. *Jonathan Goforth*. Minneapolis, Minnesota: Bethany House Publishers, 1986.

1895年

和受恩 Margaret E. Barber 1866-1930

英国女传教士，以对中国基督徒领袖倪柝声、王载的影响而著称。1895年，作为英国圣公会传教士第一次来华，在福州一带传教，任教于圣公会在仓前山开办的陶淑女中。1911年，42岁时第二次来华，这次是独立传教士，住在闽江口附近、马尾罗星塔渡口对岸荒僻的乡村白牙潭（今属长乐市营前镇），过了20年卑微、隐藏的生活（1911-1930）。不久，她领会到，以自己外国女传教士的身份，难以取得成效，必须兴起中国青年传道人。10年之后，1921年，一艘中国军舰停泊在白牙潭，23岁的海军军官王载被和受恩住宅中的诗歌所吸引，上岸拜访。他辞去海军军官职位，专门传道。福州圣公会三一书院18岁的学生倪柝声、王载的弟弟王峙、王连俊、陆忠信、陈再生、姜活石、张诗贞等加入。和受恩是影响倪柝声最大的一位属灵前辈。是她将弟兄会和内里生命派的著作介绍给倪柝声，由此将中国早期福音的性质转入追求属灵生命经历的阶段。她也严格地训练倪柝声，要求倪柝声不论是否有道理，都要学习顺服年长5岁的王载。他形容她是一个发亮的基督徒，只要走进她的住处，立刻觉得神在那里。和受恩1930年去世，享年63岁。她离世时身无别物，仅遗圣经一本给倪柝声。里面有一句话：“为己我无所求，为主我求一切。”

1896年

毕得经 Horace Pitkin 1871-1900

20世纪初期，美国宣教史上“耶鲁三杰”之一，另两位是路思义（Henry Luce）和艾迪（Sherwood Eddy）。三人在

耶鲁念书时，与英国“剑桥七杰”一样，都加入了“学生志愿军”。在上一个跨世纪的年代中，成千上万的西方基督徒知识青年，响应“在我们这一代中将福音传遍世界”的号召，成立“学生志愿海外宣教运动”（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耶鲁在中国”的宣教计划应此而开创，旨在将福音传到未得之地，传给未得之民。耶鲁毕业后三人一起进入神学院受装备，一起访问各大学，传递宣教负担。他们不仅才华洋溢，同工间也情同手足，因此被称之为“耶鲁三杰”。毕得经是三人当中最早出发到中国的，他于1896年（25岁）踏上中国，选定河北省保定府为工场。四年后，不幸遇上了义和团之乱，惨死在暴徒的手中。他的妻子在兵慌马乱之中带著襁褓中的婴孩逃回美国。毕得经在临死前，仍顾念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对福音的需要，恳请一位中国基督徒务必设法将自己最后一个心愿转达给在远方的家人；他的心愿是：当儿子25岁时，一定也要来中国宣教。儿子后来果真回到中国去，继续父亲的宣教工作。

1896年

穆德 John Raleigh Mott 1865-1955

长期领导基督教青年会（YMCA）和学生志愿宣教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为了实现“在这一代把福音传遍天下”，组织国内外青年投入宣教及社会服务工作。推动普世教会合一运动，于1910年，主持历史性的爱丁堡宣教会议（Edinburgh Missionary Conference），联合各宗派，在宣教大使命下合一，此会议成为二十世纪教会合一运动的起头。1948年，被推举为普世教会协会（World Christian

Council) 终身荣誉会长。1946年, 获颁诺贝尔和平奖。穆德出生于美国纽约州, 十五岁时就读上爱阿华大学 (Upper Iowa University), 1885年转学至康乃尔大学。次年他参加了剑桥七杰之一的施达德所主领的聚会。施达德的一句话深入他心: “你为自己求大事吗? 不要求这些。你要先求上帝的国。” 同年, 他参加了慕迪在麻州北田 (Northfield) 营地所举行的聚会, 在为期一个月的聚会中有一百位青年学生决志要成为海外宣教士, 他是其中之一。1876年, 上海有了第一个青年会, 1885年福州英华书院和潞河书院, 1890年杭州泓道女校都建立了青年会。1896年 (31岁) 穆德来华访问, 到广州、香港、上海、山东、天津、北京、上海、福州、杭州、南京、宁波等地历时三个月, 访问所有高等教育机关, 使中国学校青年会增加了22个。1898年, 北美协会派格林、路思义、巴乐满等人到中国, 分别负责天津、上海和香港的基督教青年会工作。1901-1949年穆德8次来华, 对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学生运动的展开起到重要作用。

1896年

盖落窪 Archibald Edward Glover 1859-1954

中国内地会派往中国的英国籍传教士。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 在国内担任牧师9年后, 于1896年 (37岁) 加入中国内地会, 来到中国山西省潞安 (长治), 协助“剑桥七杰”之一司米德传教。1900年夏季, 义和团事变期间, 带着怀孕6个月的妻子、4岁的儿子和3岁的女儿, 从山西潞安, 经河南, 颠沛流离, 备极艰辛, 终于逃生到汉口。1904, 出版传记: 《神迹千里》。

参考：

盖落窠著，张玫珊译，《神迹千里》。香港：海外基督教使团，2000年。

1897年

路思义 Henry Winters Luce 1868-1941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服务于中国华北齐鲁大学与燕京大学两校的美国传教士，《时代杂志》、《生活》杂志创办人亨利·路思义（Mr. Henry R. Luce）之父。在耶鲁大学就读时，恰逢学生志愿海外宣道运动（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的潮流席卷美国各大学校园，八千多名大学毕业生远赴海外宣道。当时毕德经（Horace T. Pitkin, 1900年在中国保定殉道）、艾迪（Sherwood Eddy）和路思义就是加入这一行列中著名的“耶鲁三杰”。1897年，路思义（29岁）带着新婚三个月的妻子伊丽莎白，受美北长老会的派遣，到达山东登州（蓬莱），在狄考文创办的文会馆中担任物理教师。在那里，路思义发起了山东省历史上第一场篮球比赛。1909年3月，路思义邀请文会馆校友丁立美牧师来校主领奋兴聚会，有116人决志献身传道，占全校学生的三分之一以上，开始了著名的中华学生立志布道团。1917年，齐鲁大学在济南南关建校，路思义被推选为副校长。1919年，路思义又担任燕京大学副校长，受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之托，赴美募得巨款，建成燕京大学。校园中建有一个六角形的思义亭，以纪念他对燕大的贡献。在台湾台中市东海大学校园中，建有纪念他的路思义教堂。

1897年

金纯仁 Gershom Whitfield Guinness 1869-1927

生于法国巴黎的一个英国宣教士，1897年（28岁），受中华内地会派遣到河南开封福音医院行医传教。在中国服务30年之久。金纯仁父亲早年与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在宣教工作上彼此相知，首批到中国宣教的爱尔兰宣教士就是由他介绍给内地会的。金先生的长女金乐婷姑娘（Miss Geraldine Guinness）是戴先生的二儿媳，即戴存义夫人（Mrs. F. Howard Taylor）。金纯仁因抢救伤员感染伤寒病而逝。他的亲密同工吉培生医生如此怀念金纯仁：“虽然他的心灵因中国的悲惨战祸而伤痛，但他并不气馁。可惜因其身心过度劳累，以致没有足够的体力战胜病魔。他热爱中国，甚至为中国人牺牲了生命，可以无愧地接受基督赐给他的冠冕。……金医生是基督耶稣的精兵，一位热爱传福音的使者，又是病人最真挚的朋友。我们为他的离世而哀悼，为他已得到的奖赏而高兴，并要效法他留给我们的美好榜样，至死忠心。”

1899年

马士敦 John Preston Maxwell 1871-1961

出生在台湾的英国宣教士，马雅各之子，医学博士。1899年（28岁）来华，在华40年。起先任职于福建永春医馆，承担散布在永春山区15间教会的牧养工作，并任教会学校的“名誉总理”。在宣教医生的工作一文中，提及中国女孩被迫缠足的惨状，以及当地任意杀死女婴的恶风。他写道：“孩子们，你们要为生在基督教世界中感谢上帝，因为只有基督教赋予女性应有的地位。”1919年，受聘为北京协和医学院妇产科主任，

直到1936年退休。期间曾任北京协和医学院执行委员会三成员之一，代行院长职务。马士敦为中国妇产科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培养出了一批著名的妇产科专家，如林巧稚。

1902年

乐灵生 Frank Joseph Rawlinson 1871-1937

生于英国，移民到美国，1902年（31岁）被美南浸信会派往中国传教。1912年任上海《教务杂志》编辑，该杂志成为全国基督教的权威杂志。1919年前后，参与大型统计资料《中华归主》的编辑。曾担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中国学校部主任。1937年8月14日，淞沪会战爆发的第二天，一架中国飞机重磅炸弹误投到上海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分界线的爱多亚路和西藏路（当时叫虞洽卿路）路口的中央，恰好在那里等候红灯的乐灵生牧师被击中身亡。

1902年

盖群英 Alice Mildred Cable 1878-1952

20世纪初在中国山西、甘肃和新疆传教的著名女传教士。出生于英格兰，布商的长女，在伦敦国王学院接受了基本的医学知识，加入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1902年（24岁）经美国抵达中国，被派到山西霍州传教站，在此结识了一生的同伴冯贵珠（Evangeline French）。1908年又加上妹妹冯贵石（Francesca French）。她们在霍州建立了一座教堂、一个200人的女子学校、一个诊所和一个戒毒所。1923年，三位人到中年的女传教士前往甘肃肃州（酒泉），开辟了一个新的传教站。以此为基地，每年

穿过戈壁沙漠，向西进入从没有传教士进入的区域，向新疆的穆斯林妇女传教。三人教会了许多人汉语，使她们能阅读圣经和其他属灵书籍。三人到处赶集，在每个集市上卖圣经，并且高唱圣歌。她们进入2,700户住家和帐篷，举办650次聚会，送出4万册以上的圣经。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三人回到英国。1943年，三人都获得皇家苏格兰地理学会颁发的活石奖章。1942年，盖群英还获得皇家中亚学会颁发的劳伦斯纪念奖章。在英国，盖群英任圣经公会副主席。1952年4月30日在伦敦去世。

参考：

凯伯·法兰屈著，黄梅峰译，《戈壁沙滩》。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

1904年

司徒雷登 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

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教育家、外交官。1876年6月生于杭州，父母均为美国在华传教士。1904年（28岁）开始在中国传教，曾参加建立杭州育英书院（即后来的之江大学）。1908年，应南京金陵神学院聘请，司徒雷登携妻儿离杭赴任。1919年，创办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并任校长、校务长。1946年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8月离开中国。在中国近代教育史和中美关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毛泽东于1949年8月8日写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由新华社发布。历史学家林孟熹评论：“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

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司徒雷登晚年在病榻上完成了他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

参考：

郝平，《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司徒雷登著，常江译，《在华五十年》。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

司徒雷登著，陈礼颂译，《司徒雷登日记》。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

1906年

胡美 Edward Hicks Hume 1876-1957

美国传教医师、医学教育家。出生于印度艾哈迈德讷格尔，其父亲与祖父都是在印度的传教士。1897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901年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1906年（30岁）受雅礼会（Yale-in-China Mission）邀请来到中国，在长沙西牌楼街的一家旅馆创办了雅礼医院（湘雅医院前身）并任院长。1914年湖南育群学会与美国雅礼协会联合创建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出任学校教务长、湘雅医院院长。在胡美的辛勤耕耘下，医学院得到长足发展，为中国培养出许多西医人才，从而成为中国第一流的医学院校，在当时享有“南湘雅，北协和”之美誉。1946年，胡美出版了《道一风同：一位美国医生的在华生涯》（*Doctors East, Doctors West: an American Physician's Life in China*）可谓其中西医思想之集大成。1926年返回美国，任纽约医学研究学校与医院（New

York Post-Graduate Medical School and Hospital) 主管、执行副院长。参与创办了海外基督教医务理事会 (Christian Medical Council for Overseas Work) 并于1938年至1946年间担任秘书。1953年, 雅礼会将其英文名称改为“耶鲁中国协会” (Yale-in-China Association), 中文名称为“雅礼协会”, 后被更名为“湖南医学院”, 1987年升格为“湖南医科大学”。

参考:

Chapman, Nancy E. *The Yale-China Association: A Centennial History*.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906年

郭慕深 Karen Gormsen 1880-1960

出生在丹麦, 毕业于哥本哈根医科学学校。1906年 (26岁) 受丹麦基督教长老会的派遣, 到安东 (今丹东) 传教, 在八道沟元宝山麓开始了传教生涯。来华第二年开办了安东历史上第一所女医院, “安东基督教女医院” (丹东市妇产科医院前身), 从此当地有了综合性妇产科医院。1909年安东发生霍乱传染疾病, 她带领抢救医治。在医院周围, 她不时发现被遗弃的病残婴儿。因此, 于1916年, 在安东市元宝山中学胡同14号建立了育婴堂, 收养了大批孤儿。为了改善孤儿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 她于1924年返回丹麦国募捐。1930年回国, 又将父母在丹麦留给她的遗产全都带回安东, 用在育婴堂。她终身未嫁, 在中国44年工作中, 养育了近300个孤儿。为中国、为安东人民奉献了她的毕生精力和所有的爱。

1908年

富能仁 James Outram Fraser 1886-1938

中华内地会英国宣教士，1908年（22岁）来华，被誉为“傣僳人使徒”，老傣僳文字创造者，在中国云南边陲傣僳族人中间生活、宣教、服务近30年之久。1928年，被任命为云南省监督，负责云南全省的宣教工作。1938年，富能仁翻译的傣僳文《新约全书》在上海印刷出版。他将自己的生命献给傣僳族人民，是东亚最成功的基督教传教士之一。

参考：

林茨，《福音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Crossman, Eileen著，然超智译，《山雨：富能仁新传》伯克莱：福音文宣社，1989年。

Taylor, Howard. *Behind the Ranges: Fraser of Lisuland*. London: Lutterworth Press, 1944.

1908年

柏立美 Victor Plymire 1881-1956

美籍牧师，1908年（25岁）来华。开始在甘肃传教，后来与妻子和一岁的儿子到达青海西宁的湟源县，在那里生活了27年，向藏人传福音，在西宁民主街设立教堂。1919年，内地商人在湟源创办中华内地会，礼拜地点设在城内庆盛合商店，有教徒60余人。1921年，柏立美牧师夫妇到湟源布道，设立教堂，将中华内地会归为神召会，由柏立美和英籍传教士明约翰主持。1925年，又到同仁保安镇建立教堂。1949年柏立美回国后，由中国牧师石子明主持，教徒约100余人。

参考：

Plymire, David V. *High Adventure in Tibet: The Life and Labors of Pioneer Missionary Victor Plymire*. Springfield, Missouri, 1959.

民国基督教

1912年

魏特琳（华群）Wilhelmina “Minnie” Vautrin
1886-1941

美国基督会在华女传教士。1912年（26岁）毕业于伊利诺斯大学，同年受美国基督会差会（United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y）派遣来中国，担任安徽庐州府（合肥）基督会三育女中校长。1916年金陵女子大学在南京成立时，她担任教育系主任。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她积极营救中国难民，利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保护了上万名中国妇孺难民。

参考：

Hu, Hua-ling. *American Goddess at the Rage of Nanking: The Courage of Minnie Vautrin*. Illinois: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00.

Minnie Vautrin. *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 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 Illinois: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2008.

The Nanking Massacre Project: A Digital Archive of Documents & Photographs from American Missionaries Who Witnessed the Rape of Nanking from the Special Collections of the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http://www.library.yale.edu/div/Nanking/Vautrin.html>

1916年

钟爱华 Lemuel Nelson Bell 1894-1973

美南长老会在华医疗传教士，1916年（22岁），携新婚妻子（Virginia Leftwich Bell），来到中国江苏省北部的清江浦（今淮安市区），担任仁慈医院的外科主任和行政院长。基督教仁慈医院由美南长老会创设于1892年，后来扩充到380张病床，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长老会医院（现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在华25年，救人无数。二女儿路得（Ruth）嫁给著名美国福音布道家葛培理。葛培理曾开玩笑说：“我想上帝给我路得，是要让我得到钟爱华这位岳父。”从1956到1973年，担任美国最具影响的福音派杂志《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执行编辑。

参考：

Pollock, John. *A Foreign Devil in China*. USA: Billy Graham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 1971.

1920年

贝德士 Miner Searle Bates 1897-1978

1920年，贝德士（23岁）作为基督教联合传教会（United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y，即基督会）传教士，前往中国金陵大学任教，在中国服务长达30年之久。1935年，他在哈佛大学的中国历史系获得哲学博士。1937年，抗战爆发，贝德士以副校长名义负责留守金陵大学校产。南京沦陷前后，参与发起和组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后改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并担任最后一届主席。从1937年到1941年，为保护中国

难民和揭露日军暴行做了大量工作。在他的领导下，20多万难民安全逃离日军的魔爪。

参考：

章开沅，《贝德士文献》。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1925年

李爱锐 Eric Henry Liddell 1902-1945

英国苏格兰宣教士、体育运动家、教育家。父母在天津一带宣教长达30年之久。李爱锐于1902年1月16日出生在中国天津。1924年巴黎奥运会400米赛冠军，被誉为“苏格兰飞人”。他如此描述自己对短跑的热爱与感受：“是上帝使我跑得快。我跑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上帝的喜悦。”1925年，李爱锐（23岁）参加完最后一次在苏格兰的赛跑后，毅然放弃了在家乡优厚的条件和待遇，放下享誉全球奥运金牌选手的美誉，回到了他的出生地天津，到“新学书院”（Tientsin Anglo-Chinese College，现为天津第17中学）担任老师，从此开始了他近20年的教学生涯。1932年6月，李爱锐在苏格兰公理会教会正式接受按立成为牧师。1925年英租界工部局邀请他参与民园体育场的改造工程。他以伦敦斯坦福桥运动场（今切尔西主场）为参照，设计、规划出一个标准化的运动场，同时还对诸如跑道结构、灯光设备、看台层次等改建提出了一系列的、具有先进水平的建议。在他的筹划与监督下，民园体育场成为当时亚洲范围内首屈一指的综合性和体育场，且成为拥有最好运动跑道的体育场之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军关入山东潍

县集中营；二战胜利前夜，病逝于集中营内，年仅43岁。临终，护士安妮把他抱在怀里，他最后轻声说：“完全降服”（complete surrender）。他平时最喜欢唱，也最喜欢教别人唱的一首赞美诗是“我灵镇静”（Be Still, My Soul）。李爱锐根据英文版 *Discipleship* 一书翻译成中文书《基督徒生活纪律》。

参考：

Caughey, Ellen, 华琳译，《因爱着中国》。北京：知识出版社，2008年。

Weatherby, W. J. *Chariots of Fire*.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81.

电影《烈火战车》。

1928年

杨宓贵灵 Isobel Kuhn 1901-1957

出生于加拿大，是爱尔兰裔人。受富能仁牧师感召，到傈僳族传教，1928年（27岁）入华，与丈夫杨志英（John Kuhn 1906-1966）办“雨季圣经学校”。在中国云南的傈僳族中间宣教长达21年之久，被称为“傈僳人女使徒”。她一生总共写了8本书，其中自传性的有《寻》和《我成了一台戏》。

参考：

杨宓贵灵著，许崇明译，《寻》。台北：中国主日学协会，1961年。

狄贺妮著，徐成德译，《傈僳女使徒-杨宓贵灵》。香

港：大使命基督徒团契，1996年。

魏外扬，《传爱组曲》。台北：宇宙光，1998年。

Repp, Gloria. *Nothing Daunted: The Story of Isobel Kuhn*. Greenville. South Carolina: Bob Jones University Press, 1994.

1930年

艾伟德 Gladys Aylward 1902-1970

英国独立女传教士，被称为“小妇人”。1930年（28岁）出发来华传教，接替年老的卫理会传教士珍妮·劳生（Jeannie Lawson），在西方广为人知。在阳城，艾伟德创立了八福客栈用于传教。曾接受当地道尹的请求，帮助妇女放脚，还曾帮助平息当地监狱的骚乱，收养了很多孤儿。1936年，艾伟德加入中国籍。1949年回到英国家乡，英国广播公司的Alan Burgess将她的经历写成《小妇人》（*The Small Woman*）。1970年病逝台湾，长眠于环境幽静的关渡基督书院，面对淡水河出海口，朝向中国大陆。

参考：

Benge, Janet & Geoff. *Gladys Aylward: The Adventure of a Lifetime*. Seattle: YWAM Publishing, 1988.

Horie, Hildegard著，朱惠慈等译，《比1000头水牛更够力》。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2003年。

1932年

师达能 John Cornelius Stam 1907-1934

1932年，师达能（25岁）被内地会差遣前往中国宣教，

与早一年到中国的未婚妻史文明 (Miss Betty Scott) 汇合。次年，师达能和史文明在山东济南结婚。蜜月后，二人同返舒城，积极投入各项教会事工：主持主日崇拜和各种聚会；街头布道；售卖福音书或派发福音单张等。而史文明则更多地负责妇女和儿童工作。1934年9月11日，女儿爱连 (Helen Priscilla Stam) 在芜湖医院诞生，11月下旬，一家迁至旌德县。不料，12月7日，师达能夫妇被红军绑架撕票，双双引颈就戮。刚刚出生两个多月的女儿爱连被丢在床上，无人照料达36个小时之久。但在神的奇妙护佑下，竟被人发现并拯救出来，交给她外祖父母史盖臣夫妇 (Dr. & Mrs. Charles E. Scott D.D.) 抚养，被称为“神迹婴儿” (Miracle Baby)。殉道时，师达能牧师年仅27岁，史文明28岁。在他们合葬的墓碑上，中间镌刻着一个十字架，十字架左边刻着：“师达能 (JOHN CORNELIUS STAM)，1907年1月18日。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十字架右边刻着“师史文明 (ELISABETH SCOTT STAM)，他的妻子，1906年2月22日。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师达能牧师和师史文明师母，成为中国内地会第73和74位献身于中国的殉道士。他们的殉道感动多人投入中国宣教事工。

1934年

艾得理 David Howard Adeney 1911-1994

英国内地会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受戴德生和“剑桥七杰”传记的影响，剑桥大学神学院毕业后，于1934年（23岁）秋天来华，前往河南乡村，从事乡村布道。1941年，艾得理

全家离开河南前往美国休假，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艾得理只得留在西方。1943年，艾得理回英国负责内地会的祷告事工。1945年二战结束，艾得理得以返回中国，与赵君影合作，在重庆成立了基督徒学生联合会，吸引许多流亡大学生成为基督徒，后来他们中间产生了不少基督徒领袖。1950年，传教士被逐出中国，加入美国校际团契（IVCF）。1956年，抵达香港，担任第一届国际学生福音团契（IFES）远东区总干事。1968年，在新加坡成立“门徒训练中心”，培育亚洲基督徒领袖。1976年，艾得理退休搬到加州柏克莱，又发起“守望中华”代祷。1979年，海外基督使团（内地会自中国大陆撤出后的新名称）在香港成立“中国事工部”，艾得理是北美支部的召集人。1994年5月，艾得理病逝加州柏克莱家中，葬于邻近的中国山（China Hill）。

参考：

Carolyn Armitage, 黄从真译, 《艾得理传：全力以赴的一生》。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 1993年。

洪晓华、王晓春, 《学生福音事工的推手：艾得理与韩宝琏》。台北：宇宙光, 2006年。

附录二

大秦景教
流行中国碑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碑文：原文、中译文、英译文

景教碑文——原文

粤若。常然真寂。先先而无元。窅然灵虚。后后而妙有。总玄枢而造化。妙众圣以元尊者。其唯我三一妙身无元真主阿罗诃欤！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风而生二气。暗空易而天地开。日月运而昼夜作。匠成万物然立初人。别赐良和令镇化海。浑元之性虚而不盈。素荡之心本无希嗜。泪乎娑殫施安。钾饰纯精。间平大于此是之中。隙冥同于彼非之内。是以三百六十五种。肩随结辙。竞织法罗。或指物以托宗。或空有以沦二。或祷祀以邀福。或伐善以矫人。智虑营营。恩情役役。茫然无得。煎迫转烧。积昧亡途久迷休复。于是我三一分身景尊弥施诃。戢隐真威。同人出代。神天宣庆。室女诞圣。于大秦景宿告祥。波斯睹耀以来贡。圆甘四圣有说之旧法。理家国于大猷。设三一净风无言之新教。陶良用于正信。制八镜之度。炼尘成真。启三常之门。开生灭死。悬景日以破暗府，魔妄于是乎悉摧。棹慈航以登明宫。含灵于是乎既济。能事斯毕。亭午升真。经留二十七部。张元化以发灵关。法浴水风。涤浮华而洁虚白。印持十字。融四照以合无拘。击木震仁惠之音。东礼趣生荣之路。存须所以有外行。削顶所以无内情。不畜臧

获。均贵贱于人。不聚货财示罄遗于我。斋以伏识而成。戒以静慎为固。七时礼赞。大庇存亡。七日一荐。洗心反素。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惟道非圣不弘。圣非道不大。道圣符契。天下文明。太宗文皇帝。光华启运。明圣临人。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贞观十有二年秋七月。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象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京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一人。宗周德丧。青驾西升。巨唐道光。景风东扇。旋令有司将帝写真转模寺壁。天姿泛彩。英朗景门。圣迹腾祥。永辉法界。案西域图记及汉魏史策。大秦国南统珊瑚之海。北极众宝之山。西望仙境花林。东接长风弱水。其土出火浣布。返魂香，明月珠，夜光壁。俗无寇盗。人有乐康。法非景不行。主非德不立。土宇广阔。文物昌明。高宗大帝。克恭纘祖。润色真宗。而于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圣历年。释子用壮。腾口于东周。先天末，下士大笑。讪谤于西镐。有若僧首罗舍，大德及烈，并金方贵绪，物外高僧。共振玄纲。俱维绝纽。玄宗至道皇帝。令宁国等五王亲临福寺建立坛场。法栋暂挠而更崇。道石时倾而复正。天宝初。令大将军高力士送五圣写真寺内安置。赐绢百匹。奉庆睿图。龙髯虽远。弓箭可攀。日角舒光。天颜咫尺。三载，大秦国有僧佶和。瞻星向化，望日朝尊。诏僧罗舍僧普论等一七人。与大德佶和。于兴庆官

修功德。于是天题寺榜。额载龙书。宝装璀璨。灼烁丹霞。睿扎宏空，腾凌激日。宠賚比南山峻极。沛泽与东海齐深。道无不可。所可可名。圣无不作。所作可述。肃宗文明皇帝。于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元善资而福祚开。大庆临而皇业建。代宗文武皇帝。恢张圣运。从事无为。每于降诞之辰。赐天香以告成功。颁御馔以光景众。且干以美利故能广生。圣以体元故能亨毒。我建中圣神文武皇帝。披八政以默陡幽明。阐九畴以惟新景命。化通玄理。祝无愧心。至于方大而虚。专静而恕。广慈救众苦。善贷被群生者。我修行之大猷。汲引之阶渐也。若使风雨时。天下静。人能理。物能清。存能昌。歿能乐。念生响应。情发自诚者。我景力能事之功用也。大施主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赐紫袈裟僧伊斯。和而好惠。闻道勤行。远自王舍之城。聿来中夏。术高三代。艺博十全。始效节于丹庭。乃荣名于王帐。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公子仪。初恐戎于朔方也。肃宗俾之从迈。虽见亲于卧内。不自异于行间。为公爪牙。作军耳目。能散禄赐。不积于家。献临思之颇黎。布辞憇之金罽。或仍其旧寺。或重广法堂。崇饰廊宇。如翬斯飞。更效景门。依仁施利。每岁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备诸五旬。喂者来而饭之。寒者来而衣之。病者疗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清布达娑。未闻斯美。白衣景士。今见其人。愿刻洪碑。以扬休烈。

词曰：

真主无元，湛寂常然。
 权舆匠化，起地立天。
 分身出代，救度无边。
 日升暗灭，咸证真玄。

赫赫文皇，道衬前王。
乘时拨乱，乾廓坤张。
明明景教，言归我唐。
翻经建寺，存歿同航。
百福偕作，万邦之康。
高宗纂祖，更筑精宇。
和宫敞明，遍满中土。
真道宣明，式封法正。
人有乐康，物无灾苦。
玄宗启圣，克修真正。
御榜扬辉，天书蔚映。
皇图璀璨，率土高敬。
庶绩咸熙，人赖其庆。
肃宗来复，天威引驾。
圣日舒晶，祥风扫夜。
祚归皇室，袄氛永谢。
止沸定尘，造我区夏。
代宗孝义，德合天地。
开贷生成，物资美利。
香以报功，仁以作施。
畅谷来威，月窟毕萃。
建中统极，聿修明德。
武肃四溟，文清万域。
烛临人隐，镜观物色。
六合昭苏，百蛮取则。
道惟广兮。应惟密强。

名言兮三一。主能作兮臣能述。建丰碑兮颂元吉。

大唐建中二年岁在作噩大簇月七日大耀森文日建立

时法主僧宁恕知东方之景众也

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士参军吕秀岩书

助捡校试太常卿赐紫袈裟寺主僧业利

捡校建立碑僧行通

僧灵宝 僧内澄 僧光正

僧和明 僧立本 僧法源

僧审慎 僧宝灵 僧玄览

僧景通 老宿耶俱摩 僧明一

僧保国 僧志坚 僧义济

僧玄德 僧利用 僧元□

僧奉真 僧至德 僧和光

僧景福 僧太和 僧崇德

僧德建 僧去甚 僧广德

僧福寿 僧□□ 僧宝达

僧□明 僧和吉 僧□□

僧遥□ 僧日进 □□轮

僧[這-言+(衣-一)]和 僧崇敬 僧惠通

僧□□ □居信 僧文贞

僧文明 僧昭德 僧曜原

僧仁□ 僧玄真 僧明泰

僧利□ 僧敬德 僧元□

僧干□ 僧守一 僧光□

僧闻顺 僧普济 僧凝□

僧冲和 僧英德 僧灵德
僧灵寿 僧还淳 □敬真

后一千七十九年咸丰己未武林韩泰华来观幸字画完整重造碑亭
覆焉惜故友吴子苾方伯不及同游也为怅然久之。

资料来源：

基督教网络图书馆<http://library.ccim.org>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大秦寺僧景净述

<http://www3.fosss.org/DZZJian/ShowArticle.asp?ArticleID=235>

景教碑文——现代中文

奇妙真道，亘古不变，真实无声，在万有之先，无始无终。眼所不能见，自在永在。创造宇宙万物，至高至圣，三位一体，奇妙永恒的独一真神。判十字以定四极，赐圣灵以生二气；开天劈地，地不再空虚混沌；日月运行，昼夜肇始；万物匠成，始造人类先祖；赐予上帝本来良善和熙之形象，令人管理天地万物；性情宽厚谦卑，单纯朴素。撒旦魔鬼的诱惑，败坏了原初完美纯洁的本性；恶性渐长，善性渐微，自结365种罗网，纷然沓至；误以偶像为源头，或将原初旨意化为乌有，或藉祈祷祭拜以求福祉，或假冒为善自傲于人。营营役役，思虑愁烦，茫然无得，徒劳无功；久久迷途在愚昧之中，找寻不到原初路径。

因此，三一真神派遣光明荣耀的圣子救主弥赛亚，降卑为人，来到人间。神差遣天使报佳音，宣告童女玛利亚怀孕生子于大秦（叙利亚）。明星告祥，波斯博士见星象带着礼物来朝拜圣子。二十四位圣者所著齐家治国之伟大古老的律法（旧约）因此而成全。祂建立三一真神之新教，圣灵默默指引；因信而称义；祂设定八方境界，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祂开启真理之门，引人出死入生。祂将日光照耀黑夜，摧毁魔鬼的罪恶；乘坐慈悲之舟登临明亮殿宇；受圣灵恩膏，日清月朗，回归真我。

留下二十七卷圣书（新约），阐明原初之智慧，开启灵

魂之眼睛。行施洗之礼，洗涤浮华，洁净罪恶。以十字架为印记，万民归一。鼓瑟敬拜，恩惠之音远扬；朝东而行，奔走生命荣美之路。信徒留须以表明外在作为，理发以象征内在平静，不蓄奴婢，不分贵贱，不聚货财，有福同享，禁食警醒，洁身自好，一天七次礼赞，七日一次祭奠，洗涤心灵，回归圣洁。

永恒真理之道，奇妙而难以命名。其功用昭彰，勉强称之为景教。道不圣不能彰显，圣无道不能弘扬。圣道契合，天下文明。

唐代开国皇帝太宗年间，贤明的圣人大秦国主教阿罗本，从叙利亚来到中土。驾青云，载真经，乘风破浪，不畏艰险，于公元635年（贞观9年），抵达长安。太宗皇帝派遣宰相房公玄龄，带宫内臣仆到西郊欢迎，迎入朝廷。邀请至皇帝藏书室，翻译经典，皇帝在禁宫内亲自问道。深感此道之正义和真实，皇帝下令传授与民。

贞观十二年七月，皇帝诏令曰：“圣道没有恒定不变的名字，圣人没有始终如一的身体。教化随地域而设，为使众生得益裨。德高望重的叙利亚主教阿罗本，携带经文和圣像，远道而来，敬献于京城。详其教旨，玄妙自然，观其元宗，源于真理。言辞清晰，道理隽永。济物利人，宜行天下。”于是，命令在京城义宁坊建造大秦寺（教堂）一所，由二十一位僧人管理。周朝衰败，老子去了西方，唐朝兴起，基督的教导来到了东方。

太宗命画皇帝肖像一幅，悬挂于寺庙之壁，天姿泛彩，满室生辉。圣光带着祥和的气象，永远的光芒照亮了殿宇。

根据西域图记和汉魏史策，大秦国南统珊瑚之海，北及众宝之山，西望仙境花令，东接长风若水。出产火棉布，返魂香，明月珠，夜光壁，夜不闭户，人民康乐。律法非光明不能通行，君主非贤明不能坚立。疆土广阔，文风昌明。

高宗皇帝继位，仰慕真道。于诸郡建立景教寺，立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大道畅通行于民间，国安民富。景教寺遍布各城，家庭殷实而幸福。

圣历年（公元699年），佛教得势，佛教言语在东边盛行。先天末（公元713年），卑鄙之徒在西边讥笑诽谤。景教主持罗含，主教及烈，以及各城尊敬的高僧（教士）舍弃俗世的追求，同心合一，极力维护天道。玄宗皇帝命令宁国等五位郡主，亲临吉祥的景教寺庙，建立敬拜之所。他重修了倾倒的法梁，重竖了废弃的道石。

天宝初年（公元742年），玄宗至道皇帝令大将军高力士送五皇画像，安置于寺内。并赐绢百匹，以示庆祝。龙须虽远，弓箭可攀，日角舒光，天颜咫尺。公元744年，大秦国僧侣洁和，望着这颗感化人心的星星（中国），监察如同日头发光的皇帝，来朝廷拜访。皇帝差罗含、普论等一行七人，在兴庆宫，与洁和主教做礼拜。于是，皇帝在教堂题字立碑。其光彩如翡翠霞光，其智慧如宏空光芒。美丽的馈赠高过南山，丰

富的恩泽深于东海。大道包容万象，可行的均可命名。圣人无所不能，所作的便可述说。

肃宗文明皇帝在灵武等五郡重建景教寺，美善的福分临到国土，帝业建立，普天庆贺。代宗文武皇帝大力推广遵行圣道，崇尚自然无为。圣诞之日，赐天香以宣告成功，发粮食以荣耀圣道。圣人活出圣道之美善，故圣道得以广传。

我们圣人般的文武皇帝设立了朝廷八个分部，以分幽暗与贤明。他分辟了九个类别，更新教义。阐明玄理，无愧于心。圣道宽广，专静而恕，救赎苦难，赐福大众。圣道扎根，渐渐推广。若能使风调雨顺，天下宁静，人顺道理，物体洁净，生活安宁，死者安乐，沟通融洽，情发自诚，此乃景教之功用啊。

大恩人伊斯僧，北方节度副使（Associated Secondary Military Commissioner for the Northern Region）、试殿中监（Examination-Palace Overseer），身着御赐金紫袈裟，性情温和，虔诚躬行。他从王舍之城（Rajagriha）来到中国，睿智博学，多才多艺。先效力于宫廷，后在疆场扬名。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子仪，起先在北领兵，后随肃宗皇帝旅行。他虽为皇家内侍，路途中与他人等同。为肃宗之手足，军中之耳目。乐施善助。将御赐之珠宝以及黄金地毯献上。不仅修缮旧堂，而且建设新堂。修饰殿堂，使廊宇辉煌。在行为中彰显躬行真道，依仁施利。每年召集各寺僧侣，灵修侍奉五十天，寒冷有衣穿，生病的得医治，死者得以安葬。最虔诚的佛教僧

侣之中，如此美善闻所未闻。身穿白衣的景教信徒，见如此信德，愿刻碑立传，以纪念弘扬他们的德行。

颂

无始无终，亘古永恒的真神，无声无息，无形无像，
拥有教化和完善的权柄和能力，创造了万物天地，
三一真神派遣圣子，降临人间，施行无边的拯救。
太阳升起，黑暗消失，见证真神的奥秘。
太宗皇帝，荣耀辉煌，继承前帝之道，
平定乱象，天地乾坤扩大，
光明的景教传唐朝，
翻译经典，建立教堂，生死有渡，
百福皆作，万邦康乐。

高宗继位，修筑圣殿，
和谐宽敞明亮的宫殿遍满中土。
真道宣明，封官正法，井然有序。
人民康乐，天下太平。

玄宗登临皇位，克己躬行，灵修正道，
御榜扬辉，天书蔚映，
皇图璀璨，全国崇敬，
百业兴旺，安居乐业。

肃宗继位，治理国土带着天威，

如日头般明亮舒展，和祥之风吹遍全地，
皇室归于安乐，肃杀之风永远凋谢。
骚动叛乱止息，皇朝坚立。

代宗孝顺公义，德合天地。
开明慷慨，国富民强，
赏赐恩德，仁爱好施，
如日辉煌，如月璀璨。

建宗统极之时，韦修明德，
武力平息四海，文章万域清明，
观测人心，镜观万物，
光照全地，百蛮景仰。

真道何等宽广！人之回应何等渺小！
三一真神难以命名！
主的作为是应当称颂的。
于是，建立丰碑，歌颂那自在永在的上帝。

建于大唐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元月第七日，主日。
建立时，法主僧宁恕主管东方景教众圣徒
朝议朗前行太司土参军吕秀岩书

（陈上宇参考英文版翻译）

景教碑文——英译文

Nestorian Tablet

Eulogizing the Propagation of the Illustrious Religion in China
with a Preface, composed by a priest of the Syriac Church, 781 A.D.

Horne Introduction:

This remarkable record of the fact that Christianity flourished in medieval China is a huge stone about ten feet high. Carven dragons and a cross adorn its summit, and its main shaft is completely covered with some two thousand Chinese characters. It stands now in the Peilin or "Forest of Tablets" in Sian-fu, this Peilin being a great hall specially devoted to the preservation of old historic tablets. Up to a few years ago the ancient stone stood with other unvalued monuments in the grounds of a Buddhist monastery, exposed to all the assault of the elements. Only European urgency has led to its being preserved in the Peilin.

The Nestorian sect of Christians still exists in Western Asia and was in a thriving condition in Syria in the sixth century. It sent missionaries widely over Asia. Marco Polo recorded having found Christian churches in China; and Roman Catholic missionaries of later centuries found there a few Nestorians still practising a debased form of their half-forgotten faith. This much concerning the Nestorian Christianity in China we have long known. Then, with the modern opening of the empire, the old Nestorian stone was found. It tells its own history, and tells it plainly, how the Nestorian monks came, how Chinese officials were appointed to listen to their explanations, and gravely approved of the new religion as having "excellent principles." Various emperors accepted, or at least included, Christianity among

their religions; and the faith prospered, and had many thousands of followers, and in the year A.D. 781 erected this stone in commemoration of its triumphs.

Now, alas, only the stone remains. The record of the sect's decay has needed no stone to make it manifest. Nestorian Christianity, shut off from its mother land by the rise of the Mohammedan powers in between, proved unable to resist the inroads of ignorance and superstition and changing political affairs. It degenerated and disappeared.

“Behold the unchangeably true and invisible, who existed through all eternity without origin; the far-seeing perfect intelligence, whose mysterious existence is everlasting; operating on primordial substance he created the universe, being more excellent than all holy intelligences, inasmuch as he is the source of all that is honorable. This is our eternal true lord God, triune and mysterious in substance. He appointed the cross as the means for determining the four cardinal points, he moved the original spirit, and produced the two principles of nature; the somber void was changed, and heaven and earth were opened out; the sun and moon revolved, and day and night commenced; having perfected all inferior objects, he then made the first man; upon him he bestowed an excellent disposition, giving him in charge the government of all created beings; man, acting out the original principles of his nature, was pure and unostentatious; his unsullied and expansive mind was free from the least inordinate desire; until Satan introduced the seeds of falsehood, to deteriorate his purity of principle; the opening thus commenced in his virtue gradually enlarged, and by this crevice in his nature was obscured and rendered vicious; hence three hundred and sixty-five sects followed each other in continuous track, inventing every species of doctrinal complexity; while some pointed to material objects as the source of their faith, others reduced all to vacancy, even to the annihilation of the two primeval principles, some sought to call down blessings by prayers and supplications, while others by an assumption of excellence held themselves up as superior

to their fellows; their intellects and thoughts continually wavering, their minds and affections incessantly on the move, they never obtained their vast desires, but being exhausted and distressed they revolved in their own heated atmosphere; till by an accumulation of obscurity they lost their path, and after long groping in darkness they were unable to return. Thereupon, our Trinity being divided in nature, the illustrious and honorable Messiah, veiling his true dignity, appeared in the world as a man; angelic powers promulgated the glad tidings, a virgin gave birth to the Holy One in Syria; a bright star announced the felicitous event, and Persians observing the splendor came to present tribute; the ancient dispensation, as declared by the twenty-four holy men [the writers of the Old Testament], was then fulfilled, and he laid down great principles for the government of families and kingdoms; he established the new religion of the silent operation of the pure spirit of the Triune; he rendered virtue subservient to direct faith; he fixed the extent of the eight boundaries, thus completing the truth and freeing it from dross; he opened the gate of the three constant principles, introducing life and destroying death; he suspended the bright sun to invade the chambers of darkness, and the falsehoods of the devil were thereupon defeated; he set in motion the vessel of mercy by which to ascend to the bright mansions, whereupon rational beings were then released, having thus completed the manifestation of his power, in clear day he ascended to his true station.

Twenty-seven sacred books [the number in the New Testament] have been left, which disseminate intelligence by unfolding the original transforming principles. By the rule for admission, it is the custom to apply the water of baptism, to wash away all superficial show and to cleanse and purify the neophytes. As a seal, they hold the cross, whose influence is reflected in every direction, uniting all without distinction. As they strike the wood, the fame of their benevolence is diffused abroad; worshiping toward the east, they hasten on the way to life and glory; they preserve the beard to symbolize their outward actions, they shave the crown to indicate the absence of inward affections; they do not keep slaves, but put noble and mean all on an equality; they do not

amass wealth, but cast all their property into the common stock; they fast, in order to perfect themselves by self-inspection; they submit to restraint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mselves by silent watchfulness; seven times a day they have worship and praise for the benefit of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once in seven days they sacrifice, to cleanse the heart and return to purity.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a name to express the excellence of the true and unchangeable doctrine; but as its meritorious operations are manifestly displayed, by accommodation it is named the Illustrious Religion. Now without holy men, principles cannot become expanded; without principles, holy men cannot become magnified; but with holy men and right principles, united as the two parts of a signet, the world becomes civilized and enlightened.

In the time of the accomplished Emperor Tai-tsung, the illustrious and magnificent founder of the dynasty, among the enlightened and holy men who arrived was the most-virtuous Olopun, from the country of Syria. Observing the azure clouds, he bore the true sacred books; beholding the direction of the winds, he braved difficulties and dangers. In the year of our Lord 635 he arrived at Chang-an; the Emperor sent his Prime Minister, Duke Fang Hiuen-ling; who, carrying the official staff to the west border, conducted his guest into the interior; the sacred books were translated in the imperial library, the sovereign investigated the subject in his private apartments; when becoming deeply impressed with the rectitude and truth of the religion, he gave special orders for its dissemination.

In the seventh month of the year A.D. 638 the following imperial proclamation was issued:

“Right principles have no invariable name, holy men have no invariable station; instruction is establish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ocality, with the object of benefiting the people at large. The greatly virtuous Olopun, of the kingdom of Syria, has brought his sacred

books and images from that distant part, and has presented them at our chief capital. Having examined the principles of this religion, we find them to be purely excellent and natural; investigating its originating source, we find it has taken its rise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important truths; its ritual is free from perplexing expressions, its principles will survive when the framework is forgot; it is beneficial to all creatures; it is advantageous to mankind. Let it be published throughout the Empire, and let the proper authority build a Syrian church in the capital in the I-ning May, which shall be governed by twenty-one priests. When the virtue of the Chau Dynasty declined, the rider on the azure ox ascended to the west; the principles of the great Tang becoming resplendent, the Illustrious breezes have come to fan the East.”

Orders were then issued to the authorities to have a true portrait of the Emperor taken; when it was transferred to the wall of the church, the dazzling splendor of the celestial visage irradiated the Illustrious portals. The sacred traces emitted a felicitous influence, and shed a perpetual splendor over the holy precincts. According to the Illustrated Memoir of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the historical books of the Han and Wei dynasties, the kingdom of Syria reaches south to the Coral Sea; on the north it joins the Gem Mountains; on the west it extends toward the borders of the immortals and the flowery forests; on the east it lies open to the violent winds and tideless waters. The country produces fire-proof cloth, life-restoring incense, bright moon-pearls, and night-luster gems. Brigands and robbers are unknown, but the people enjoy happiness and peace. None but Illustrious laws prevail; none but the virtuous are raised to sovereign power. The land is broad and ample, and its literary productions are perspicuous and clear.

The Emperor Kau-tsung respectfully succeeded his ancestor, and was still more beneficent toward the institution of truth. In every province he caused Illustrious churches to be erected, and ratified the honor conferred upon Olopun, making him the great conservator of doctrine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State. While this doctrine pervaded

every channel, the State became enriched and tranquility abounded. Every city was full of churches, and the royal family enjoyed luster and happiness. In the year A.D. 699 the Buddhists, gaining power, raised their voices in the eastern metropolis; in the year A.D. 713, some low fellows excited ridicule and spread slanders in the western capital. At that time there was the chief priest Lohan, the greatly virtuous Kie-leih, and others of noble estate from the golden regions, lofty-minded priests, having abandoned all worldly interests; who unitedly maintained the grand principles and preserved them entire to the end. The high-principled Emperor Hiuen-tsung caused the Prince of Ning and others, five princes in all, personally to visit the felicitous edifice; he established the place of worship; he restored the consecrated timbers which had been temporarily thrown down; and re-erected the sacred stones which for a time had been desecrated.

In A.D. 742 orders were given to the great general Kau Lih-sz', to send the five sacred portraits and have them placed in the church, and a gift of a hundred pieces of silk accompanied these pictures of intelligence. Although the dragon's beard was then remote, their bows and swords were still within reach; while the solar horns sent forth their rays, and celestial visages seemed close at hand. In A.D. 744 the priest Kih-ho, in the kingdom of Syria, looking toward the star [of China], was attracted by its transforming influence, and observing the sun [*i.e.*, the Emperor], came to pay court to the most honorable. The Emperor commanded the priest Lo-han, the priest Pu-lun, and others, seven in all, together with the greatly virtuous Kih-ho, to perform a service of merit in the Hing-king palace. Thereupon the Emperor composed mottoes for the sides of the church, and the tablets were graced with the royal inscriptions; the accumulated gems emitted their effulgence, while their sparkling brightness vied with the ruby clouds; the transcripts of intelligence suspended in the void shot forth their rays as reflected by the sun; the bountiful gifts exceeded the height of the southern hills; the bedewing favors were deep as the eastern sea. Nothing is beyond the range of the right principle, and what is permissible may be identified; nothing is beyond the power of the holy

man, and that which is practicable may be related.

The accomplished and enlightened Emperor Suh-tsung rebuilt the Illustrious churches in Ling-wu and four other places; great benefits were conferred, and felicity began to increase; great munificence was displayed, and the imperial State became established. The accomplished and military Emperor Tai-tsung magnified the sacred succession, and honored the latent principle of nature; always, on the incarnation-day, he bestowed celestial incense, and ordered the performance of a service of merit; he distributed of the imperial viands, in order to shed a glory on the Illustrious Congregation. Heaven is munificent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blessings, whereby the benefits of life are extended; the holy man embodies the original principle of virtue, whence he is able to counteract noxious influences.

Our sacred and sage-like, accomplished and military Emperor Kien-chung appointed the eight branches of government, according to which he advanced or degraded the intelligent and dull; he opened up the nine categories, by means of which he renovated the Illustrious decrees; his transforming influence pervaded the most abstruse principles, while openness of heart distinguished his devotions. Thus, by correct and enlarged purity of principle, and undeviating consistency in sympathy with others; by extended commiseration rescuing multitudes from misery, while disseminating blessings on all around, the cultivation of our doctrine gained a grand basis, and by gradual advances its influence was diffused. If the winds and rains are seasonable, the world will be at rest; men will be guided by principle, inferior objects will be pure; the living will be at ease, and the dead will rejoice; the thoughts will produce their appropriate response, the affections will be free, and the eyes will be sincere; such is the laudable condition which we of the Illustrious Religion are laboring to attain.

Our great benefactor, the Imperially conferred purple-gown priest, I-sz', titular Great Statesman of the Banqueting-house, Associated Secondary Military Commissioner for the Northern Region, and

Examination-palace Overseer, was naturally mild and graciously disposed; his mind susceptible of sound doctrine, he was diligent in the performance; from the distant city of Rajagriha, he came to visit China; his principles more lofty than those of the three dynasties, his practise was perfect in every department; at first he applied himself to duties pertaining to the palace, eventually his name was inscribed on the military roll. When the Duke Koh Tsz'-i, Secondary Minister of State and Prince of Fan-yang, at first conducted the military in the northern region, the Emperor Suh-tsung made him (I-sz') his attendant on his travels; although he was a private chamberlain, he assumed no distinction on the march; he was as claws and teeth to the duke, and in rousing the military he was as ears and eyes; he distributed the wealth conferred upon him, not accumulating treasure for his private use; he made offerings of the jewelry which had been given by imperial favor, he spread out a golden carpet for devotion; now he repaired the old churches, anon he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religious establishments; he honored and decorated the various edifices, till they resembled the plumage of the pheasant in its flight; moreover, practising the discipline of the Illustrious Religion, he distributed his riches in deeds of benevolence; every year he assembled those in the sacred office from four churches, and respectfully engaged them for fifty days in purification and preparation; the naked came and were clothed; the sick were attended to and restored; the dead were buried in repose; even among the most pure and self-denying of the Buddhists, such excellence was never heard of; the white-clad members of the Illustrious Congregation, now considering these men, have desired to engrave a broad tablet, in order to set forth a eulogy of their magnanimous deeds.

ODE

The true Lord is without origin,
 Profound, invisible, and unchangeable;
 With power and capacity to perfect and transform,
 He raised up the earth and established the heavens.
 Divided in nature, he entered the world,

To save and to help without bounds;
 The sun arose, and darkness was dispelled,
 All bearing witness to his true original.
 The glorious and resplendent, accomplished Emperor,
 Whose principles embraced those of preceding monarchs,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occasion, suppressed turbulence;
 Heaven was spread out and the earth was enlarged.
 When the pure, bright Illustrious Religion
 Was introduced to our Tang Dynasty,
 The Scriptures were translated, and churches built,
 And the vessel set in motion for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Every kind of blessing was then obtained,
 And all the kingdoms enjoyed a state of peace.
 When Kau-tsung succeeded to his ancestral estate,
 He rebuilt the edifices of purity;
 Palaces of concord, large and light,
 Covered the length and breadth of the land.
 The true doctrine was clearly announced,
 Overseers of the church were appointed in due form;
 The people enjoyed happiness and peace,
 While all creatures were exempt from calamity and distress.
 When Hiuen-tsung commenced his sacred career,
 He applied himself to the cultivation of truth and rectitude;
 His imperial tablets shot forth their effulgence,
 And the celestial writings mutually reflected their splendors.
 The imperial domain was rich and luxuriant,
 While the whole land rendered exalted homage;
 Every business was flourishing throughout,
 And the people all enjoyed prosperity.
 Then came Suh-tsung, who commenced anew,
 And celestial dignity marked the Imperial movements.
 Sacred as the moon's unsullied expanse,
 While felicity was wafted like nocturnal gales.
 Happiness reverted to the Imperial household,
 The autumnal influences were long removed;

Ebullitions were allayed, and risings suppressed,
 And thus our dynasty was firmly built up.
 Tai-tsung the filial and just
 Combined in virtue with heaven and earth;
 By his liberal bequests the living were satisfied,
 And property formed the channel of imparting succor.
 By fragrant mementoes he rewarded the meritorious,
 With benevolence he dispensed his donations;
 The solar concave appeared in dignity,
 And the lunar retreat was decorated to extreme.
 When Kien-chung succeeded to the throne,
 He began the cultivation of intelligent virtue;
 His military vigilance extended to the four seas,
 And his accomplished purity influenced all lands.
 His light penetrated the secrecies of men,
 And to him the diversities of objects were seen as in a mirror;
 He shed a vivifying influence through the whole realm of nature,
 And all outer nations took him for example.
 The true doctrine, how expansive!
 Its responses are minute;
 How difficult to name it!
 To elucidate the three in one.
 The sovereign has the power to act!
 While the ministers record;
 We raise this noble monument!
 To the praise of great felicity.

This was erected in the 2d year of Kien-chung, of the Tang Dynasty [A.D. 781], on the 7th day of the 1st month, being Sunday.

Written by Lu Siu-yen, Secretary to Council, formerly Military Superintendent for Tai-chau; while the Bishop Ning-shu had the charge of the congregations of the Illustrious in the East.

[The Following are written in Syriac, running down the right and left

sides of the Chinese inscription above].

“Adam, Deacon, Vicar-episcopal and Pope of China. In the time of the Father of Fathers, the Lord John Joshua, the Universal Patriarch.”

[The Following is in Syriac at the foot of the stone].

“In the year of the Greeks one thousand and ninety-two, the Lord Jazedbuzid, Priest and Vicar-episcopal of Cumdan the royal city, son of the enlightened Mailas, Priest of Balkh a city of Turkestan, set up this tablet, whereon is inscribed the Dispensation of our Redeemer, and the preaching of the apostolic missionaries to the King of China.”

[After this, in Chinese characters, follows:]

“The Priest Lingpau.”

[Then follows in Syriac:]

“Adam the Deacon, son of Jazedbuzid, Vicar-episcopal.

The Lord Sergius, Priest and Vicar-episcopal.

Sabar Jesus, Priest.

Gabriel, Priest, Archdeacon, and Ecclesiarch of Cumdan and Sarag.”

[The following subscription is appended in Chinese:]

“Assistant Examiner: the High Statesman of the Sacred rites, the Imperially conferred purple-gown Chief Presbyter and Priest Yi-li.”

[On the left-hand edge are the Syriac names of sixty-seven priests, and sixty-one are given in Chinese.]

Source:

Charles F. Horne, ed., *The Sacred Books and Early Literature of the East*, (New York: Parke, Austin, & Lipscomb, 1917), Vol. XII, *Medieval China*, pp. 381-392.

Scanned by Jerome S. Arkenberg, Cal. State Fullerton.
The text has been modernized by Prof. Arkenberg.

附录三

参考书目
资料来源

参考书目及资料来源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李宽淑，《中国基督教史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

梁家麟，《福临中华：中国近代教会史十讲》。香港：天道书楼有限公司，1988年。

梁元生，《基督教与中国》。台湾：宇宙光，2006年。

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声出版社，1987年。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上、中、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1985年。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

伟烈亚力，赵康英译，《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名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867年。

顾长声，《欧风美雨袭中华：推动中国走出中世纪的十二个西洋人传略》。加拿大：长青文化公司，2001年。

黄锡培编，《殉道血：1900年义和团事件殉道宣教士的生命故事》。美国加州：中信出版社，2010年。

魏外扬，《中国教会的使徒行传》。台北：宇宙光，2006年。

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http://www.bdcconline.net/zh-hans/stories/by-person/a/ai-deli.php>

林治平，《科学与救恩》。台北：宇宙光，2006年。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

邢福增，《冲突与融合：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论集》。台北：宇宙光，2006年。

陈少兰编，《中文圣经翻译简史》。香港：环球圣经公会有限公司，2005年。

禩浩荣，《图片中国基督教史》。香港：天道书楼有限公司，2011年。

林治平主编，《马礼逊入华宣教二百年：历史图片巡回展导览手册》。台北：宇宙光，2006年。

林治平编，《基督教与中国：历史图片论文集》。台北：宇宙光，1979年。

Tiedemann, R. G. *Reference Guide to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ies in China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lifornia: Ricci Institute for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History,
2009.

耶鲁大学神学院档案室

耶鲁大学拜内克古籍善本图书馆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档案室

剑桥大学圣经专馆

牛津大学安格斯图书馆

牛津大学东方善本部

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

梵蒂冈宣教图书馆

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

伦敦贵格会总部图书馆

美国国会图书馆

